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巨人之子毛岸英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巨人之子毛岸英

第一章 从中国到苏联

“ 啰嗦号开船啦！ ” 邮船随着黄浦江的污水驶向大海

第一灰使用刀叉失败，兄弟俩挥拳打向小董

海上日出，海水和天空一样蓝。地球仪在旋转

袋鼠的袋子里装着小宝宝，使他想起了妈妈

法国耕地不用牛。苏联大使馆半年后发给他们护照

“ 啰嗦号开船啦！ ” 邮船随着黄浦江的污水驶向大海 1936 年 6 月，上海外滩。

上海滩的初夏，已经有些燥热，黄梅雨季刚过，中午太阳当顶，只能穿衬衫。

这是一个云开天朗的暖和早晨，雾气刚刚从黄浦江退去，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浦东那边冉冉升起，空气清新，和风轻拂，上海人最喜欢这样的天气。

一辆黑色的福特牌小汽车，从市区驶向外滩。车内坐着一个大人和三个少年。那个身板结实的中年男子，身穿白色西服，脚踏一双擦得发亮的奶油色牛皮鞋，藏青色的领带笔挺，五官端正，天庭饱满，浓眉大眼，高鼻梁，大耳朵，一脸的威武。然而，他又是一个慈祥友善的人，即使紧闭双唇，脸上也露着微微的笑意。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军师长、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李杜将军。眼下，他化名王元华，脱去了戎装，完全是一副阔商的打扮，潇洒富足。

车内的三个孩子，大的十五六岁，是董牧师的大儿子寿琪，另外二人就是 14 岁的毛岸英（当时化名杨永福）和 13 岁的毛岸青（当时化名杨永寿）。他二人留着平头，面庞瘦削，一看就知道长期缺乏营养，加上临时做的夏衣夏裤，穿在身上不大合身，整个装束像从乡里来的童工。他们管李杜叫王叔叔。

他俩好像做梦一样。

今早起床，董牧师的妻子满面笑容地给寿琪和他们兄弟俩煎荷包蛋，煮阳春面。不久，一辆福特牌的小汽车停在巷子口，三个孩子上了车，发现车里还有一位叔叔。岸英坐在汽车里，沿途看见他曾经卖报纸、拾香烟屁股的马路，再看看车内的气派，简直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

而岸青随着沙发的晃动，竟故意一上一下颠着，得意洋洋。倒是寿琪有些离别的惆怅，他有些依依不舍地想着妈妈和弟弟。

汽车驶在外滩柏油马路上。只见马路上人声鼎沸，一队队游行示威的学生、工人和市民，高举着横幅，呼着口号从南边走过来，“ 停止内战！ ” “ 收复东三省！ ”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此起彼伏的巨浪伴着黄浦江的怒潮，直冲云霄。

李杜将军在汽车夫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示意停车。咔——哧！汽车停了，李杜将灰白色的礼帽压在额头上，开门下了车。他左右一看，只见一群

李杜（1880—1956）辽宁义县人，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1932年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率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陆军上将。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东北解放区缺席当选为吉林临时参议会参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

手持警棍的警察和头上扎着红头巾、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迎着游行的队伍挡上去。路边上，巷子口，一些歪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的特务，鬼头鬼脑地向游行群众指指点点。

“收复东北！……”

这呼声，使李杜将军心潮激动，他不禁锁起了眉头，叹口气，摇了摇头。此刻，岸英也从车里钻出头，李杜慌忙将他按进车内，自己也坐进车里，“乒”地关上门要汽车夫开车。

李杜既担心遇到熟人，又怕引起特务怀疑，出现麻烦，千万不能在最后一刻出毛病。

十六铺码头，一片乱七八糟，一个讲苏北话的小摊贩和讲上海话的小阿飞，不知为何争吵起来，上海阿飞骂苏北人：“‘甘北子猹’（江北猪猡）！”苏北人骂他：“上海瘪三！”二人厮打起来。这地方岸英太熟悉了。5年前春天的一个阴冷的晚上，他们兄弟和外婆、舅妈是从这儿上岸的。5年来，只稍许过了几天好日子，然后就是流浪、流浪，当小叫化子，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现在，一切却像噩梦中醒来一般，该结束了。

“叔叔，阿拉到啥地方去？”岸英见汽车停在码头的入口处，转过头来问李杜将军。

李杜示意他少说话，先下了车，向两个外国佬摘一摘绅士帽，微笑着，说了几句外国话。

外国佬原来板着一副面孔，听李杜讲英语，介绍了自己的身分——大概是一家什么公司的大老板，一向瞧不起中国人的外国佬脸上堆起了一点笑意，伸手向他要“派司”。

李杜取出由外交部颁发的护照，递上去，那外国佬一边看护照，一边用蹩脚的中国话念出声：“姓名王元华年龄45岁职业商人籍贯山东随行……”

念到“随行”时，外国佬问李杜：“随行在哪里？是你什么人？”

李杜忙打开车门，要三个孩子出来。

“先生，是我的亲戚，陪我到欧洲去考察！”李杜用外国话回答。那外国佬将三个孩子一个个与护照上的相片对照，验证一下，就用长长的大手，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按一下，放他们进入码头。

李杜提心吊胆的，就怕在验证时出意外。因为他知道，这三个孩子中间，有一个是顶替岸龙的，万一……当然，他更怕的是有特务盯梢。

倒是岸英岸青“天聋地哑”般，不知这位和善叔叔的心情，也不知将他们带向何方。他俩还沉浸在突然降临到他们身边的境遇之中，仿佛在甜甜的梦里一般。一切都顺利。李杜让汽车夫搬下行李，送上轮船。按照船票上的房间号码，他们来到二等舱。舱内正好四个铺位，一边两张床，中间还有一张桌子放台灯、热水瓶、烟灰缸之类。

一进舱，李杜就把舱门关牢，不让孩子们出去。好奇心的驱使，孩子们把脸贴着舱窗玻璃，看着十六铺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

“嗡——嗡——嗡——”

三声汽笛长鸣，轮船也震得发颤，把岸英吓了一跳。倒是岸青无动于衷，因为被法国“三道头”（巡捕）打得耳朵有些“勿来事”，汽笛声虽然听到了，但不像岸英听得那么清楚。

“好，康脱罗梭号开船喽——！”李杜兴致勃勃地说，那神情倒像个大孩子，脸上堆满了笑容。总算又闯过了一关。

“叔叔，什么‘号’开船喽？”岸青还是没听清，再三问李杜。

“康——脱——罗——梭——号！”李杜一字一板地告诉他，一连讲了三遍，岸青还是似懂非懂地重复着，发不好那个音：“看，看——土，土，啰，啰——嗦——！”

岸英在一旁插话说：“这是外国名字，我来念：看——你——啰——嗦——号！干脆，你那么啰嗦，就叫它‘啰嗦号’！”

“好！啰嗦号，啰——嗦——号——开——船——喽！”

三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应和着，欢喜得在床上打滚。

康脱罗梭号是法国的一条大邮船，非常豪华、漂亮，奶油色的船身显得很高贵，黑色烟囱上缀着红色的波纹，桅杆上挂着的万国旗在微微地飘扬，船尾挂着的是一面法国国旗。

邮船渐渐地远离了码头，在黄浦江中缓缓地移动，不住地“嗡嗡”鸣笛，以免撞上江中来往船只。

岸英把鼻子贴在舱窗玻璃上，两眼炯炯地盯视着岸上的人流、高楼。这一切多么熟悉，而又多么令人心酸。然而，从现在起，这一切，连同痛苦的童年岁月都过去了！

康脱罗梭号随着黄浦江的污流浊水，驶入滚滚东去的长江。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便是有名的吴淞口，这里停泊着外国的大轮船和铁灰色的军舰，远远看得见黄毛高鼻子的外国水手在甲板上耀武扬威地跟法国邮船上的人打招呼，果皮扔过来扔过去，但都掉在江水中。

岸英恨那些外国人，恨不得也拿起果皮扔过去，打在那高鼻子上。可是，李杜还是不让他们出舱门，只准在房间里玩。

不一会儿，邮船经过长江口的余山炮台旁，再往外看，“唉唷，真是天连水，水连天，好大好大的海啊！”岸英欣喜若狂，顾不得李杜的“禁令”，私自开门走到船舷甲板上，伏在船栏上远眺。岸青也跟出来，望着尾随海轮的白色的海鸥群，高兴得在甲板上乱蹦乱跳。

李杜披着一件风衣，把房门锁上，领着三个孩子参观邮船，他们先绕着二楼的船舷走了一圈，站在船尾眺望那渐渐远去的江南江北的初夏风光，然后爬上三楼，在船台上游玩。

呀，船真大呀！这里还有网球场，有晒太阳的一排排高级的躺椅，有几只很小很小的舢板船，吊在空中……岸英从没坐过这么大的船，也没有见过这么宽阔的海，他不断地向李杜将军打听：“王叔叔，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水为啥这么黄啊？”“这是东海还是黄海？……”

李杜很快地喜欢上岸英这孩子，这不仅因为岸英兄弟是他所敬仰的毛泽东的儿子，并且同情他们的苦难身世，更主要的，岸英很懂礼貌，懂事而好学。

“我们自由啦，再见，中国！”李杜将军看着余山炮台渐渐远去，突然将风衣取下，在空中画了个弧线，让海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的衣襟，浑身舒畅。

“再见，中国——”

“再见，再见——”

“啰嗦号开船喽——”

三个少年，跟着李杜呼喊。

第一次使用刀叉失败，兄弟俩挥拳打向小董岸英已多年没有这样自由自

在地呐喊过了，他要在喊声中结束过去的一切，像那展翅的海鸥，飞向遥远光明的未来！

李杜将军又把孩子们赶进船舱，带他们到洗澡间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淋浴。当他看见岸英、岸青脱光衣服，裸露着一排排凸出的肋骨，皮包骨头的手臂上露出青筋，强忍住眼泪，摇头叹息道：“多可怜的孩子！”

岸英他俩已不记得什么时候痛快地洗过澡了。流浪的生活，还顾得上洗澡！第一重要的是把肚子弄饱，冷的、热的、生的、熟的、臭的、香的，凡是能够吃的都吞下去。其次是有个地方睡觉，不冻死就好，报纸、麻袋、稻草都是最好的铺盖，再不就是兄弟拥抱着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相依为命。只要看见有自来水的地方，首先是弯下腰去喝点冷水，然后才是用手捧着水，洗洗脸，至于洗澡，那是顾不上的，他们的身上及颈项、手背，长年累月脏乎乎的，完全是一副“黑人”的模样。衣服么，用几个铜板到旧货店换几件人家穿剩的旧衣裤，即使这样，他们也非常爱惜，一件衣服岸英穿不得了，就给岸青，一直要穿到一条一条的，遮不住屁股了，才连同里面的跳蚤、虱子一同扔掉……

现在，有新衣服了，有澡洗了。前些日子还有位叔叔带他们到有名的王开照相馆，拍了半身快照。现在岸英才知道，那是要贴在叔叔的“派司”（护照）上的，没有那“派司”，没有那照片，“外国赤佬”就不放他们上船。

“朋友们，我们到餐厅去吧！”岸英洗完澡，就感到肚皮里咕咕叫了，好像王叔叔知道他们心思似的，把两手一摊，邀他们去餐厅，“尝尝西餐的滋味吧！”

在豪华美观的椭圆形餐厅里，他们四人围着一张方形的罩着红色台布的餐桌坐下，立即有一个“伯欧”（仆人）走过来，用英语问李杜：“要点什么？”

李杜要了四杯牛奶，四份“三明治”，还有奶油、奶酪、沙拉、粉肠、卤菜，还有一瓶“beer”（啤酒）。

一会儿，“伯欧”端上来大大小小的盘子、碟子，还有刀、叉，只是没有筷子。

岸英、岸青你看我，我看你，没有筷子怎么吃饭呢？

李杜笑笑，右手拿起雪亮的刀，左手举起明晃晃的叉，在“三明治”上用叉抵着，右手的刀便将“三明治”切成一块一块的，在上面涂上奶油，然后用叉一扎，送进嘴里……岸青看得直流口水，也照着王叔叔的样子，只是刀叉实在不听使唤，索性用手抓起来往嘴里送，引起了一阵哄笑。

岸英嚼着“三明治”，大彻大悟地说：“啥呀，三明治……不就是馒头上面摊了一层煎鸡蛋？”

“不是馒——头，是面——包！”董寿琪吃过西餐。岸英从他那口气里，感到受了侮辱。

岸英又吃那盘“沙拉”。“咦？啥么子沙拉？就是没有煮的小菜么，拌了奶油，格一点也勿好吃！”小董忍不住笑出声来。岸英投他一瞥，拳头攥紧了。

第一次用刀叉失败了，又没筷子，岸英兄弟俩干脆用手左右开弓抓着吃，不仅把自己面前的盘子碟子一扫而光，就连李杜给他们另外要的一份，也吃得盘碟见底，只是怪味的“沙拉”他们没动一下。岸青说：“啥么子沙拉，生草生菜，阿拉乡下是用来喂猪喂羊的呀！”

李杜很同情这两个饿怕了的孩子，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又好笑又难过。

“咯只乡巴佬，‘沙拉’也不懂，‘三明治’也不晓得吃，还到外国去！”小董讥笑他们了。

这些年来的流浪生活，使岸英的性格变得倔强、好斗。他忍不下这口气，心想，过去在你家，我们受气，没有撑腰的，今朝你还耻笑我们是“乡巴佬”！好吧，乡巴佬又怎么样！

他站起身，一拳朝小董揍过去；仍不解恨，又送上一拳。岸青也帮哥哥的忙，打得小董歪倒在地上，“呜呜”地直哭。

这一着是李杜意料不到的。他很生气，吆喝住岸英：“住手！怎么不讲文明！都给我回到房里去！”

三个少年，都哭着乖乖地回到房间里。李杜气呼呼地指着岸英：“依打人，还哭啥！”

岸英扑在被子上，“呜呜”地哭个不停，又喊妈妈，又喊外婆，又喊叔叔……李杜给他哭蒙了，不知这孩子为何这般伤心。

哭够了，岸英才啜泣着说：“王叔叔，今天是我不对。可是在他家的时

候，他们几兄弟打得阿拉好疼好疼啊！”

“喏，阿拉背上也给扫把打过……”

小董在一旁不吭气，抹着泪，他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再也不敢逞强打人啦！

李杜不能触痛岸英的创伤，又不能容忍他在餐厅的举动，只好要他们各就各位——睡觉。第二天，他悄悄地找小董谈心说：“你是大哥，比他们俩大好几岁，用不着讽刺他们是‘乡巴佬’呀！”又找岸英：“你要做个文明的孩子，动不动就打人，‘勿来事’！都是中国人，要团结和气。”岸英又跟他诉一顿苦。李杜心里明白了，但还是警告岸英：“往后不准再打架，懂哦！”岸英懂事地点点头。

不过，对于这次的“战斗”，岸英可不后悔。在十多年后，他对妻子刘思齐眉飞色舞地描述这场“战斗”：“我在去法国的轮船上，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海上日出，海水和天空一样蓝。

地球仪在旋转军人出身的李杜有着早起的习惯。他起床后，舒展舒展腰腿，把三个熟睡着的少年喊醒：“朋友们，起床，看海上日出去！”

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是贪睡的季节，他们很不情愿地起了床，披上衣服，踏上甲板。

岸英极目四望，不禁大喊道：“嘿！大海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蓝色，跟天空一样蓝！”

李杜告诉他们：“这里已是东海了，东海和南海的海水是碧蓝碧蓝的。”

啊，太美了，海连天，天连海，水天一色，好像无边无垠的蓝色缎带。一群白色的海鸥，平展着翅膀，飞上蓝天，有的尖嘴里叼着一条银白闪光的小鱼。辽阔的东方，天的尽头和海面的交会处，渐渐地露出一线白光，白光向海、天扩展着，扩展着，那淡白的地方，渐渐有了红晕，东方的天穹，在瓦蓝的浮着白絮的高空中，突地划出一道剑样的光带，绯红的，玫瑰色的，淡黄色的，美妙无比，瞬息万变。

“啊，太阳，快看！”李杜指向海天相交处，只见一轮巨大的红日，腾

地从蓝色海水中跳跃而出，仿佛带着一身露水似的。刚刚上升的红日，还不很圆，尤其是与海面接触处，断断续续地在淋着红色的水光水花水影，而刚刚还是湛蓝的大海，像血染的一样，变成了“红海洋”……

此刻，甲板上正站满了海员和旅客，大家谁也不吭声，每个人都陶醉在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中。

日出处染上了一片朝霞，五颜六色，瑰丽辉煌，这赤、橙、黄、绿、青、蓝、紫，渐渐地像彩墨画似的，越染越开阔，以至于很快扩放到整个东方。此刻，旭日变成了火球般的太阳，太阳比刚出海时瘦了小了。岸英直感到双目受不了时，才迸发一声：“太奇妙了，太伟大了！”李杜仿佛大梦初醒似的，也念叨着：“大自然，真是美妙无比！”

李杜是行伍出身，可他不是一个粗鲁的军人，他喜欢听音乐，也爱哼哼歌曲，有几首救亡歌曲是他最爱唱的，每当唱这些歌时，他眼前便浮现出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歌声中，他显得忧伤、愤懑。睡前，饭后，他吹出的口哨声，也总是这几支歌曲的旋律……

李杜喜欢看书，岸英也嗜爱书报，他常常接过李杜的书，认真地阅读，不懂的字，就先请教那个不开口的老师——《学生字典》，查不到的，或只知字面，不懂词义的，就请教李杜。李杜很喜欢他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得知他只是在母亲身边读了一两年小学，在上海流浪时靠这本字典，如今已能看《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大部头古典名著时，赞叹不已，不住地摇头叹息：“唉，这个世道，真难为这些好孩子了。”李杜很快成了岸英的知心朋友和老师。

有一次，岸英神秘兮兮地悄悄问李杜：“王叔叔，你怎么找到我和弟弟的呀？”

李杜笑而不答，看了一眼其他两个孩子，便走出房间，岸英很机警，马上跟出去。在甲板上，岸英挨着李杜的躺椅坐下，两眼深情地望着王叔叔的脸。然而，岸英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便和“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关系。李杜将军和张学良将军一样，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对毛泽东非常钦佩和尊重。此时，他正准备到西欧去考察。临行前，他接到了张学良将军交给他的秘密使命，即：中共地下党委托李杜将军将毛泽东的孩子带出去。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他便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从在上海办理护照起到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以及到达巴黎交给接替的人，整整半年的时间，他始终恪尽了保护人、师长、朋友的职责。对于岸英的提问，李杜不可能透彻地回答，他只告诉岸英：“你爸爸毛泽东先生已经到达陕北，他很想念你们。那边正在打仗，按照几年前跟苏联达成的协议，还是将你们送到苏联去学习。”

岸英对于爸爸抵达陕北的消息，早就从报纸上看到了。国民党报上常讲“毛匪已被全部消灭”，“毛泽东为当今石达开第二”，可是不久，又在报上出现了通栏标题：“共匪毛泽东大股流窜陕北，我部正在追击”。

不知是遗传因子还是岸英从小生活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之中，他从小就关心时事，对政治极感兴趣，他迫不及待地问李杜：

“王叔叔，既然张学良是蒋介石的副总司令，你又是他的部下，你怎么愿意冒险送我们去苏联呢？”

这一问，倒是把李杜问窘了。他跟这个 14 岁的孩子讲政治、谈战争，似

乎不相宜，只摇摇头，用一首古诗回答道：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岸英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一点。

李杜突然站起身，在甲板上漫步，又唱起了他心爱的歌曲：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边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自从大难平地起，骨肉离散父母丧。岸英知道王叔叔很痛苦，便跟在他身后。奇怪的是，邮船是向南航行的，而王叔叔却总是抬头望着北方。从上海到香港，820多海里，康脱罗梭号航行了三四天还未到，孩子们耐不住了，不住地问李杜将军：“王叔叔，怎么还不到呀？”

“朋友们，别急呀。”李杜总是这样亲切地称呼孩子们，使岸英他们感到温馨。在上海流浪的日子里，他们化名杨永福、杨永寿，几乎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因为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不外乎是“dog”（狗）、“pig”（猪），或用难听的字眼儿来臭骂他们。有人称他们“朋友”了，真有点受宠若惊。

李杜站在甲板上，面向东南方向，眺望着海的尽头，对岸英说：“永福，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阿拉勿晓得，那里是日出的地方吗？”岸英瞧过去，除了几只海鸥、海燕在翱翔，什么也看不到。

“那是祖国的宝岛台湾。台湾可富裕啦，居住着高山族同胞。”说到这里，李杜眼里发亮了。

“王叔叔，我们的‘啰嗦号’经过台湾吗？”岸英天真地问。

“去不了呀，那里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李杜心情忧郁地摆摆手，“甲午战争以后，台湾割让给日本了。”

“我长大了，要带兵把日本鬼子赶跑，把台湾收回来！”岸英信誓旦旦地说。

康脱罗梭号终于抵达第一站——香港。

香港是远东最繁华的港口，那里鱼龙混杂，李杜怕国民党的特务发现，所以心里虽然很想上岸去看看，休息休息，沾沾陆地的气息，可为了孩子的安全，他还是不准孩子们上岸，只在甲板上观望一番。

“香港是啥人的？”岸英不解地问。

“唉，跟台湾一样，也是我们中国的，可是清朝政府打了败仗，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了。”李杜又叹了口气。

“清朝是坏蛋，阿拉长大了也要带兵把香港收回来！”岸英握紧两只小拳头义愤填膺。

“朋友，要收回来的地方可多啦，将来要靠你们这一代了。”李杜忧心忡忡地说。香港码头上乱七八糟的样子，他不忍目睹，便回到船厅里，转动着排球大小的、花花绿绿的地球仪。

“这是啥玩艺儿？”岸青问。

“地球仪，就是我们的地球模型。喏，这里是北极，这里是赤道，我们要经过赤道。你们还要去靠近北极的苏联！”李杜好像地理教员似的，在地球仪上指点着，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岸英欢欣地问：“王叔叔，我们这‘啰嗦号’怎么走呀？快告诉我。”求知欲极强的岸英，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李杜掏出一支美丽牌香烟，点燃，喷吐着烟雾，然后稍作思考，用最浅

显易懂的口吻告诉三个孩子：

康脱罗梭号从上海起航，经过长江入黄海过东海，经过台湾海峡，在香港停留，上下客人和货物。然后，通过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在越南的西贡停留后，再经南海，过南沙群岛——这些小岛，像明珠散布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中，海中有无数奇异的鱼虾珍宝。还经过曾母暗沙，它靠近马来西亚，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然后，穿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康脱罗梭号就从太平洋进入到印度洋。途经科伦坡，在印度的孟买港停留后，驶进红海，再往前走，就来到了非洲、亚洲、欧洲的交会处——埃及的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穿过运河，进入地中海，大约还要走 2000 多公里，才能到法国岸青听到印度二字，就神经质地反感，“印度红头阿三（巡捕）最讨厌了，阿拉卖报老挨他们的打！”上海外国租界里，喜欢请印度人看门、当警察，印度大胡子喜欢在头上扎个红头巾，所以上海人蔑称他们是“红头阿三”；而法国巡捕，衣服袖子上有三条杠杠，上海人骂他们是“法国三道头”。这些家伙在岸英、岸青的头脑里，跟外婆讲的牛鬼蛇神、阎王老子一样可恨可怕。

李杜又向他们解释道：“‘红头阿三’是印度的坏人，哪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印度、埃及、巴比伦和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任何国家、任何地方，既有好人，也有坏人。”

岸英点点头，又突然问：“王叔叔，我们要去的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那里也有坏人吗？”

李杜笑而不答，停了片刻说：“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我没去过那里，我希望你们到哪里遇到的都是好人！”

袋鼠的袋子里装着小宝宝，使他想起了妈妈一个多月的航海远行，岸英在李杜将军的指教下，懂得了很多。他知道了天是多么的广，地是多么的宽，海是多么的阔，而和自然界相比，人又是多么的渺小……岸英饱览了太平洋、印度洋的迷人风光，黄海、东海、南海、地中海的特色，领略了赤道的炎热，了解了西贡、孟买、苏伊士的风土人情。他们也看见海中强盗——鲨鱼吞吃小鱼，还观赏了飞鱼跃上康脱罗梭号的甲板。他们用铁丝做成鱼钩，安上肉骨头，轻而易举地就钓上十来斤重的海鱼，送到厨房里加工，然后饱餐一顿……有一件事又使岸英改变了以前的观点，使他感到人类的伟大，人具有极大的创造力。当轮船驶过阿拉伯海、穿过曼德海峡，进入了狭长的红海，再往前走，就到了苏伊士运河。岸英听王叔叔讲过这条运河是用人工开凿出来的，它是连接欧亚的咽喉要道。以前，没有这条运河时，往来欧亚的船只只好从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绕行，要多走几千海里，航行的时间要长很多。现在有了这条运河，多么方便！岸英感到，自然界伟大、人类也伟大！

然而，在大海上旅行，可得有耐心，要能忍受无聊和寂寞。大海茫茫，水天浑然一色，放眼望去，除了海，还是海。刚上船时的那股新鲜劲早已过去，船上的东西看过了不知多少遍，每天都是老样子。这样的日子，大人都感到无聊，更何况三个爱说爱闹，对新东西感兴趣且闲不住的孩子。现在，三个人已捐弃前嫌，成了好朋友，在李杜将军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玩玩笑笑、打打闹闹，很是融洽。可是，有时候他们也为海中的鱼、热带的风光、赤道的奇景争论不休，嚷嚷得天翻地覆、面红耳赤。

这样航行，对岸英来说，在这 14 岁孩子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终生难忘。但是，他在以后也很少谈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因为，那

时他毕竟不是跟父母渡海旅行，而是像一只无线的风筝，在空中飘忽，闯荡世界。他们兄弟到底要到哪里？王叔叔说我们要去的苏联，还有很远，一路上还要费多少周折，而苏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人们讲的那么美好，这都还是个未知数。加上远离故土，心中感到惆怅，有时他闷闷不乐地坐在甲板上，望着海面 and 远处发愣。

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结束了痛苦的流浪生活，跟着李杜将军旅行，岸英的心情是愉快的，但也有触景生情、勾起辛酸往事的时候。有一天，“啰嗦号”经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的一个岛屿，岸英他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的样子像老鼠一样，只不过特别巨大，比人还高，东张西望，那两只前脚缩在胸前，用两条后腿蹦蹦跳跳地走路，停下以后，变戏法似的从胸前的皮袋里冒出几只“小老鼠”，太有趣了。

“王叔叔，那是啥怪物，把小孩藏在肚皮里？”岸英好奇地问李杜。

李杜告诉他，这是澳洲特产——袋鼠。袋鼠前胸有个皮袋子，为了保护它们可爱的孩子不受外敌侵犯，常常把“儿女”藏在皮袋里……

“啊！袋鼠太伟大了，这样爱孩子！”岸英摇头感叹不已。同时此情此景，又触痛了他心中那未痊愈的创伤。

“世上的所有动物都爱自己的孩子，万物之灵的人，更不例外啊！”李杜大发感慨。

李杜的感叹，激起了岸英的思母之情。他想起，小的时候，妈妈总是用她温暖的胸脯，搂抱着他；喂饭菜，怕鱼有刺，总是先放在嘴里，剔除干净；热菜，怕烫了岸英，要吹凉再送到岸英嘴里。有一次岸英病了，妈妈熬了中药，用羹匙喂他药，他咬紧嘴巴，将羹匙咬住不放，气得妈妈打了他几下屁股，可是，妈妈旋即又搂着他哭泣。

想着妈妈，看着袋鼠，这个5岁就离开爸爸，8岁就失去妈妈的孩子，竟伤心地伏在膝头上失声痛哭起来，把李杜吓了一跳。

“妈妈，我们最好的妈妈，你死得好苦哇！”他这一哭，岸青也跟着哇哇大哭。

1930年10月24日，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他和妈妈杨开慧一同被捕了。敌人把杨开慧和毛岸英，还有保姆孙嫂押到长沙后，关进了协操坪监狱。这所监狱是国民党的“模范监狱”，是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的，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的鲜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号子里没铺，只在潮湿的水泥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夜里，岸英就跟妈妈、孙嫂挤在一堆，等待黎明。这号子里，就是大白天，也昏暗潮湿，透不进阳光。

敌人审问犯人的公堂，就在他们号房的斜对面，中间隔着小天井。自从岸英母子被抓来以后，每当听到公堂里鞭打犯人的响声和犯人的呻吟声，岸英就抱着妈妈难过地问：

“妈妈，他们会打你吗？”

妈妈用温暖的手抚摩着岸英的头，坦然一笑说：

“要打要杀随他们，妈妈做的是好事，妈妈不怕打，不怕杀！”听到这些话，岸英双眼直愣愣地看着妈妈，渐渐地，大眼睛被泪水濡湿了。妈妈用温柔的手，替他揩眼泪，微笑着说：“伢子，来，听妈妈讲故事……”

监牢里的夜色来得特别早，特别浓重。岸英捧起钵子里的盐水饭，送到妈妈面前，疼爱地说：

“妈妈，你两天没进一粒米了，吃点盐水饭吧。他们真坏，把这些发霉的米给我们吃，连一点菜都没有。”

妈妈苦笑了一下，接过饭钵子，尝也没尝一口，就放在地上，摇摇头说：

“伢子，妈妈吃不下，妈妈惦着岸青、岸龙。外婆这么大年纪了，夜里还得照料他们啊！”

“杨开慧！”

随着喊声，从牢门口进来个30来岁的油头粉面的人。他既不像当官的，也不像一般老百姓，手提一只黑皮包，走进牢门来，向牢里打量一番，问道：

“你是杨小姐，啊？”

岸英打量着那人，又看看妈妈，胆怯地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只见妈妈沉静地蔑视地盯着那人，冷静地回答道：“干什么？我就是。”

那人打开黑皮包，掏出一个本子，换了副笑容，从西装胸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

“杨小姐，久仰了，我是《晚晚报》的采访员。”

妈妈扫视了一下这个采访记者，知道他想从自己身上捞点油水，便冷淡地说：

“你们这些人是替国民党吹喇叭抬轿子的，有什么就讲吧！”

“杨小姐，你家居何方，今年多大年纪，家庭情况如何？”

“这个嘛，你们的铲共义勇队早已打听得一清二楚，何必问我？既然你打开本本，我也不使你失望。我叫杨开慧，今年29岁，父亲是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家住长沙东乡板仓。”

《晚晚报》那个记者刷刷地在本子上记了下来，恭维说：“不简单，书香门第，又只2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

岸英很讨厌这个家伙，就老是打岔，一时问妈妈话，一时从地上捡了一张旧报纸要妈妈念。开慧一看这份旧报纸，原来是那天早上姨妈来探监时，偷偷塞在她裤口袋里的。她给岸英念过多次，岸英几乎都背熟了。为了从精神上战胜那个反动记者，她仍然朗声念着报纸：“十月四日，共党毛泽东部第九次攻下赣西南重镇吉安。”

这一念，使那个记者十分狼狈。他想不到国民党办的报纸却给共产党鼓了气。

记者皱紧眉头问：

“杨小姐，你家里好好的，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国法，晓得叫？”

开慧淡然一笑，声音激昂地说：

“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从1927年‘马日事变’至今，湖南人民死在他手里的何止千万！他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

岸英应妈妈的腔说：

“何键是个大坏蛋，抓我妈妈，还抓了我和孙嫂。”那记者讨了个没趣，又改换一副腔调，劝说道：“杨小姐，如果你能悔过自新，我替你向何主席讲情，就无生命危险了。我们可以在报上代你发个悔过书，如何？”何键当时是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岸英看见妈妈一昂头，鄙夷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杨开慧岂能屈服于你们？我把生命早置之度外。为了大众的事业，虽死何妨！”

记者拼命地记下来，生怕漏掉一个字似的。他心想，只要把这篇访问记一发表，他就会名利双收，从即将受刑的毛泽东妻子身上，可以大发一笔横财！他追问着：“小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的话完了。”杨开慧再不搭理那个记者。那家伙又问了一句，没有回音；挖空心思再问一句，仍然没有回音。他瞧瞧杨开慧，见她端庄朴素，看来问不出什么名堂了，便合上本子，叹了口气，假惺惺地说：“可惜，可惜，又一个女才子。”

“你还不走开？我妈妈不理你！”岸英厌恶地推着记者往牢门走，“你滚蛋吧！”

“嘿嘿，毛泽东杨开慧生的儿子，从小都这么厉害！”记者走出牢门，还回过头来讲了几句。

入狱的第4天下午，号子门上的铁锁咣啷一声打开了。

“提杨开慧！”牢头卒子凶神恶煞般的吼声，在牢里回响，号子里显得特别恐怖。伪清乡司令部执法处派特务来提审了。杨开慧从容不迫地走出牢门，经过天井四周的走廊，走进杀气腾腾的公堂。

岸英屏住呼吸，要孙嫂抱着他，从一本书那么大的窗口里向斜对面凝望着，侧耳细听。

“毛泽东在哪里？”敌人审问了。

“……”沉默。

“你们地下党在哪里？”声音更大。

“……”仍然没有回音。

“你在长沙东乡除了煽动百姓造反夺枪，还搞了什么名堂？”敌人狂叫着。回答还是沉默。

敌人怒吼起来：“快说呀，你是哑巴？”

又沉默了很久，岸英听见妈妈冷冷地回答三个字：

“不晓得！”

执法处长喝令卫兵：“给我重重地打！”

听见劈劈啪啪的抽打声，好像一记记都打在自己身上，岸英不禁对着水泥过道大声哭喊起来：“不准打我妈妈！我妈妈是好人！”

“啪！”牢头卒子把那扇小窗户关上了。

仍旧传来执法处长的吼声：“给我加压杠！”“踩，加人！”……这些如狼虎似的叫声，好像魔鬼的喧嚣。8岁孩子那纯洁的心灵，怎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啊！听不到妈妈的声音，岸英真担心妈妈被这些坏蛋打死！

过了一两个钟头，突然从公堂那边传来妈妈惊天动地的回答：“要杀要砍，听便！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休想！”

杨开慧被送回牢房。她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青布衣眼上全是鲜血。岸英一把抱住妈妈，一边流泪一边用小手去抚摩妈妈的创伤，问：“妈妈，哪里疼？等我长大了，替你报仇，把他们抓起来，打一百下屁股！”

妈妈听了孩子的话，心里甜滋滋的，虽然全身骨头架子好像散了一样扯心的痛，然而有这么可爱的孩子在身边，对她是个极大的安慰。她微笑着，艰难地抬起头，揩干岸英的泪水，安详地说：

“孩子，你要记住，爸爸正在打白匪，妈妈受苦也是为了穷人。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有好日子过的。”

聪明的岸英会意地点着头，嘴里嗯嗯着。

妈妈的疼痛稍好一点，就把岸英拉到身边，要孙嫂拿来一块石板，喘着气说：“伢子，妈妈昨天教你的字还记得吗？”

“记得，‘爱，爱穷人，爱祖国’。”岸英记性很好，把昨天妈妈教的几个字默写出来了。妈妈满意地点点头，把石板上的字抹掉，又写了几个生字，对岸英说：“这是个‘恨’字，恨敌人，恨坏人。”

岸英也跟着念起来，直到他会写会背了，妈妈才躺在稻草上，轻轻地呻吟着。

岸英怕妈妈冷，就脱下自己的破褂子，盖在妈妈身上。

从10月24日被捕到11月14日牺牲，杨开慧被多次过堂审问，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每次回到监房里，她总是把岸英搂在怀里，眼泪扑簌簌地流淌，叮嘱道：“你要记住妈妈啊！你不会忘记妈妈吧？”岸英仰着头望着妈妈满是伤痕、血迹的憔悴的面庞，报以热泪，说：“妈妈，你不用说，我都懂，懂！”

地下党组织和杨开慧的亲属、朋友们在南京、长沙进行了很多营救杨开慧的工作，可是何键不肯放下屠刀，他为了缓和舆论的压力，只把杨开慧由“杀头示众”改为“枪决”。

1930年11月14日中午，岸英和妈妈正在吃那又霉又硬的糙米饭、臭咸菜，牢头卒子打开铁锁，牢门外边“八”字形地排开两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小头目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提签，大声念道：“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执行枪决。”他把提签交给牢头卒子，还得意洋洋地向四合院扫视一番。

这个四合院关了几百名犯人，这时候却像死一样的寂静。每个人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能听到。

岸英丢下饭钵子，扑上去死死地抱住妈妈：

“妈妈，你不能去。妈妈，不能去啊！”

妈妈把自己钵子里的饭菜都倒给岸英，把自己的夹衣披在他的肩上，极其镇静地说：“伢子，不要流泪，哭是没用的。你要吃好饭，睡好觉，长大了好为穷人办事。”

妈妈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套早就准备好的青布衣服，换了一双白底青布圆口布鞋，和牢房里的难友们一一点头告别。走到号子门口，她又回过头，弯下腰，把岸英紧紧地搂在胸前，用自己身上的热气最后一次温暖她的爱子的心，在他那满是泪痕的脸上亲了又亲。她多么舍不得岸英、岸青和小小的岸龙啊！这个时候，对党、对毛泽东的满腔心里话，千言万语，她都无法倾吐！

“嘿嘿，既然这么留恋孩子，就向何主席悔过了吧？”小头目狡黠地阴笑着。杨开慧瞪了他一眼，咬咬嘴唇，长长地吁了口气，向岸英讲了最后一句话：

“伢子，记住：血债要用血来还！”说完，便昂首挺胸，大步走出牢房，转过丁字形的走廊过道，与每个号子里扒在窗口上目送的难友们作最后一别！她脸上非常安详、镇静。

岸英从小窗子里望着妈妈走进了公堂。他没有办法救妈妈，牢里的阿叔叔也无能为力，他们都愤怒地瞪着刽子手，把牙齿咬得紧紧的。岸英声嘶力竭地呼天号地：“妈妈！妈妈！妈妈……”

杨开慧从监狱里走出去，铁镣的叮咚声撕心裂肺，沿途多少人冒着危险赶到由监狱到刑场的路边，向杨开慧告别，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杨开慧英勇就义了，她死得好悲壮、好惨烈！为了折磨这位不屈的共产

党人，凶残的敌人不是一颗子弹就让她毙命，而是先开枪把她打伤，让她流血，让她疼痛。她在痛苦中煎熬着，两只手深深地抠进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深坑……

目送着妈妈从容地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毛岸英哭哑了嗓子，哭干了眼泪，他咬紧牙关发誓，要为妈妈报仇！

李杜很同情这两个从小失去慈母的苦孩子，眼睛也湿湿的。

“朋友们，古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坚强一点，长大了，学好本领，为母亲报仇雪恨！”李杜以一个职业军人的气概，把拳头在空中一挥，说：“来，朋友们，我教你们唱一支歌！”

一听唱歌，三个孩子都围拢来，跟着李杜一句一句地学：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离开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无尽的矿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收回那无尽的矿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李杜唱歌时，仍旧面向东北方，唱着唱着，他的声音嘶哑，那明亮的大眼里，饱含着泪花，唱到最后一句，他再也唱不下去了，竟喊着“爹娘啊——”痛哭失声。他的歌声也感染了三个孩子，孩子们抱着他的高大身躯，嚤嚤地啜泣着。

每次唱着这支歌，李杜就难以抑制感情的潜流。作为东北军的一个师长，在“九·一八”事变时，他就守卫在沈阳的西北部，亲眼看见日本飞机轰炸他所在防区的柳条沟，强占北大营。可是，蒋介石下令不准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将士反击，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们只好一枪不发，带着满腔的悲愤，退到关内。有一支小曲最使人心疼：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炸柳条沟，后占北大营，
烧杀奸淫真是凶，
烧杀奸淫真是凶，
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每当唱到“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他既愤怒也自责。作为一名军人，不去打日本鬼子，而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剿共”，这真是中国革命军人的不幸啊！这次他愤而出访西欧，去考察军事、实业，也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做法的一种消极反抗！

法国耕地不用牛。苏联大使馆半年后发给他们护照 7 月底，康脱罗梭号

邮船安抵地中海北岸的法国马赛港。一个多月的航海旅行结束了，他们在海上行驶了1.4万多公里，几乎绕了半个地球。至此，岸英才松了口气，他问李杜：“快到了吧？”

李杜摸着他的平头说：“早着呢！”

刚刚上船时，虽然岸英兄弟不习惯吃西餐，可是他们适应能力很强，渐渐地一切都习以为常了。一个月里，他们俩兄弟胖了许多，肌肉填补了肋骨之间的坑坑洼洼，瘦骨嶙峋的胳膊腿，也丰腴结实起来。这一切，使李杜很满意。而岸英在这个月里，不仅身体长胖长结实了，更重要的是他开阔了眼界，又跟李杜学习到许多历史、地理、自然、动植物、海洋生物知识，好像进了一座野外博物馆，一座自然大学。

马赛港是一座繁华的港口，各国的大轮船停泊在那里。正逢7月，欧洲的炎夏日子，许多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黑人、白人，都到马赛附近的尼斯避暑消夏。法国是个号称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人们思想开放，街上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袒胸露臂，岸英看得眼花缭乱，对一些穿得很短少的女郎，他都不敢正视，还不住地摇头：“唉，不穿裤子，怎不怕丑？”

李杜笑道：“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西方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名国都有它的长处，要不我们中国为什么派了那么多留学生到法国来呢！”

“嗯，王叔叔讲得有道理。”岸英点了点头。

站在马赛街头，李杜自然想起了著名的《马赛曲》，由此又想起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而岸英兄弟和小董登陆后，突然变成了“聋子”和“哑巴”，因为外国人讲的，他们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向法国人讲话，对方也是摇头摆手，连李杜将军也成了“半文盲”。他只会英语，然而骄傲的法国人即使是懂英语，也很少用它对话。他们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好听、最优越的语言，所以明明听懂了你讲的英语，他也用法语回答你的问话，害得李杜不住地摇头：“嘿，这些法国佬！”

“法国三道头是坏蛋，把我的耳朵都打聋了一只！”岸青咕咕哝哝地说，对法国人充满了仇视，“王叔叔，阿拉怎么到这个坏蛋国家来啊？”

李杜笑道：“永寿，法国是伟大的国家，和我们中国一样伟大，法国人好人多，坏蛋少，也跟我们中国一样，‘三道头’只是少数坏蛋。”

“嘿，阿拉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岸青牢牢记着在电杆上写这条标语而被法租界的“三道头”狠狠揍了一顿的往事。

李杜凭他的英语和一本法国地图，带着三个少年，找到了马赛火车站，买了四张票，乘快车北上，直奔法国首都——巴黎。

这趟特快列车是豪华客车，不仅车身漂亮，车速特快，车厢内也很干净、舒适，窗明几净，座位的沙发又软又松，但在大热天却不粘屁股。

岸英已记不清什么时候坐过火车了。虽然曾随父母到过上海、武汉、广州，可那时他还是个三四岁的细伢子，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14周岁的少年了。少年对世界特有的兴趣与好奇心，使他一时望着窗外风光，一时看着车厢里的旅客和列车服务小姐，他们都是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说话唧里哇啦的，有意思极了。

“王叔叔，噢，现在可以叫你李叔叔了吧？”岸英调皮地缠着李杜将军，“法国不是主张自由与平等博爱吗？总不会像国民党在上海那样随便抓人杀人吧？”

“可是，到了巴黎，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办手续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暴露真面目，懂吗？大使馆里是国民党的人。”李杜仍然小心翼翼，生怕在去苏联的某个环节上出毛病，那就前功尽弃，白白跑一趟欧洲了。他倒可以考察实业，而这几个孩子，尤其是岸英、岸青，岂能再回到上海当流浪儿？那样，他不仅对不住他心目中的伟大人物毛泽东，也对不起自己的老朋友、老上司张学良将军啊！

火车进入了法国最美丽富饶的卢瓦尔河谷，这里的许多古堡，李杜将军仰慕已久，可惜身负重任，不能去欣赏路易十四时代的城堡，去饱啖卢瓦尔河的美味鲈鱼、蛙鱼。

列车经过法国北部平原时，大地上是一片红、一片黄、一片白，在红、黄、白相间中，填满了翠绿。“王叔叔，那是啥呀？这是啥？”岸英欣喜若狂，不断地问。

“那红的、黄的，是玫瑰；那白的是茉莉；那绿的是葡萄；玫瑰、茉莉花可以做香水，法国的香水，世界闻名；那葡萄是著名的法国葡萄酒的原料……”李杜欣赏着一幅幅织锦般的、五彩斑斓的、花的田野，一边向岸英他们介绍。

田野里，也有大片的田地，但不见人和牛，而是靠汽车那样的东西在耕地。

“那是啥？”

“拖拉机。”

“耕地不用牛？”

“耕地用机械，既省力又快速。”

“阿拉乡下种地耕田好吃力呀！”

“将来也有用拖拉机、收割机的时候。”李杜叹了口气说，“不知我们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这样进步哇！”“我们也会用‘鸡’耕田！”岸青竖着耳朵听，也大发感慨，“我现在肚皮饿了，可以吃一只鸡。”

“这个‘机’，不是那个‘鸡’，是‘土——鸡’。”岸英帮忙纠正，弄得李杜将军笑出了眼泪。

火车终于抵达巴黎。

“嘿，原来以为外国人都是大个子，你看，法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高，那些女人，有的还不如中国人高呢！”这是毛岸英出车站的第一个感触。

“这儿天气真怪，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出太阳，跟我们那里黄梅天差不多！”这是岸英的第二个感触。

他们很快找到了下榻的地方。

李杜原以为去苏联很简单，把护照递上去，办个手续，签个证就行了，可哪知这些外交使馆官员，都是一些老牛作风，按部就班，拖拖拉拉。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里的领事部、教育处……来回地折腾，还得笑脸相迎，生怕哪一关会出纰漏。如果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发现永福永寿就是毛泽东的亲儿子，肯定会卡壳。所以，李杜再三叮嘱：“你们别忘了，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

“记得，我有福，他有寿！”岸英举起小拳头向李杜保证。

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房屋，还是清政府时代留下的地产，因为国民政府经费拮据，年久失修，千疮百孔；而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是俄国皇帝精心选址修建的，不但

豪华气派，里面的设施也现代化，更有一块地毯似的草坪和树丛。李杜将两国使馆一比较，不禁摇头叹气。

把护照递给苏联使馆，他们先收下，要他过几天再来。过了几天，说莫斯科还无回音，再等。再去，说那边有回音了，要看看三个孩子。岸英兄弟和小董去了，那位红鼻子外交官把他们从上到下看了个够，然后只摇摇头、耸耸肩，又打发他们回去，告诉他们一个星期后再听消息……

就这么折腾着，白白地消耗时光。

李杜倒还有事干，他要考察实业，完成张学良交代的秘密任务，要忙着会见中国旅法华人、留学生。但他也没有忘记在空闲时，带这三个孩子逛巴黎。

岸英永远忘不了从 320 米高的艾菲尔铁塔上鸟瞰塞纳河风光的喜悦、惊奇；忘不了参观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宫殿——卢浮宫；忘不了了一代枭雄拿破仑在荣军院里的豪华灵柩；忘不了法国骄傲于世的凯旋门和巴黎圣母院；也忘不了跟李杜在著名的协和广场、宽广的香榭里舍大街上漫步的情景。他们第一次乘坐了地铁，下边分好多层，好像蜘蛛网一般。他们还参观了地下墓道，真是吓人。李杜告诉他们，巴黎地下都空了，不是地下铁道，就是地下坟墓……

从炎夏到隆冬，时光流逝，很快过去半年，李杜、岸英干着急也没用，只好耐心等待。他们那时还不知道，苏联正处在“大清洗”的前夜，对国内控制很严，对外国侨民到苏联去也非常敏感，审了又审。

在这半年里，岸英抓紧机会自学，也学会了一些法语，他年纪轻，模仿力和适应力强。他长大成人后，可以自豪的是，除了中文外，还精通俄文、英文，法语也马马虎虎，因为国际儿童院里有 20 多个国家（或民族）共产党领导人及革命烈士的子女，天长日久，各种语言交流频繁，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等普通的会话，还是能说出几句的。这是后话。

终于等到那一天，苏联大使馆通知他们：同意杨永福、杨永寿去苏联。“万岁！”岸英激动得抱着李杜将军打圈圈，岸青也乐得抱着哥哥不放。只有小董哭鼻子了。苏联政府不同意他入境，因为他不属于共产党领导人或烈士子女。不过，他也到法国逛了一圈，值得！

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李杜将岸英、岸青送上了火车。李杜并没有告诉他们，在送走了岸英兄弟俩后，他也要离开法国了。就在 12 月 12 日，在祖国的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他心中十分痛快，必须尽快赶回祖国去，因为那里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临别前，他搂抱着两个结识大半年的小朋友，意味深长地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到了那边要好好学习，将来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回国有用武之地啊！”岸英、岸青也抱着他们的“王叔叔”泣不成声，依依不舍……

那一天，他们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碰到一个高个子的山东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很精干。他对李杜将军说：“这两个孩子交给我吧！”约好了上火车的时间，李杜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此人就是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康生。

第二章 共产国际儿童院里的小领袖

在苏联这个儿童院里，聚集着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儿女。毛泽东看到儿子写的文章，由衷地感到高兴，并且百看不厌。周伯伯和邓妈妈来到儿童院。“你们都是周伯伯的好孩子。”

周恩来在上海滩寻觅岸英、岸青，交通员小彭为保护他们被丢进了黄浦江。异国相逢贺妈妈。岸英教贺妈妈学习俄语，毛泽东的小儿子不幸夭折。小领袖的大志向。毛泽东万里家书，问候儿子。躺在床上看《唯物辩证法》，一头扎进图书馆。毛泽东托人带书来，告诫儿子“少谈政治”。

要当政治军事家，向讽刺他们的女孩“宣战”。

状告傲慢的女院长。但岸英还是很有组织观念。“我是中国人！早晚我是要回到祖国去的！”

一张漫画，“抗议”削土豆皮。异国初恋。热烈的巴西女孩，冷静而又传统的中国男孩。

在苏联这个儿童院里，聚集着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儿女。1936年末。

一辆国际列车疾驰，向东、向东……沿途经过柏林、华沙……走了好几天，横跨欧洲大陆，几千公里的漫长旅行，最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下了车，迎接这两个中国南方少年的是冰天雪地和严寒。他们走出莫斯科车站乘车来到一个名叫莫尼诺的地方，住进了设在这里的国际儿童院。这里到处是一片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窟窿似的冷。小时候，他们就听妈妈讲过北极的神话故事，“很可怕的，会冻死人呢！”

岸英哆哆嗦嗦而且神秘兮兮地对岸青说：“这里靠近北极啦，听说耳朵鼻子都要冻住的，千万别乱摸，要是不小心，一摸耳朵，耳朵就掉下来了！”可是，他自己真的试着摸了一下，只感觉鼻子耳朵冻得木木的，但它们都没掉，仍然好好地长在脸上。看到哥哥“试验”失败时的尴尬样，岸青也煞有介事地说：“在这里不能随便在外面撒尿的，要是撒尿的话，还没等尿完，那尿就会冻成了一根弯弯的冰棍儿了。阿拉试试看！”说着对着雪便尿了起来，结果撒出的尿并未冻成棍儿，而眼前的雪却被热乎乎的尿冲化成一个泛着尿黄的、一尺多深的窟窿。看着自己的“杰作”，岸青带着“满意和胜利”的音调：“嘿嘿，看看是阿拉厉害还是依厉害！”

在外边站得时间长了，浑身上下干冷干冷的。“乖乖隆的冬，韭菜炒大葱！”岸英在上海滩跟流浪儿混在一起，学会了一些俚语土话，这会儿他冻得直打哆嗦，双臂紧紧缩着，牙床直打颤，不知不觉当中突然冒出一句苏北下河话来。兄弟俩又冷又好奇，但终于耐不住了，便飞也似的跑回到房间里。

这里的房屋，跟中国的不一样，尤其不像湖南乡里的土坯房子，不但不生火，而且几乎是八面透风。这里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处在冰冷的冬季，所以房屋的墙壁都是双层的，玻璃窗户也是双层的，房内有暖气，有火墙，总是热烘烘，温暖如春。室内室外完全是两个世界。

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真是孩子们的天堂，这里住的都是中国革命家的后代。这所儿童院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家的后顾之忧，经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专门设立的。儿童院里有三位教师：郑一俊（俄语名字叫阿烈耶夫）和妻子赵云龙；女教师方朗，她原是上海纺织厂的女工，受过中等教育，丈夫在国内牺牲了。师哲是儿童院副院长，他来不久即将儿童院作了调整，把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等国的孩子送到伊万诺沃国际第一儿童院，将中国孩子集中在莫尼诺第二儿童院。中国教师教孩子们中文、中国历史等课程，

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国，将来为祖国工作。另外，还有几位苏联教师，负责教孩子们俄语、数学、革命理论等。

先后住进儿童院的有：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化名杨永福，俄语名字：塞尔盖依，爱称谢廖沙）、毛岸青（化名杨永寿，俄语名字：亚力山大，爱称戈勒）；女儿：李敏，即娇娇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林伯渠的女儿：林玲、林莉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郭亮的儿子：郭志成（郭多难，俄语名字：弗拉基米尔·大保）

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小保）

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赵施格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瞿杜一）

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王一飞的儿子：王季龙（王继飞）

林彪的女儿：林小林（琳）

博古的女儿：秦古马

这些孩子当中，有的父母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如郭亮、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有的父母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如张太雷……；有的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富春……

莫尼诺儿童院于 1937 年成立，1940 年关闭，中国孩子便都转入离莫斯科 200 公里的伊万诺沃城，在那里设立有国际第一儿童院，接受的孩子扩展到 27 个国家和民族地区的革命家的后代。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这种做法，有效地支持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们，解除了他们的困难和顾虑，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为祖国、为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同时，也为各个国家培养了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这一历史功绩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所属的国际儿童院也都撤销了。这时候，孩子们也都成长为青年人，其中大多数进入苏联的大学和各种专科学校继续深造。

岸英兄弟俩进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比起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来，简直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当时的苏联是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它多么辽阔广大，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在这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骄傲地互称同志、互相尊重，非常自信，无尚光荣；他们热爱和平，追求着和睦、幸福，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每个人都要工作，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得到保障……当时，苏联实行的是五天工作制。工作的时候，人们都很紧张、热烈。以煤矿工人、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正在全苏蓬勃发展，人们都在奋发工作，争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然而，一到休息的日子，人们都愉快地去旅行，去度周末，尽情地、自由自在地呼吸、享受。

岸英兄弟刚刚到莫尼诺的时候，儿童院里的孩子只有 50 来人，生活非常舒适。苏联政府对这些中国革命的后代十分关怀、爱护，提供了种种优越的条件，让他们生活得幸福。

1938 年冬，岸英兄弟在莫斯科学俄文。在那里的还有林莉、林玲、小保、蔡妮、菲菲……岸英年龄较大，是高级班的，在初级班的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面前，岸英总爱逞英雄。岸青不像岸英，总调皮捣蛋，岸英只比他大 13 个月，却总要照顾他，帮他洗衣服，做很多事情。岸英兄弟俩常在一起下棋，

下得非常认真，常常是岸青输，可是输了又不认输，非要悔棋不可；不让悔，就发脾气，吵闹，俩人常常吵架，最后又总是岸英让着他。每到这时，岸英非常气愤，狠狠地说：“好！好！这一回让你，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再玩是小狗！”可是，过不了多久，经不住岸青的纠缠，俩人又摆开了架式，杀了起来。星期天，有一些女孩子就去帮岸青整理整理内务，洗洗衣服。

当时，莫斯科还有一座“中国参战人员疗养院”，也叫“红军长征干部休养所”，是专门为中国的红军将领开设的。红军长征胜利后，很多干部身体不好，国内没有条件，党中央便把他们送到这里，他们一面治病休养，一面听苏联专家讲军事、政治、经济、联共（布）党史等革命的理论。苏联专家讲课，由韩铁声当翻译，他的俄语名字叫伊万诺维奇。后来，红军将领们陆续回国，韩铁声便到儿童院来当老师了。

红军长征干部休养所离儿童院并不很远，每逢休息日，都有人来看望他们。每次来人，都为他们带来糖果、点心。在异国他乡，见到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像见到亲人一样，很是亲热。孩子们也排练了一些节目，表演给他们看，有俄罗斯民间舞蹈、小话剧、诗歌朗诵……岸英的嗓门高，喜欢朗诵，在台上，他站在前排，右手向前方一伸，就朗诵开了，很富有感情，很投入，像个演说家。其他人站在后排为他伴唱，气氛很活跃。岸英还喜欢唱歌，经常唱的是一支俄国歌曲《含羞草》。

中国孩子吃住在儿童院。白天，就到附近的苏联学校去上学。放学后，儿童院安排了很多业余的小组活动，有军事组、摄影组、芭蕾舞组、航模组、绘画组、刺绣组、墙报组……岸青参加的是绘画组，他喜欢画画儿。岸英的文章写得很好，母亲在他小时候教他学习古文，后来他又特别爱看书看报。儿童院里办墙报，他是编辑，李特特是美编，常在他写的文字稿旁画些山水人物图案或是写上美术字。岸英是军事组的组长，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关心，什么芬兰战争、兴凯湖对日战争等等，他都十分注意，认真钻研，讲起来头头是道，显示出很强的军事才干。

冬天，是孩子们最活跃、最开心的季节。他们都学会了滑雪、溜冰。打雪仗是大家踊跃参加的活动。岸英个子大，男孩子都愿意跟他在一方。打起仗来，女孩都是他手下的败将。但是女孩不服气，打败了也不气馁，跟他对着干。他滑冰、滑雪技术都很好，很娴熟灵活，在女孩面前，他经常故意露两手，显示显示。他对文体活动都爱好，踢足球、打排球……

少先队每次组织野营，岸英总是作为领导人物出现，因为他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他个子高，力气大，野营途中，常帮助女同学和年纪小的同学拿东西。作为回报，女同学也总是把带的食物分给他一部分，他饭量大，吃得多，女孩就当他的“后勤部长”。

毛泽东看到儿子写的文章，由衷地感到高兴，并且百看不厌毛岸英的第一篇文章是一封信，发表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第六版上。这封信发表后，在边区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阅读。岸英的父亲——毛泽东看到后，也为儿子的成长由衷地感到高兴。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中国儿童在苏联

这是一个16岁（发表时应为17岁——作者注）的小朋友从苏联写来的信，我们可以在这封信里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儿童的热烈的爱护和对中国抗战的伟大的同情。值此“四四”儿童节纪念大会开幕之际，把这封信发表出

来，作为一件宝贵的礼物，同时我们也代表全中国的儿童向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全苏联的人们及儿童们致敬。

——编者

我用极大的热情写这封信给你们，述说一下我们在苏联的生活情形及苏联人民对于我们的待遇及对中国人民的热烈的同情。

我于1937年初来到苏联后，真好比到了天堂一般。当我在中国时，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幸福的生活，苏联的人民看待我们比看待自己的儿童还要好，把我们当做上等的贵宾看待，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圆满和快乐。

我和其他的中国儿童住在一起，我们所住的房子真可说是头等的楼房。里面陈设得美丽精致，又宽敞，又清洁。有图书馆、有打球室、有游艺厅、有图画室、有运动厅、有自修室、有电影、有演剧及表演台等；外面则更是雄壮：有足球场、有篮球场、有对球场（排球场）、有网球场，有专门的运动场，有专门的避风雨、避太阳的亭子，有我们自己所种的菜园子，有天然供给我们的游泳、钓鱼、划船的河流等。真是说不尽讲不完。

我们每天三顿大餐和一顿茶点，早饭后有苹果和橘子吃；下午有糖果或饼干等吃。每周六、日至少有一次电影看。电影都是有声电影，有关于国内战争的，有关于伟大领袖列宁的，有关于破案侦探的，有关于苏联儿童的幸福生活的，有关于苏联国际军事力量的，还有关于中国的，例如：《中国给以反抗》、《英勇的中国》、《中国在斗争中》等等。除此以外，我们还常到戏院里去看戏。

时常有人请我们去做客，而每次则总有我参加（我是二十个中国儿童团员的主席），同时，总是要我去用中国话演讲（致词）。

我记得第一次我用汉语致词时，有点讲不出来（发慌），但第二次就好多了，第三次、第四次则更不慌不忙的了。

有一次，内务部的俱乐部在过新年时，请我们去，同时还请西班牙的儿童，西班牙的儿童用西班牙语发了言（另一个则用俄语翻译），当我发言时，差不多每一段话都引起了热烈的鼓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发慌。特别是当我讲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时，说到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得到胜利的时候，更是掌声雷动。

苏联的人民是多么同情我们中国的抗战啊！还有一次，我记得是白俄罗斯果麦儿城（省城）开全城儿童代表大会（由红色救济会组织），也请我们去。当时只派了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女孩妮妮去。我们坐在飞快的火车上，不到一天就到了。当我们下了车，一出车站时，只见广场上挤满了人群，儿童团员们排着队迎接我们，还有人送我们鲜花。他们打着旗，吹奏音乐，真好像迎接一位什么大领袖一般。因为人越挤越多，简直走不出去，就是民警帮忙也挤不出去，后来没有办法，只得坐在汽车上冲出去。后面的人群跟着我们的汽车跑。但汽车到底比他们跑得快，他们很快地就追赶不上了。我用手向他们摇动，表示对他们的抱歉与感谢。不一会儿，我们到了一个大旅馆门口，推门进去，就上楼。此时，市党部书记、市青年团书记、果麦儿城红色救济会主席、儿童团总队长等都来了，他们询问了我们一些情况问题，我都圆满地答复了。

我们休息在一间很阔气的房间里，特别使我们高兴的，就是听说这房间曾是苏联国防委员长、著名的伏罗希洛夫大元帅及著名的苏联骑兵总司令布

将纳（布琼尼）元帅所住过的房间。

晚上6点钟时，大会应该开幕了，我们当然也要去。在路上，我们遇见了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政府委员）及果麦儿城省教育厅长普鲁多妮可娃女士，她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开会的地方，它是果麦儿城的儿童宫，从前是一个地主和王侯伯斯容维奇的住所，现在改为果麦儿城的儿童宫。里面宽大得很，有各种各样的设备，组织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如：航空组、海军组、摄制组、音乐组等。很多儿童在功课完后就到这里来，多么幸福！我们一进场时，忽然掌声大作，大会的代表们都向我们中国儿童的代表敬礼，热烈地欢迎我们。

掌声静后，就开始选举主席团。第一名就是“贵宾”的我，第二名就是与我同来的妮妮小姐。再就是市党部书记、青年团书记、最高苏维埃代表及教育厅长普鲁多妮可娃女士，以及其他等等。先由果麦儿城红色救济会主席报告。然后就是我用中国语致词（妮妮作翻译），当我们起坐走到讲台时，一阵热烈的掌声真是如雷贯耳。

我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他面对侵略者日寇的斗争中，是要胜利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尤其是伟大的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帮助，使中国人民更有多倍的力量和勇气，更能很快地战胜日寇。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忠实、最好的朋友——！”当我讲完后，一阵热烈的大鼓掌，真有可能把屋顶震破。掌声稍静后，红色救济会主席忽用粗高的声音喊道：“与日寇斗争的伟大中国人民万岁！”恰巧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也在那里高呼口号：“英勇的中国人民万岁！”两个一起喊，使着劲，弄得很是有趣。“我们亲爱的斯大林同志万岁！”下面又有人在那里喊。“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又是一个有力而雄壮的口号。

次日，我又被请到马克思学校、斯大林学校及铁道工人子弟学校去演讲。每一次都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万岁”、“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的”等等雄壮的口号，每次都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说不出的感觉。我想不仅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就是全中国人民（除了汉奸、匪徒们）、全中国的儿童看到苏联的人民、苏联的儿童，这么热忱地欢迎中国儿童，这么衷心地同情中国的抗战，也一定感到非常兴奋和欢喜的。

在苏联，每份报纸上，每天都有一大篇关于中国的消息。战情和游击队的活动消息，每天都有。常有关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表示的英勇战绩的登载，常有苏联记者的通讯，有关于中国的各种论文。除此以外，还常登载中国抗战的各种照片。中国军队若得到了什么新胜利，苏联的报纸总是用注目的大字标题登载。同时，一些领导人的演讲及其名人的谈话等，也总是用大字标题写着。

总之，苏联的报纸在精神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是具有极大的同情和帮助的。对于日寇则恰恰相反，不是登着“日军的进攻遭受完全破产”，就是写着“日寇后防的不安”、“日本的经济崩溃和物价的高涨”、“日军受了大损失”等等。在最后一个时期，除了日军的每天损失外，在每半个月内，差不多都有一个日军的损失统计，两万、三万、三万五千、四万……死的真是不少。

除了报纸，苏联的各种杂志周刊上也常有关于英勇的中国人民斗争的速写文章，同时，还有许多的精神上帮助中国抗战的标语图画。例如，有一张

标语图画上，画着一个中国士兵用刺刀刺着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爬不动的日寇，并用红字写着：“与日寇作斗争的中国人民万岁！”除此以外，苏联的无线电每天总要播四次新闻，早上七点钟及晚上十一点半，差不多总是有中国战情的广播报告。其他的中国消息，则大都在十二点、六点钟传报。我差不多每天早上七点钟都去听的。

若在过什么大节时，例如十月革命节和“五一”节，苏联的无线电更是在精神上同情中国的抗战，有时还要请中国人去广播演讲，或是从重庆接电话过来，再广播全国。总之，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具有极大的同情的；同时，我想中国人民对于苏联人民也一定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俄国学校里学习。我要百倍、千倍地完成我的学习。我很注重于政治和军事，成为一个很好的宣传家，并且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以便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的事业而奋斗。我坚决地相信在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一定会被建设成一个先进的、自由的、幸福的强国。在那个时候，中国将享受自由与平等的生活，中国的儿童将得到免费学习的权利，将不再过那种贫苦的生活，那时啊，中国是伟大的、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了！

亲爱的祖国同胞，信已经写得很长了，不可再往下写了，再会吧！若有机会，将来还可以写信给你们，但我也希望你们写封信给我及全体的我们。我以极大的热情等待着你们的信。最后，向坚决领导全中国抗战的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领导者——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以及全中国的英勇抗战的将士致以最热烈的敬礼！同时，也向全中国的儿童——未来新中国的主人翁致最亲切的兄弟的敬礼。岸英的这封信，洋洋洒洒 3500 字，充分表现了一个中国少年的组织能力与表达能力，用词遣句都很有分寸。岸英的这篇文章，作为父亲的毛泽东是百看不厌的。

周伯伯和邓妈妈来到儿童院。

“你们都是周伯伯的好孩子”1939 年的岁末，儿童院的孩子们张灯结彩地准备迎接新一年元旦的到来。正在忙碌的孩子们被突如其来的消息激动了，“周伯伯要来儿童院啦！”“周伯伯要来看我们啦！”孩子们高兴地跳着、叫着。儿童院的几十个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得知周恩来伯伯要来看望他们，兴奋得像盼望过新年一样。那边，孩子们赶忙排练精彩的节目，要表演给周伯伯看；这边，孩子们一面扎着鲜艳的纸花，一面热烈地谈论着。

在他们中间，很多人曾见过周伯伯、邓妈妈，那些没见过的孩子立即把见过周伯伯的人围在了中间，带着羡慕和急切的心情问这问那……毛岸英没见过周伯伯，但是他知道周伯伯跟爸爸一样，是位受人尊敬的、非常了不起的人，是最好的人。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大谈着周伯伯、邓妈妈是怎样关怀着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中间说得最多的要数蔡博和郭志成了。

岸英急于想更多地知道周伯伯的情况，不住地催促着蔡博和郭志成：“快说，快说，别净卖关子喽！”

蔡博的父母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妈妈向警予是党中央委员，妇女部长，1928 年 5 月 1 日在武汉被反动派杀害；他的父亲蔡和森是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的常委，1931 年 6 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母亲和父亲先后牺牲，蔡博并不知道，那时他和妹妹的年纪还小，他正在湖南老家湘乡东山学校上学。1938 年 10 月下旬，日本占领了武汉，周伯伯转移到长沙。一到长沙，周伯伯便打听蔡和森烈士子女的下落，当他听说蔡博

兄妹住在湘乡老家时，便派人到湘乡，在十八集团军驻湘乡转运站的协助下，很快便找到蔡博兄妹俩，并接到长沙。后来，周伯伯安排他俩转到重庆，与周伯伯住在一起。在和周伯伯、邓妈妈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们待蔡博兄妹像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

没等蔡博说完，郭志成便接过话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我也是周伯伯派人找到的。我爸爸郭亮 1928 年被何键杀害在长沙。爸爸牺牲后，妈妈带着我到了长沙县铜官乡下躲避起来。一天，妈妈接到地下党的通知，便带我到武汉八路军的办事处。我们在办事处住了十多天，就和周伯伯他们住在一起。周伯伯和邓妈妈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周伯伯和邓妈妈可喜欢我啦，给我买了许多玩具。后来由项英伯伯带我们到延安。我们去看了毛伯伯，我知道毛伯伯喜欢吃鱼，延安又没有鱼吃，我就把妈妈给我的两个鱼罐头送给了毛伯伯。后来，蔡畅姑姑把我们从小疆秘密带到苏联……周伯伯一见我，准认得的。”

郭志成很自豪地讲述着，边讲边手舞足蹈。其他见过周恩来的男孩女孩，都争先恐后地用感激和敬佩的语言，向大家介绍着敬爱的周伯伯。

“周伯伯有孩子吗？”岸英听得入了迷，突然提出了这么个问题。

“当然有啦！”郭志成想当然地答道。

“听妈妈说，邓妈妈没有孩子……”一个女孩子歪着头说。

孩子们突然你看我，我看你，沉默了。

“去问问阿烈耶夫老师。”岸英提议。如果周伯伯有孩子，也到莫尼诺儿童院来学习，那该多好啊！阿烈耶夫被请来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孩子们的提问，只是说：“你们中间有许多孩子的父母，都被国民党杀害了。可是周伯伯、邓妈妈像亲生父母一样爱着你们，关怀你们，你们都是周伯伯、邓妈妈的好孩子啊！”“嘟——嘟……”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周伯伯来了，快去迎接呀！”岸英耳朵灵，一听汽车喇叭声，第一个奔出了大门。

孩子们拥到汽车旁边，仔细一看，周伯伯不在车上，从车上下来的是满面笑容的邓妈妈。

“邓妈妈，邓妈妈！”

蔡博、郭志成，还有许多受过周伯伯、邓妈妈直接关怀的孩子们，都围过来，簇拥着邓妈妈，流着幸福的泪花，亲热地大声叫着。

邓妈妈今天特别高兴，能在莫斯科郊区见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她笑咧了嘴巴，不住地点头，“噢，噢”地忙着应诺，还不时在这个男孩头上摸摸，捧起那个姑娘脸蛋亲一亲，激动得眼里含着泪花。看着这些健康活泼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她多么开心啊！

蔡博向邓妈妈介绍了岸英、岸青。她一手搂一个，仔细地打量着这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摇着头，嗫嚅地说：

“孩子，你们受苦了。”

本来笑盈盈的岸英，突然得到母亲一样的爱抚，心里一热，眼泪簌簌地往下掉。邓妈妈用温厚的手，替他揩干眼泪：“孩子，别哭了。来，快来吃糖吧，大家都来吃糖！”

邓妈妈把糖果分给孩子们。在鲜花一般的孩子们的簇拥下，邓妈妈来到了他们的活动室。

邓妈妈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对孩子们说：

“周伯伯在莫斯科治胳膊。他很想你们，这封信是他用左手握笔写的，

向你们问好，以后胳膊治好了，他会来看你们的。”

邓妈妈说完，孩子们劈劈啪啪地鼓起掌来。接着，由一个女孩子宣读了周伯伯的问候信，信一读完，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原来，周伯伯非常忙碌，虽然到莫斯科是来治伤的，然而他并没有休息，就在岁末的这些日子里，他还在忙着撰写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状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为了赶在年前写完这个数万言的《备忘录》，他只好推迟到儿童院与孩子们见面的时间了。

“孩子们，你们把学会的文娱节目向邓妈妈汇报表演一下吧！”阿烈耶夫说完，孩子们就高兴地在房子里跳起俄罗斯民间舞来。邓妈妈看着这样幸福活泼的孩子，笑得更合不上嘴了。

“给周伯伯写信慰问慰问！”岸英灵机一动，提议说。

“好哇！好哇！”大家拍手赞成。

于是，阿烈耶夫代表全体中国孩子，给敬爱的周伯伯写了一封慰问信。邓妈妈离开儿童院后，阿烈耶夫还代表全体师生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向他详细汇报了孩子们在儿童院的学习、生活情况。周恩来十分满意，他嘱咐阿烈耶夫把孩子们的简况编一个花名册给他。临走时，又再三嘱咐：“回去向孩子们转达我的问候，我的伤稍许好些，就去看望他们。”

阿烈耶夫带来了周伯伯的亲切问候。孩子们更加盼望周伯伯早点儿来儿童院，大家能够早日看到敬爱的周伯伯。岸英的心情更加急迫。

1940年元旦那天，孩子们盼望已久的周伯伯在邓妈妈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当年周伯伯40岁刚出头，他日夜为革命操劳着。孩子们哪里知道，直到前两天，也就是12月29日，他为共产国际写的备忘录才完稿，共5.5万字。周伯伯在苏联治病期间，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医生给他注射麻药后，就硬把胳膊掰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麻药效力消失后，疼得他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由得叫喊，急得大家团团转，然后他还要忍着巨大疼痛，咬牙挺着，进行按摩，以便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使他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因此，来到儿童院那天，周伯伯比较瘦弱，面色显得有些清癯。然而，他精神饱满，一看到中国孩子——这些革命家的后代，他自己也仿佛变得年轻了。他的右手微微向胸前弯曲着，不能做较大幅度的摆动。

周伯伯穿件深灰色西装，满面慈祥地笑着，跟所有孩子都握了手，挨个地问：“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当邓妈妈把岸英、岸青拉到周恩来身边时，周伯伯非常激动，眼里闪着光泽，把两兄弟一左一右紧紧地搂在怀里，轻轻地摆着头，无限感慨地说：

“找到你们，可不容易啊！”

听了周伯伯的话，岸英兄弟也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在周伯伯、邓妈妈的身边，他们感到和当年在爸爸妈妈身边一样温暖……

也许岸英并不知道，当年为了寻找他们，党组织费了多少心血。

周恩来在上海滩寻觅岸英、岸青，

交通员小彭为保护他们被丢进了黄浦江

原来，叔叔毛泽民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后，党组织便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站天生祥酒行的余老板关心着岸英兄弟俩。由于环境的残酷，余老板也时时都为岸英他们担心，生怕出差错，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送他们到苏联去。不久，党内出现了叛徒，而且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中央主持交通和特科工作的负责人顾顺章，其危害性非常大，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收养孩子们的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孩子们都分散到四方，有的投亲，有的靠友，大一点的孩子便设法安排去做工。因岸英兄弟在上海举目无亲，余老板匆忙地把他们安置在法国天主教堂供事的地下党员董牧师家中。开始，党组织还能给董牧师家一些经费，岸英兄弟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地笼罩着上海，天生祥酒行出了事，余老板被捕了，不但岸英兄弟的经济来源断了，而且董牧师和党组织的联系也断了，环境越来越恶劣，董牧师家里也住不下去了。几经转移，岸英兄弟便下落不明了。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神色十分严峻，两道浓眉紧蹙着，眼睛寻视着在座的几位同志。在周恩来严肃的目光下，大家都感到非常内疚，毛泽东正率领红军与敌人殊死战斗，他的孩子却不见了，同志们纷纷检讨自己，“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孩子照顾好，我们有责任……”周恩来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一点责备大家的意思，而是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要讲责任，党中央负责，我更有责任，我要作检查。但是，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赶快找到岸英兄弟。否则，我们更对不起毛泽东同志。”他的诚恳、负责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认为他说的非常对，当务之急是找到孩子，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分析情况，献计献策。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又听到周恩来说道，岸英兄弟才八九岁，肯定不会走得很远，如果没有被人收养的话，一定混在流浪街头的孩子们中间，上海这种流浪儿童很多，都是无亲无友、无家可归的，重点在这方面找一找，可能会找到的。不过，上海这么大，流浪儿又很多，找他们要多派一些人。但是，千万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冒失。岸英跟妈妈一块儿坐过牢，看到过反动派是怎样折磨和杀害他的妈妈的，吃过不少苦头，对反动派非常仇恨，警惕性是很高的，不会轻易相信不认识的人……大家听到周恩来的分析，都非常信服。交通员小彭自告奋勇地请求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小彭是联系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交通员，又是湖南人，地下斗争经验很丰富。周恩来很满意，可是他还是再三叮嘱小彭说，光靠你一个人不行，上海这样大，要把交通员动员起来，分头到各处寻找。

不久，小彭便在四马路、五马路（即现在的福州路、广东路）一带，发现两个报童，大一点的有八九岁，小一点的有七八岁的样子，两个人蓬头垢面，头发长得遮住了耳朵，操着湖南腔叫卖着“卖报！卖报！”很像是岸英兄弟。他没有惊动他们，而是远远地跟着。开始时两个孩子发现老是有一个人模样的年轻人跟着他们，很戒备，时常趁他不注意时，悄悄溜走。渐渐他们发现，那位工人叔叔很和善，并没有恶意，反而经常买很多份报纸，包括卖不掉的过期报纸。后来，他们慢慢友好起来，小彭有意识地用湖南话和他们拉家常。听到熟悉的口音，小一点的孩子也用湖南话和他攀谈起来。大一点的孩子比较老成，看到这种情况，向小一点的孩子使了个眼色，扯扯他的衣角，说：“我们回去吧！”看到这种情况，小彭没讲什么，只是会心地微笑着。他把发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考虑到小彭是党中央交通员，不便长期跟着岸英兄弟俩，周恩来便又另外派了两个小交通员暗地里注意并照顾岸英他们的生活……

然而，这种情况又没有维持多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到中央苏区去了。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小彭叔叔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

这些，岸英未必完全了解。然而，也许他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有位年轻的叔叔经常向他买隔日的旧报纸，经常有人来关照他们……他可能不知道，这些都是敬爱的周伯伯——尽管今天他才第一次见到周伯伯——安排的。在当时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周伯伯包括小彭叔叔他们本身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的，可是他们仍然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条件，暗中保护着、关怀着岸英兄弟。

岸英可能更不知道。为了保护他们兄弟，那位和蔼可亲的小彭叔叔被捕后，吃尽了苦头。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知道他是党中央的交通员，对他施加了残酷的毒刑，要他交出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至死不屈。特务又要他说出毛泽东儿子的下落，并引诱他说，只要把毛泽东的儿子住在哪里告诉他们，便可以放他出去。面对敌人的利诱，小彭冷笑了一声说：“孩子住在哪里，我知道！但是，他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是找不到他们的！”见来软的不行，特务气急了，吼叫着：“快说！他们在哪里？”烧红了的烙铁又贴在小彭那被烫焦的胸口上，他痛得昏死了过去……敌人见从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无计可施了，便在一天晚上，把他装进麻袋，丢进了黄浦江里。小彭他宁死也不屈服，视死如归，就在临终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哼一声。

党组织后来又是怎样找到岸英兄弟的呢？

这个问题，岸英在轮船上曾问过李杜将军，但李将军并没有回答他。他的责任是把岸英兄弟送到法国，交给来接头的人，再由那个人带他们到苏联去，至于离开上海前的情况他并不清楚。

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找到他们兄弟很不容易。”的确，为了寻找岸英兄弟，地下党组织费了很大的力气。当年周恩来每到一地，都要委托当地的党组织设法寻找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后代，并千方百计地把他们送到延安，送到苏联，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像蔡博兄妹、郭志成……很多很多孩子。寻找这些孩子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麻烦，然而再难，也不像寻找岸英兄弟那么难。周恩来一直把寻找毛泽东孩子的事放在心上。以至到后来，1946年他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期间，还专门派地下党的交通员打听毛泽东另一个儿子毛岸龙的下落。这次，他在苏联中国儿童院见到岸英兄弟，可想而知，是非常高兴、非常欣慰的。

那么，1936年党组织是怎样找到岸英兄弟的呢？原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有了落脚点，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在陕北担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叔叔毛泽民在保安筹集粮食，他听说担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要到西安去采购物资，便找到他，要他到西安后打听一下有没有人要到上海去，毛泽东的三个孩子还在上海，几年了，不知道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请到上海的同志和上海地下党联系，帮助找回来。钱之光到西安后，正好碰到潘汉年，他正要动身到上海，钱之光便把毛泽民交代的任务委托给了潘汉年。潘汉年到上海之后，便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同时也把寻找毛岸英兄弟的事情委托给了上海地下党的同志。

寻找工作虽不像大海捞针，但也难度相当大。这几年，上海一直处在白色恐怖环境中，自从中央交通员小彭牺牲后，另外一些知情的人，有的被捕牺牲，有的随党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这些人也都不知下落。就是个别在上海的人，也因环境恶劣而隐蔽了起来，他们也不知道岸英兄弟的近况。党组织派出交通员查找线索，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目标……

渐渐的工作有了眉目。

193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在岸英他们栖身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位工人模样的上了年纪的人。他有意接近岸英兄弟，先跟他们扯家常，又像摸他们底细。岸英对来人抱着怀疑的态度，备加警惕，起先是沉默不语，半天也不说一句话，而且还悄悄地从地上捡起两块砖头，准备出现情况时好用它来战斗。渐渐地，从老工人的言谈当中，他看出来人并不是坏人，便又把砖头悄悄地放下了。他愣着眼神看着这位大伯，不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自己情况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等他确实证实了这位大伯真的是爸爸派来寻找他们兄弟的，这个饱受人间痛苦、很少掉泪的坚强的孩子，一头扑在大伯的怀里，伤心地哭开了……这哭声有对父亲的思念，对母亲的哀悼，对小弟的怀念，也有对旧社会的仇恨，对5年来流浪生活所受凄苦的诉说……兄弟俩伤心地痛哭着，大伯的胸前都被他们的泪水浸湿了一大片。这位工人师傅知道了这两个孩子真是岸英、岸青以后，心中非常兴奋，开始时还满脸笑容，仿佛找到什么宝贝似的，可是很快便被两个孩子伤心的痛哭感染了。孩子受了不少的罪啊！他一把搂住了两个孩子的肩膀，任他们痛快地倾吐着心中的苦水，嘴里只喃喃地念叨着：“孩子，你们受苦啦！……”等他俩哭够了，工人师傅也用手抹了抹眼泪，长叹一声，对两个孩子说：“孩子，这不仅是你俩两个人的苦，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和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样苦的呀！你们的父亲不正领导着红军与反动派斗争吗？等打倒了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穷苦的人才能有好日子过！”

工人伯伯把岸英兄弟又安置在董牧师家里。

孩子找到了，上海地下党下一步安排是把他们送到苏联去。当时，各项工作都刚刚开展起来，这件事情也是很棘手的。党组织想尽办法，通过各方面的统战关系，由国民党的一位非常有影响的高级将领介绍，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把岸英兄弟和董牧师的儿子一同带出国。

在董牧师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地下党便把岸英兄弟托付给了那位“王叔叔”……

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难怪周恩来说：“找到你们真不易啊！”

“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呢？”周伯伯慈祥地问岸英。

岸英红着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很喜欢政治和军事，我想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而奋斗！”

周伯伯满意地点着头，和蔼地审视着岸英高高的身材、坚定的目光，连声说：

“好，好！继承父辈的意志，打天下。”

“你们呢？”周伯伯的视线在每个孩子脸上扫视着，询问着。

孩子们先是短暂的沉默，低着头不做声，然后互相推诿着，都不好意思第一个说话。

“还怕羞呀？一个人没有理想，就像没有翅膀的鸟一样，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的。”周伯伯进一步启发大家。

“我想当飞机设计师！”

“我当医生！”

“我当建筑师！”

“我当农学家！”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讲开了，周伯伯开心地哈哈大笑：“好极了！你们的想法很对，等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家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工程师、教授！”

周伯伯接着向孩子们介绍了国内战争的形势，指着房间墙壁上挂的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说：

“毛伯伯、朱伯伯时刻关心着你们这些革命后代。你们一定要团结友爱，刻苦学习，除了学习一般的苏联功课外，还要学习中国的历史、地理，了解中国抗战的形势。总之，你们不要忘了中国，不要忘了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孩子们认真地聆听着，会意地点着头。

就是在这次见面时，周恩来鼓励岸英把他们在苏联生活、学习的情况写下来，等他回国时带回去，好让国内的人们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情况。岸英按照周伯伯的要求，写下了那封充满激情的长信。

周伯伯就要离开儿童院了。他提议跟大家合影。摄影师由儿童院摄影组的同学担任。周伯伯、邓妈妈先和全体同学合影，然后跟岸英、岸青一起照了相，再和蔡和森家的一男二女合影，又跟郭亮、张太雷、赵世炎等烈士遗孤照了相。

当年照片上的亲亲热热、欢欢喜喜的形象，一直保留到今天。

异国相逢贺妈妈。岸英教贺妈妈学习俄语，

毛泽东的小儿子不幸夭折

自从妈妈牺牲后，毛岸英兄弟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讲已经非常生疏了。

1938年一个春天的上午，阿烈耶夫老师领着一位高高的身材、30岁上下的女干部模样的人，来到岸英兄弟面前，向他们介绍道：“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岸英兄弟来到苏联一年多了，他们没有亲人在这里，也不曾有人专门来看望他们兄弟俩。平时，在莫斯科疗养院休养的红军长征干部们，除了看望自己的子女外，一般都是来看望全体孩子们。有时岸英他们也作为孩子们的代表到疗养院去慰问叔叔、伯伯、阿姨们。另外，他们俩常到共产国际的宿舍中看望那位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奥地利人李德，以前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而现在他只是“国际”普通翻译而已。岸英当然不清楚他在中国根据地内的所做所为，和他相识，还是他从中国回到莫斯科以后。除此之外，他们兄弟俩再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人与他们有关系。

面对这位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女人，岸英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她不像平时来看望中国孩子的叔叔阿姨，好像她与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可是，我又该怎么称呼她？也叫她阿姨？他一时不知所措，干脆一声不吭，同时他又用审慎的目光，偷偷打量着来人。

只见她瘦长的个子，浓眉毛大眼睛，温和的面庞上带着略显尴尬的微笑，然而从她的表情里又透露着疲惫，显示着几分忧郁。岸英他们不知道，她是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抉择后才到苏联来的，而且严酷战争环境和万里长征跋涉，把她的身体搞垮了。前不久，她还到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深嵌在她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和身体长在一起了，再不可能动手术取出来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她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见到岸

英兄弟，她也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怎样启齿，只好回过头问阿烈耶夫：“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看到双方的不自在的样子，阿烈耶夫忙来解围：“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他是弟弟岸青，又叫戈勒。”说完他又转过身来，向岸英兄弟俩介绍说，“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文英。”

贺子珍脸上漾着笑意，亲昵地说：“你爸爸可想你们哪！”

岸英一时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妈妈，那就是生他养他亲他爱他的杨开慧。虽然她已经牺牲很多年了，但是她每时每刻都活在他们心中，现在这个女人怎么成了“妈妈”呢？对他来说这是不能理解的，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此时他显得比刚才冷漠了，还不满16岁的少年，又经历过那样的特殊历程，要想让他的感情转过弯来，是很困难的。

他也不喊她贺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父亲毛泽东的情况。虽然来莫斯科后，他就给父亲去过信，寄过照片，但对于父亲现在的家庭生活，他一无所知，从中国来的人，也从来不在岸英面前提起这些。

“你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于是贺子珍打破僵局。

阿烈耶夫发觉自己在这种场合，是个多余的人，便招呼贺子珍坐下，自己悄悄地走开了。

贺子珍见岸英岸青的床铺脏乱得一塌糊涂，便以母亲特有的本性，把爱洒在孩子们的身上。她将手中提的一网袋水果放在桌上，弯下腰替他们清理床下的“杂货摊”。她的举动，弄得岸英岸青直伸舌头，表示不好意思。接着，她又把兄弟俩换下的衣服，卷成一堆，拿到河边去洗干净，晾好……看到她屋里屋外的忙着，岸英虽然也觉得很过意不去，然而他还是面无表情地跟着干起来，没说一句话。屋里像样子了，也把贺子珍累得够呛。他们又重新坐下来，她把苹果削好了送到兄弟俩面前。开始，岸英不愿意也不好意思接受，可看到贺子珍的一片真诚和充满母爱的眼睛，岸英便消除了敌意，忙着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但仍没喊她贺妈妈。

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儿童院相隔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贺子珍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望兄弟两个，像慈母一样关怀他们的衣、食、住、行。因为当时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干部及疗养人员的待遇还不错，每月有70个卢布，除了吃、穿外，尚有节余，贺子珍便把剩余的钱花在两个孩子身上，尽量地给他们温暖和母爱。

渐渐地他们的关系融洽了，虽然岸英、岸青的学习很紧张，但只要有空儿，他们也去看贺子珍。贺子珍住在共产国际办公楼的一间小房里。

过了几个月，岸英兄弟觉得她有一段时间没来儿童院看他们了，难道是病了吗？他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应该去看看她。此时，他们感到她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刚一进她的房间，岸英便发现了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这是贺子珍到苏联后生下的毛泽东的又一个儿子。

“唉唷，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岸英盯着那个脸上打着皱巴的小男孩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欢，婴儿额头高高大大的，鼻子眼睛都酷似毛泽东。

“哎哟！这个小男孩怎么有点像我呀？”岸青好像发现什么似的，轻轻抓着小孩的手腕，欢喜得爱不释手。

看到岸英兄弟俩的惊喜样子，贺子珍会心地笑了，这样的笑容是她很少有的。“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父亲呀！”岸英不知怎样表达他的欢喜之情，喜滋滋地把小弟弟的手往他的嘴里塞。对他的粗鲁表示，这位小弟弟可不领情，一点面子也不给，“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以前，贺子珍单人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里，现在有刚出世不久的小男孩陪伴着她了。打这以后，岸英和岸青就经常来看望她和小弟弟。每次来，他们都要逗小弟弟玩。有时岸英帮助贺子珍补习俄语，有时贺子珍给他们讲井冈山的战斗故事，讲中央苏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的情景，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讲他们的父亲，讲自己负伤时的痛苦经历……兄弟俩听得入神，有时开心地哈哈大笑，有时又伤心地掉下泪水……岸英特别喜欢贺子珍唱江西民歌，尤其喜欢由民歌改成的红军歌曲，那一声清脆的“啊呀来嘍……”像是把人带回到祖国秀丽的江南，使人精神振奋……

每到这一时刻，贺子珍便不再孤独，她的小屋里便充满了家庭般的欢乐气氛，掌声、歌声、笑声……

岸英兄弟俩都非常爱这个小弟弟，岸青老争着要为他起个名字。看着兄弟们的亲热劲，贺子珍故意地问他们：“叫个什么名字好呢？”岸青抢着先说：

“起个俄文名，叫卡秋莎吧！”

“你算了吧，干嘛叫卡秋莎，那是大炮的名字，即使是人名，也是女孩子的名字。”岸英不同意弟弟的意见，“要不……就叫罗曼诺夫吧！”

“这是沙皇的名字，好不好！”贺子珍不知不觉中也搅到这当中来了。

“那就叫什么‘斯基’吧！”这回岸青一本正经地说道。

“还司机呢，又不开汽车，干脆还是叫什么‘洛夫’吧，比叫‘斯基’好！”岸英汉语俄语混用一起了。

看着兄弟俩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而那位小弟弟却瞪着小眼睛，安详地躺在那里，并不知道因为他所发生的这场“战争”。贺子珍乐坏了，笑得直不起腰来，肚子都笑痛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停下来，她舒了一口气说：“好啦，好啦，你们别争了，等以后再给他起名字吧！”

岸英比贺子珍早一年来到苏联，而且年纪也小，在学习俄语方面掌握得非常快，也不费劲。可是，贺子珍一来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二来身体不好，伤病缠身，到苏联来又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陌生，学习俄语很吃力，现加上又有这个孩子，生活拖累使她更觉得学习很困难。但她还是顽强地学习着。为了能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上课时，她不得不将孩子寄托在婴儿室，等放学后，再接回自己带。

为了帮她赶上学习进度，岸英便成了贺子珍的俄语“老师”，从日常生活用语开始，一步一步地往深处学。一个认认真真，不厌其烦耐心地教，一个虚心好问刻苦地学，所以她进步还是很快的。在这种亲密的接触中，既提高了学业，也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母子感情。

有一天，岸英又到贺子珍那儿帮她补习功课，一进屋便发现气氛不对劲。贺子珍衣衫不整，也未梳洗，毫无气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岸英想，她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突然间像苍老了许多。再仔细看去，只见她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直呆呆的，眼珠一动不动，岸英敏感地觉察到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便四处张望，突然吃惊地发现小弟弟没在屋里。于是，他急切地问道：“弟弟呢？小弟弟呢？”

岸英这一声发问像是把贺子珍从睡梦中惊醒了一般，又把她引发了悲痛欲绝的境地，她嚎陶大哭起来，哭得泣不成声。

原来，为了学习，贺子珍狠着心坚持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去。前两天，孩子得了重感冒。怀这孩子的时候，贺子珍因伤病缠身，加上条件差，身体也不好，孩子出生后体质也就很差。婴儿室的工作人员马马虎虎，没有护理好，结果使感冒转成了肺炎，还没等送到医院，便不行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来到人间刚刚十个月，便在他乡异域夭折了。人们钉了一口小棺材，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公墓里。

这个打击，不但对贺子珍，对毛岸英来说也是巨大的。他是多么爱这个小弟弟呀！他是那么的幼小，连话都不会讲呢，还来不及叫他一声“哥哥”，便走了。他还没名字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想着这个可怜的小弟弟不幸的命运，他又想起自己曾经饱受过的苦难，曾经受过多少狂风暴雨的侵袭，童年便失去母亲，弟弟岸龙也不在了，现在又眼巴巴地见这么好的小弟弟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不由得也控制不住难受的心情，泪如泉涌……

过了好一会儿，他回过神来，想起那哭得要死要活的贺子珍，便用了好多话来安慰她，可都没有效果。看着她悲痛嚎哭的样子，他打心底里头难过，不由得勾起了他的思母之情。他动情地向贺子珍哭诉着：“贺妈妈，您别难过了，小弟弟死了，还有我和岸青呢，我们也是您的好儿子呀！”

他和贺子珍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从来没有直接称呼过她。喊她别的，不合适；可是让他叫她“妈妈”，他又总是张不开嘴。碰到必须得叫什么的时候，他不是打磕巴混过去，就是用“您”、“您”来代替。在这方面，贺子珍也明白的，由于感情的关系，她并不强求孩子们。此时此刻，大家处在万分悲痛之中的时候，双方的感情被小弟弟的不幸联接起来了，两个备受挫折的心灵碰在一起了，他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喊出了“贺妈妈！”岸青也在旁附和着，“贺妈妈！贺妈妈！”地叫着。

这真诚的、震颤魂魄的喊声，慰藉着贺子珍那颗趋于破碎的心。突然，刚刚还满床翻滚、痛哭不止的她，像被施加了魔法一般，停止了哭声，从床上腾地站了起来。一把将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儿呀！儿呀！”不停地叫着。岸英兄弟俩好像又回到当年，在妈妈怀抱里一样，感到母爱的温暖。一旁是刚刚失去幼子的母亲，“儿呀！儿呀……”的喊声；一旁是两个从小就失去妈妈的苦儿，“妈妈、妈妈……”地叫着；三个人抱作一团，又大声地哭了起来……这是一种悲痛与幸福交织在一起的情景。这一情景，让任何人看了，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流下一掬同情之泪。

不知不觉中，两年的东方大学学习生活结束了，贺子珍决心留下来工作，她也来到国际儿童院，在东方部教孩子们学习中文。她和岸英兄弟真正地生活在一起了。不久，1940年秋，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关闭，她又随儿童院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市，仍然在国际第一儿童院东方部工作。

1941年初，她的宝贝女儿娇娇（李敏）也来到了她的身边。当年她离开女儿到苏联来时，她还不满周岁，现在已经是4岁的小姑娘了，这对她来讲，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岸英兄弟又有了个小妹妹，也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在这远离祖国的冰城，母子母女四个人团聚了，建立了一个真正温暖的家，贺子珍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兄妹三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的一切都转向了战争轨道，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也要支援前线，生活费也停发

了，人人都要靠劳动去领取配给的食品。贺子珍接受的任务是为红军织毛衣、织袜子，每天要完成三双袜子定额，有时要工作到深夜，只有完成了任务，才能领到 300 克的面包。

战争带来的食物的匮乏，儿童院里的生活早已不像从前那样丰富，食品也异常紧张，岸英、岸青和娇娇每天的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粉粥，午餐和晚餐仅仅是一片面包和一盘盐煮土豆。这点食品连娇娇这样的小孩子都不够，更何况岸英兄弟俩，如今已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这点吃的还不够他们“打牙祭”的呢。当时，全苏联人民都如此，儿童院能保证一日三餐就已经是相当优越的了。

虽然自己每天也仅有几片面包，但是贺子珍惦念的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她总是把领到的面包分出一部分来收好，每到周末孩子们来到身边时， she 就把土豆切碎，烧好一锅汤，然后拿出面包来给孩子们吃。饿了一星期的孩子们，就像三只嗷嗷待哺的雏鸟扑向了她的身旁。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她总是慈爱地说：“慢慢吃，慢慢吃，别噎着，没有人来抢你们的。”她也吃不饱，加上原来身体就弱，经常感到体力不支，但她忍耐着，她要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省下来给孩子吃，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爱，这就是母亲的天性，这是自然界中最崇高、伟大的品性……贺子珍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岸英兄弟和娇娇身上。在工作之余，她放弃了休息，拿起锄头开荒种地，种萝卜、西红柿和土豆，尽可能为孩子们多提供一些食品。就这样，在这异国战争的环境中，他们一家人亲亲热热，同甘共苦地过着这艰难熬的日子。生活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岸英兄妹是幸福的……

可是不久，娇娇得了重病，贺子珍只好看护女儿，无法去劳动了。儿童院一位抱着大国沙文主义、不通人性的女院长故意刁难她，不发给贺子珍取暖的木柴。试想，这可是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冬啊！

性情刚强的贺子珍发火了，同女院长大吵了起来。女院长恼羞成怒，污蔑贺子珍是“疯子”，强行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

等到毛岸英他们得悉此事，贺子珍早已不知去向。从此，他也就未能再见到他那和蔼可亲的贺妈妈，他只能为不幸的、多灾多难的贺妈妈暗暗地掉泪。他太年轻了，还没有力量救出可怜的贺妈妈。

小领袖的大志向。

毛泽东万里家书，问候儿子

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的冬天，是一个冰封雪冻的银色世界，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地上的积雪有一两尺厚，在银灿灿的太阳照耀下，积雪反射着刺目的亮光。

爱闹爱笑的孩子们自然不愿呆在屋子里烤火。岸英是个坐不住的孩子头儿，他戴上护耳皮帽和皮手套，脚踩滑雪板，轻盈矫健地在雪上滑翔。他一会儿在树林里打旋，一会儿在斜坡上飞驰而下，简直像箭一般神速。他一面滑着，一面招呼其他孩子：

“决来滑雪啊！胆小鬼才坐在屋里烤火呢！”

“冲啊！”

一群男孩在岸英的带动下，一窝蜂拥了出来。广阔的雪原上，只见一个个黑点在飞动，在追逐。笑浪传到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的大门口，在那里观望的女孩子也忍不住了，一个接一个地踩着雪板撑着滑杖，小心翼翼地在雪地上行走，生怕摔倒了，叫男孩子们笑话……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欢笑声中，

度过漫长的寒冷多雪的冬天。

岸英在儿童院跟同学们关系都很融洽。在诸多的同学之中，他又和蔡博特别要好。蔡博是1939年到莫斯科的，他来到不久，便跟岸英交上了朋友，俩人志趣相投，甚是亲密，这也许是父辈遗传给他们的基因的缘故。蔡博的父亲蔡和森与岸英的父亲毛泽东是长沙一师的同窗挚友，俩人志同道合，无论是在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中，还是在推翻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一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还有蔡博的母亲向警予、姑姑蔡畅、岸英的母亲杨开慧……他们父辈的长辈都是革命的同志、好友。当年，外公杨昌济老先生称岸英的父亲和蔡博的父亲是他千百个学生中“尤赏心的两位”，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父辈的这种在志向追求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传给了子辈。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理想，谈怎样才能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想基础：父辈都是伟大的革命家，我们都是革命家的后代，同样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父辈开创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承接下来，将来革命的重担一定会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由我们挑起来走下去；现在我们要学习父辈的榜样，在革命洪流中，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岸英他们喜欢读历史书，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平时，他们总是爱钻研联共（布）党史、中国历史、政治理论等书籍，热衷于谈论政治、军事，关心国际形势、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未来……而有些女孩子喜欢看的是文艺书，爱读世界名著，要是有一本小说的话，她们都争相抢着看。平时，她们喜欢做的和谈论的是绣花、打毛线或养小动物……有时，岸英他们在畅谈未来和理想，女孩子们听见后就用讽刺挖苦的腔调大喊：“你们快来看呀，这里两位世袭的伟人！”对于她们的“讽刺打击”，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有时也反唇相讥地说：“你们这些小姐懂什么！”然后嘴里噓着“去！去！去！”把她们轰走了。岸英的信念非常坚定。

冬天慢慢地过去了，从南方飞回的大雁带来了春天的信息。可是，莫斯科的春天，与中国不一样，总是姗姗来迟，等着积雪都融化了，青草冒出了头，操场周围的女贞树吐出新芽再长成绿油油的新叶时，已是5月份了。

“在咱们湖南，在我的老家韶山、板仓，3月里满山遍野就都开满了映山红，一大片一大片的，鲜红鲜红的，真好看……”身处异国，岸英十分怀念着故乡，妈妈的形象又浮现在眼前……蔡博很理解他的心事，他也有着同样的感觉，一时间，他们都沉默了……他们在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亲人。这种情绪激励着他们，现在只有好好学习本领，长大了才能继承父母的事业，为祖国服务。

岸英兄弟在苏联开始了新的生活。远隔几千里的延安，正繁忙工作的父亲——毛泽东，那颗悬着的心落实了。但是儿子们的生活、学习到底怎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时常对着西北方向凝眸沉思，他心中仍然惦念着岸英兄弟。

儿童院里，在阿烈耶夫老师指导下，摄影组的同学用莱卡照相机，为同学们拍了许多照片。照片放大洗好后，编印成册，同学们纷纷寄回给亲人们看。岸英、岸青拍了张合影，拿到照片的当晚，岸英兴奋得睡不着觉，提笔写了封十几页的长信，信是写给父亲毛泽东的。在信中，他叙述了离开父亲后，跟妈妈一起坐牢、上海流浪以及到苏联学习的简单过程，倾诉了怀念母

亲、思念父亲的切切之情。

信和照片是托回国的人带回去的。经过长途跋涉，几番周折，信和照片终于送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喜出望外，拿着岸英岸青的合影，看了又看，眼泪模糊了视线，照片上，岸英兄弟都穿着圆领羊毛套衫，平头上戴着法兰西小帽。那小帽，中国孩子称为“番瓜帽”，没有帽沿，像只扁圆的南瓜（番瓜），顶上还有一个蒂子。两兄弟都抿着宽厚的嘴唇，相当严肃，没有笑容，没有他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所应有的天真烂漫，好像都在沉思中……毛泽东仔细看着，那浓眉、凤尾眼、宽阔的鼻翼，多么像他们的母亲；那丰满的厚嘴唇，又多么像自己。他的眼睛又盈满了泪花。现在，失而复得的两个儿子终于找到了，而且生活得很好。看岸英那手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多像自己少年时代的手笔啊！

毛泽东把岸英兄弟的照片放在枕头边，临睡前时常拿出来，看了又看，直到实在困倦了才睡觉。有儿子的身影在枕边，他睡得踏实多了。

有时，他也做梦，昼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梦见和儿子相聚了，儿子长得高高大大的，他高兴得笑出眼泪。第二天，他的警卫员替他整理床被时，发现他的枕中湿了一大片。

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了，挥笔写下一封信：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

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快乐，进步！

三月四日（一九三八年）事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并随带自己的照片。信一开头就询问：早一月给你们信收到没有？收到了，快写回信给我……

从此，父子间鸿雁传书不断。阅读父亲的信，对岸英是个莫大的鼓舞；看到儿子的信，对毛泽东是最大的安慰。

1939年8月26日，毛泽东又有一信：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的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能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父子通信前，岸英对父亲毛泽东并不了解。当时，以王明等人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曾宣扬一种论调以贬低毛泽东，他们散布说：“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的。所以，他只能用孔孟之道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康生曾与王明一唱一和，在驻国际的中国同志中间发起签

名，要求让王明当中共领袖，高呼“王明万岁”。他们还宣传一种理论，即“非无产者出身的人不能担当无产阶级领袖”……想不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对刚刚进入苏联的毛岸英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儿童院副院长师哲回忆道：“岸英兄弟到了莫斯科后就被送进莫尼诺儿童院，这已是1937年了。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真实身份的习惯，在苏联仍是这样，对我（副院长）也不讲实情。有一次岸英和我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直呼其名，好像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向他们说明，我知道他们的身世，也知道每个孩子的身世，并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祖国，在这里无须隐瞒什么。

“记得在莫尼诺时，有一次岸英无意中谈到一个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由无产者来领导。他还透露出毛泽东不是无产者，所以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意思。

思。

“我不得不开门见山地同他进行认真的交谈，向他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无产者出身，但他们确实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毕生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岸英终于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也变得老成多了。”

岸英在跟贺子珍相处的一段时间里，从贺妈妈口里得知了父亲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父亲在他的脑海中，形象逐渐高大起来，对于王明的一套理论他渐渐开始持怀疑态度。

而今，与父亲书信往来，直接受到教益了，这对岸英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父亲鼓励儿子多读书，这正符合岸英的心愿。他同样嗜书如命。

躺在床上看《唯物辩证法》，一头扎进图书馆。毛泽东托人带书来，告诫儿子“少谈政治”

1940年秋，中国孩子从莫尼诺搬迁到伊万诺沃城国际第一儿童院。

和在莫尼诺儿童院一样，岸英跟其他孩子们白天在附近的十年制学校读书，放学以后就回到儿童院。那时他读十年制的七年级。岸英先是少先队大队长，后来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在学校、在儿童院，岸英的学习成绩好，有魄力，号召力强，又是各种文体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无形中成了青少年的小领袖，大家喜欢他，信任他。

夏天，按照儿童院的规定，孩子们都要午睡。岸英一方面精力充沛，不睡也可以，一方面总觉得时间不够支配，因此每天午睡时，他都躺在床上，悄悄地翻看一本书。

他的举动，引起了蔡博的好奇心。有一次他把岸英捧在手里的书抢来一看，才知道他是在读父亲毛泽东在延安写的一本哲学讲义。岸英把这本爸爸从延安寄来的小册子，用一张《少年真理报》精心包了皮，在扉页上写上“《唯物辩证法》毛泽东著永福题”，他学会了爸爸的读书方法，也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在书上画了杠杠、圈圈、点点，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加上几个问号。

韩铁声老师最喜欢聪明好学的岸英，他总是亲昵地喊岸英“谢廖沙，谢廖沙！”而岸英也喊老师在苏联的名字：“伊万老师，再给我们讲讲中国历史吧！”

伊万老师给中国孩子讲南北朝，讲唐、宋、元、明、清。当他讲起南北

朝的南朝皇帝梁武帝迷信的故事时，岸英差点笑破肚子，他把手一摆说：“梁武帝真蠢，太可笑！”

岸英求知欲非常强烈，对于祖国的历史、地理和优秀的文化遗产，像海绵吸水、磁石吸铁一样，什么都想知道，而且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反对那种在学习上一知半解便洋洋自得的人。

国际儿童院有个图书馆，里面珍藏着许多苏联和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学书籍，这些书吸引着孩子们，尤其是岸英。

图书管理员是由国际儿童院党支部书记兼任，叫伊拉娘娜，是个热情的40来岁的女同志。她把大一些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弟妹，把小家伙儿当成自己的孩子。她也很喜欢岸英，每天孩子们从各自的学校回院后，第一个站在图书馆门口等书看的就是岸英。

“谢廖沙，又是你第一名！”伊拉娘娜掏出钥匙边开门边打趣地说。

岸英钻进图书馆，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看完。

这简直跟他的父亲一模一样。毛泽东自小就爱书，读过许多中国古典书籍。在长沙求学期间，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自修计划，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他便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时才出来。他持之以恒自修了半年多时间，读了很多的书，涉及面非常广泛。他读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的伦理书，斯宾塞的逻辑学，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还读各国历史、地理、法律，也读诗歌、小说、故事……

“谢廖沙，要关门啦！”每天晚上，伊拉娘娜可以不看一眼就大声招呼，岸英总是恋恋不舍地走出来。

“谢廖沙，又是你最后一个出来！”伊拉娘娜笑着说。

“唉，一天要是变成48小时就好啦，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岸英揉揉眼睛，伸伸胳膊，挨着党支部书记的肩膀边走边说。

“小伙子，学习了一天，快玩儿去吧！”伊拉娘娜用食指在岸英脑门上轻轻一点，十分亲昵地说。

星期六，岸英又是第一个来到图书馆。他想今晚没有其他活动，可要认真真再研究一番联共（布）党史。为了安静，他拿着这本厚厚的俄文书，躲在最里边，离大门口隔着十几层书架，一面看，一面做笔记。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手中的书已经翻了一大半，笔记也记了十来页。“咦？时间还没到？”岸英抬头四下看看，没见到伊拉娘娜，心想她在门口有事吧，于是又埋头专心致志地看下去。

啊，一本厚厚的联共（布）党史书终于看完了。岸英非常满足地放下书，挺起身子，伸伸腰，口里喊着：“伊拉娘娜老师，今天看得真过瘾啊！你也该回去了吧？”咦，怎么没有一点声音？图书馆里静得出奇，窗外鸦雀无声，只有风儿轻轻地吹着，路灯闪着亮光。

岸英走到图书馆大门口，发现门已锁上了。“啊呀，这可真有点麻烦了，伊拉娘娜把我给忘记了。”怎么办呢？他在门边徘徊了一阵，心想反正明天是星期天，今晚我就在图书馆里看个够吧！

他重又打开电灯，在书架上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他心爱的书——斯诺著的精装俄文版《毛泽东自传》（即《西行漫记》）。他如获至宝，贪婪地从第一页啃起……直到天快亮了，岸英才感觉到眼睛有些惺忪，他怕睡着了会感冒，就在书架中间的巷道上跑起步来。活动一会儿，他又精神振奋地阅

读起来。

第二天伊拉娘娘开门了，同来的还有岸青和伊万老师。伊拉娘娘嘟哝着：“怎么会呢，我锁门时还喊了谢廖沙几声，没答应呀，我想他一定是到别的地方去了。”

“哥哥一夜没回来，真把我急死了。”岸青焦急地说。这些话岸英都听清了，他站在大门边，等伊拉娘娘把门打开，突然笑着大声说道：“谢廖沙在这儿哩！”

伊万老师又心疼又赞许地说：

“好啊，谢廖沙，你读书真是‘废寝忘食’啊！”说着，伊拉娘娘和岸青也嘿嘿地笑起来。

寒假里，伊拉娘娘要去莫斯科休假了，这使岸英非常焦急。他担心她走后，图书馆会不会关门，这把钥匙交给谁呢？

伊拉娘娘早就摸透了岸英的心思。这天晚上，她将一把黄铜钥匙往岸英手上一拍：“谢廖沙，这把钥匙给你，寒假里你可以把各种书籍看个饱啦！”她对岸英和蔡博说：“你们年纪大了，应当知道我们党的历史。在里面一间小房里，有历届代表大会的文件，你们好好学习，只要不把书搞烂就行。小伙子，去吧！”

这个寒假，岸英和蔡博将俄文版的联共（布）各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从“十八大”往前看，一直看到联共“一大”，对苏联党的历史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这个假期的自学，对于岸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18岁的青年，开始考虑今后一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了。

岸英总是把自己学习的心得，写成长信向爸爸汇报，同时还分批寄去了不少照片。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岸英兄弟寄来了热情的亲笔信，告诫亲生儿子：少谈政治。

岸英

二儿：

岸清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清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写这封信时，毛泽东又亲自挑选了 21 种书共 60 本，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托人将书带到儿童院。

毛泽东的这封信，既有长辈为孩子的成长感到喜悦的心情，也有语重心长、充满父爱的建议和规劝。尽管岸英有志于深入钻研社会科学，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得到了同志们的表扬，毛泽东仍然向岸英提出了“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期望。

出于何种思考，毛泽东要岸英向自然科学学习，他并没有明确说明，是他深知政治的危险性、残酷性，搞政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不愿儿子再步自己的后尘？这种解释好像有点牵强、片面，至少是曲解了毛泽东的本意。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有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而是当时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想法。周恩来就非常赞同孩子们当工程师、教授、专家的想法。当年在莫斯科休养的很多老红军都跟他们讲过，要注意学习科学技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心里是清楚的，也想得很长远，当初他们处的政治环境是黑暗、腐败、反动的，他们只能选择一条革命的道路。然而，中国不会长远地动荡下去，他们这一辈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坚信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在他们奋斗中诞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碎旧世界，结束阶级压迫的政治，为下一代开创一个新的天地，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将更多地落在后代身上。到那时不仅需要有高度政治责任感，更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祖国建设需要各种各样人材，有了一技之长，在将来的祖国建设中便有了用武之地，再提高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觉悟，这才顺其自然。后来，儿童院的孩子们长大后，也绝大部分选择了自然科学学科，进入了理工科大学和各种专科学校学习，其中就有毛岸英的好友蔡博等人。他们毕业之时，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用人之际。他们回国后，带着在苏联所学的知识，勤奋、努力地长年工作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毛岸英还是选择了他所喜爱和热衷的政治与军事。

要当政治军事家，
向讽刺他们的文孩“宣战”

“阿烈耶夫，苏联人为什么这样尊重我的父亲毛泽东？”岸英喜欢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请教中国老师、教务主任郑一俊。“我在白俄罗斯果麦儿城演讲的时候，只要提到毛泽东，台下掌声如雷；当他们晓得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时，更是把我当成小领袖一样欢迎。阿烈耶夫，你能给我讲讲我父亲的事吗？”

在一个初夏晚餐后的黄昏，于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的小白桦树林散步时，毛岸英向阿烈耶夫提出这个问题。阿烈耶夫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反问道：

“谢廖沙，你是毛泽东的儿子，这个问题应该由你来告诉人呀！”

“阿烈耶夫，老实说吧，我最喜欢的人是我妈妈杨开慧，我最尊重的人是我爸爸毛泽东。可是自从 1927 年 9 月，爸爸离开我们时，我才 5 岁，平时他忙着干大事，也很少在家，他的事儿我可说不上。”岸英不无遗憾地说。“真的，我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也说不准。”

阿烈耶夫在小溪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望着汨汨流淌的小溪流，思绪仿佛回到了中国。岸英也伴着他，坐在对面的草地上，口里嚼着一根狼尾巴

草。

“谢廖沙，你父亲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并没上过大学，也没能出国留学，可是他能把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比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积蓄革命的力量，又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中国革命从危险中拯救出来；在抗战中，又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合作，一致抗日……总之，在革命历史关头，是你父亲和朱德、周恩来等一批革命家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创举啊！”阿烈耶夫提纲挈领他讲了个头，然后又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岸英不断地点头，把这些话深深地烙在脑海中。

“我长大了也要像父亲一样，当个政治军事家！”岸英更加崇拜父亲了。

“你父亲未必希望你也走他的路。你现在还年轻，要学好各门功课，打基础，等到三五年后，再选择自己的志愿。”阿烈耶夫劝说道。

“我想好了，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反动统治下生活，光靠科学技术是救不了他们的，必须使用暴力，推翻反动统治，这就要有一大批政治、军事家，拿起枪杆子，把反动派打倒！”岸英信誓旦旦地说。

不知是遗传因子的影响，或是家庭政治氛围的熏陶；也许是岸英从小看到敌人杀死自己最心爱的妈妈，后来又在上海流浪，尝遍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他同情贫苦人民，他仇视那些地主资本家，发誓要继承父辈的事业。

由于岸英政治上出众地坚定，人品又正直、坦诚，加上关心集体、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在这孩子们的“共产国际”中他成了当然的小领袖，表现了一个小政治家的风格。身在异国他乡，他坚持原则，既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战士。

有几件事使青年毛岸英在政治上初露锋芒。

1940年秋，住在莫尼诺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们来到伊万诺沃市。搬迁的原因是因为持续了3年的西班牙内战，到了1939年3月，最终以共和国被颠覆而告结束。反动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在西班牙也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样一来，许多西班牙的革命者在国内无法生存下去了，不得不逃亡国外，其中很多人亡命苏联。一时间，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内便住满了西班牙流亡者。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征求了中国抗战人员疗养院、儿童院领导及教师的意见，将原来清一色住着中国孩子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迁往伊万诺沃市，与在那里的国际第一儿童院合并。

伊万诺沃市在莫斯科东北方，接近西伯利亚，离莫斯科300多公里，坐火车要走一夜才能到达。它是一座纺织工业城，也是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之

原先的第二国际儿童院，实际上只是中国儿童院，如今合并后的儿童院，共有200多个孩子，他们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朝鲜、印度、马来半岛和阿拉伯国家。他们的父母除了已经牺牲的之外，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军队的首脑人物，有的成为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袖。这批学生中，在六七十年代，也有成为“接班人”的。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很重视这批孩子。

儿童院中，中国孩子的人数最多，有50多人。

岸英刚到第一儿童院时，看到那么多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少年伙伴，

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他们之间除了哭声和笑声是共同的外，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些外国孩子不像中国孩子能吃苦，但却活泼好动。那些女孩子，很快抱成了一团，在一块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像百灵鸟。男孩子好像都很自尊，也很高傲似的，不过没有多久也被中国孩子吸引过来了。

这些孩子刚到苏联来的时候，都是八九岁、十一二岁，可以称做孩子。几年过去了，他们都好像见风就长似的个子一个劲儿地往上拔高儿，现在都成了少男少女了。男孩子嗓门变粗了，一个个傲气了，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女孩子苗条、腼腆、害羞了，一个个变得文静起来。而岸英、蔡博、郭志成这几位以前就大几岁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青春阶段。

· 99 ·

岸英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尤其在体育方面他是个活跃分子，踢球、下棋、滑雪、溜冰，样样都能来那么几下子，很引人注目，他也常常在孩子们面前逞英雄。也许，各方面都很出众，也爱出众，这是毛岸英的性格，他还喜欢交朋友，郭亮的儿子郭志成跟他是一对“油盐缸子”（意即要好的朋友）。

郭志成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个冬天，岸英带他去溜冰。穿好冰鞋后，岸英扶着他慢慢地在冰上走，转了几圈，刚有点适应了，他觉得很开心。岸英说，要想学得快，必须尽早甩开“拐棍”，自己滑，不要怕摔跤，说着便突然把手一撤，让他自己向前滑去。可是，这毕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滑冰，郭志成的重心总也保持不稳，穿着冰鞋在冰上又站不住，仅仅滑了两步，身子一晃，便不由自主地向前趴去。初学者，还不会处处自我保护，这第一跤便结结实实地摔在冰上，把大门牙都磕掉了一半。另一件是岸英离开儿童院到军校去学习以后的事。有一次假期，他回儿童院看望弟弟和老同学。以前老在一起生活、学习，现在分开了，见一次面不容易，所以聊起来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岸英走时，郭志成一直送他到车站站台，一个在车内，一个在车外，俩人还在起劲地谈着，听岸英讲着军校的生活、军人的理想……不知不觉之中，火车开动了。起初火车走得很慢，他俩好像并没感觉到，一个坐在车上，一个跟在车下，隔着车窗还在边走边谈。后来，火车加快了速度，郭志成便跟着跑起来，谁知站台上有个坑，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一脚踏了进去，身体就势便趴了下去，摔了个嘴啃泥。这两个跟头“摔”得郭志成终生难忘。

迁到伊万诺沃市以后，儿童院真的成了孩子们的“共产国际”了。岸英早已在中国孩子们中建立起了领导威望，到了这个国际大家庭中，渐渐地他的威信在各国孩子们中间也树立起来。开始，他先和肤色相同、生活习惯近似的朝鲜、日本、安南（越南）、马来半岛等亚洲国家的同学交朋友，慢慢地又和东欧、南美洲各国儿童建立起友好关系。

中国的孩子们到伊万诺沃市第一国际儿童院不久，儿童院共青团支部改选。在中国孩子没转到伊万诺沃市前，上一届的团支部书记是由一位叫米的日本小姑娘担任的。这次改选中，由于岸英在孩子们当中有很高的威望，团员们一致推选他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还推选他为出席区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他又不负众望，当选为共青团的区委委员。说来也巧，中国孩子合并到第一国际儿童院后，儿童院的儿童委员会（儿童院苏维埃）也逢换届改选，郭志成担任了儿童院苏维埃的主席。他和岸英本来就是好朋友，现在他们一个管政治，一个管行政，俩人密切合作，成了国际儿童院的两“巨头”，“大权”都掌握在中国孩子的手中，一时间他俩好不风

光。每当他们在一起商量事情时，不仅是中国的女孩子，连外国小朋友都善意地讥笑他们说：“瞧呀，两位小领袖又在研究‘大事’呢！”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理会这些，有时也会回敬几句：“去！去！去！别尽说风凉话，我们是在谈正经事呢！别干扰我们的工作！”

有一张当年在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部分儿童合影的照片，照片中大部分是中国孩子，也有不少外国少年。照片背景的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毛泽东的像片，在像片的上方有一条用俄语写的标语：劳动人民争取胜利的组织者——共产国际万岁！照片中站在后排左边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是岸英他们的老师韩铁声（伊万诺维奇）。岸英站在最中间的位置上。

中国孩子们到伊万诺沃市后，也跟在莫尼诺时一样，根据年龄的大小，分别插到当地的十年制学校读书。岸英、蔡博、郭志成、刘允斌都上了中学。他们志趣相投，除了在学校学习好中学的课程外，课余时间大部分放在学习英语、中国历史、国内政治和中文方面。他们把在莫尼诺就建立起的业余学习小组的习惯也带到这里，一直坚持不懈，目的是将来回国后能够更好地为祖国服务。这也是共产国际所要求的，课余时间各个国家的孩子要单独组织补习本国历史、地理、人文知识的课程，为的是使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以岸英为首的中国五六个男孩子都是爱国主义者，祖国的观念很强，他们不但在俄国学校读书成绩很好，而且也很懂事，就是感觉对自己国家的事情了解得太少，知识太缺乏了。于是，由岸英提议，他们便在业余学习小组的基础上组织了“关心祖国问题”的讨论会，大家分别作准备，在讨论会上就自己所了解的问题作专题发言。刘允斌在延安住过一段时间，听到和看到一些事，他便向大家讲当代革命历史问题；蔡博对近代历史兴趣浓厚，他便借助一本中文版的中国近代史书，向大家谈太平天国以来的革命斗争；岸英看过父亲的哲学书，受到了启发，懂得比别人多些，他就主讲哲学……刚开始时，有的教师对他们这种做法不放心，怕没有人指导，学偏了怎么办？后来听了孩子们几次讨论，觉得蛮有趣味。尽管这些年轻人的谁点还很幼稚，不成熟，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们的执著追求、刻苦钻研的精神也叫人感动。看到老师的态度改变了，岸英他们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然而，为了这种学习，在第一国际儿童院还引起了两场风波。

一场风波是在中国孩子们中间兴起的，其实是一部分男孩子和一部分女孩子之间的事。

男孩子喜欢看政治理论、历史书，喜欢谈政治理想、国际形势，而女孩子们，别看她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家，可她们一般不关心政治，课余时间喜欢唱唱歌、跳跳舞，或是干点绣花、织毛衣、剪纸花一类事。再不然，就几个人搂肩搭背地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又说又笑，像一群麻雀一样，吵得别人不得安宁。平时，男孩子们就看不上女孩子们的这种“小家子气”，而女孩子们对男孩子的那种“政治家”的派头也很反感。双方不时发生一点小冲突，但总的看是各干各的，还算相安无事。

问题就发生在岸英他们组织的讨论会上。这种学习形式，他们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保持着高昂的热情，老师们听了几次，也对讨论有了兴趣，更主要的是周伯伯到儿童院看望他们时，也支持和鼓励他们多关心祖国，好好学习更多的知识，因此岸英他们也就越发神气了。其实，看到岸英他们学习有声有色，有些女孩子也想参加听一听，但是又不好意思。在这方面，岸英他们是有点失策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女孩子都看成是“娇小姐”了，

忘记了应该团结、吸收更多的人。这样一来，有个别人本来就对岸英他们有看法，虽然她们对学习不关心、不爱好，但却抓住这种现象大作文章，攻击男孩子。在“三八妇女节”那天，儿童院的墙报上，刊出了一篇文章，批评岸英他们是“脱离群众”、“单独行动”……岸英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诋毁”，便受不了了。他们感到，这不但是对他们学习热情的打击，向他们泼了一盆冷水，而且简直是无中生有的无理中伤。

岸英他们这群好胜好斗的小伙子们被激怒了，立即组织起来进行反击。岸英带头，一口气写了足足有三四十页的批评文章，蔡博也写了十几页，他们中最少的也写了四五页。这些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什么不对！我们不可能在苏联生活一辈子，我们的父母和兄长们正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流血牺牲，难道我们永远住在异国他乡，永远安心于安逸生活？不！我们绝不愿过这种生活，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为人民服务。可是，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孩子们，很小就离开了祖国，如果不很好地学习和了解祖国的过去、现在、将来，不了解祖国的语言和人文地理知识，对祖国一无所知，就是有一天回到了祖国，又怎能为祖国的强大而工作呢？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应无愧于这一称号。他们还批评写墙报的人：你们这些小姐，自己对祖国的历史和政治不关心、不感兴趣也就罢了，还要反对我们，真乃是岂有此理……

为了引起更多的人注意，他们找了一块黑板，把写好的文章钉在上面，然后将黑板抬到了人人都要去的食堂门口。开饭的时间一到，孩子们来到食堂前，立刻被黑板吸引住了，争相阅读，吃饭的时候也在议论。

岸英他们这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本来在孩子们中间就很出众，平时争辩起来都讲得头头是道，只苦于没有对立面，今天可有了机会了。他们发挥了全部特长和聪明才智，文章像一颗颗“重磅炸弹”，一个回合下来，便把女孩子们批得哑口无言，再也无力指手划脚、唠唠叨叨的说三道四了。说来也奇怪，经过这次较量，使得平时说多少话、做多少工作都不见效果的政治学习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也许是岸英他们讲得有道理，对孩子们有说服力，那些以前不愿意或不关心学习的人，开始对学习热心了，有些人主动参加到岸英他们的队伍中来了。经过这场风波，岸英在孩子们中的威信更加提高，“小领袖”的地位更加巩固。

状告傲慢的女院长。

但岸英还是很有组织观念

儿童院的孩子们在课余时间，要按国籍分组，由各国教员向他们教授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历史、语言，进行民族教育，这是共产国际制定的方针和原则，从在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到伊万诺沃市第一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一直是这样做的。

可是，第一国际儿童院的那位女院长，却是位抱着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人。她认为，孩子们在苏联，就应该多学俄语，学习苏共的历史，其他课程都不必要。带着这种思想，她在日常安排中，不顾教师们的反对，千方百计地把各国孩子们的民族教育时间给挤占掉。对此，中国教员们和以岸英为首的中国学生们意见很大。在儿童院里，一方面中国孩子最多；另一方面，中国孩子们的民族责任感、民族意识也最强。特别像岸英他们这些孩子，非常不满这种做法。在这方面，他酷似他的父亲。为了坚持共产国际制定的

民族教育的方针和原则，韩铁声老师和岸英曾多次向院方提出意见，一再要求给中国孩子学习中国文化的时间。可是，那位傲慢的女院长却气势汹汹地说：“这里是苏联，不是你们中国，学什么中国文化！将来，凡是在这里的孩子都要加入苏联国籍的，还是应该多学习学习苏共的历史吧！”

听到她那无理的答复，岸英和蔡博等人气愤极了。他们来到韩铁声老师的宿舍，谈起这件事。岸英他们表示：不错，我们来到这里，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共产国际也像“父亲”那样关怀我们。可是，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一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呀！难道我们学习祖国文化的权利都要被剥夺了吗？这也太欺侮人了吧！哼！我们是中国人，就是到了年龄，我们也不入苏联国籍！伊万诺维奇老师，我们都支持你，跟她作斗争，夺回我们的权利！

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和支持下，韩铁声老师给共产国际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把儿童院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作了反映。不久，共产国际专门派了两位同志，到伊万诺沃市国际儿童院视察，其中一位便是匈牙利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拉科西。他们来到儿童院后，和师生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了解情况。岸英他们也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向他们无保留地讲了出来。经过一番调查后，拉科西等人代表共产国际当众宣布：要搞民族教育，要使这些孩子们不忘记自己的祖国，将来学成回国后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听到这一决定，岸英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高兴地搂着韩铁声老师，高呼着“乌拉——”。

共产国际的代表临走时和全体师生合了影。

然而此事并没有完。就在共产国际视察人员走后不久，岸英挨了一次批评，起因还是那位女院长，而这次岸英确实也有欠妥当的地方。

事情是这样的：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实行的是一长制，行政首长有处理一切问题的全权，在儿童院也实行的是这种制度。别看儿童院并不大，但院长的权力却是相当大的。就是那位女院长，她不仅有浓厚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而且飞扬跋扈，心胸狭小，滥用权力（后来迫害贺子珍的就是她）。儿童院有位教导主任，是苏联人，叫古兹班诺夫，他为人正直，对各国的孩子们很好，孩子们也很尊重他。他对院长取消各国孩子们的民族教育的做法不同意，曾向院长提出过意见，共产国际调查人员来院后，他也直言不讳地反映了问题。女院长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正在气头上，共产国际的人员刚走，她便拿古兹班诺夫出气，无缘无故地强行把他赶出了儿童院。当岸英得到古兹班诺夫老师被迫调离儿童院的消息后，一方面非常惋惜这么一位好老师离开了他们，另一方面也对女院长的恶劣手段十分气恼，想打抱不平。于是，他以儿童院团支部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国孩子开会，研究反对院长错误做法的对策。会议是秘密召开的，除了被通知的中国孩子以外，其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然而，会议进行的并不机密，儿童院的党支部书记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在开会，也想到了会议可能与院长赶走教导主任有关，于是他来到会议室的门口，要求进去听听会议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他在门口喊道：“谢廖沙，能让我进去听听吗？”

听到书记在门外的叫声，岸英知道被人发现了，有点紧张，但他坚持他们的做法，一口回绝道：“对不起，书记同志，你不能进来。我们商量的事情，内容是保密的！”党支部书记吃了个闭门羹。

见岸英不给他开门，支部书记也无可奈何，他便找到韩铁声：“伊万老

师，请您去做做谢廖沙的思想工作，把会议停下来，不要跟院长对着干！这样做是没有益处的！”韩铁声也是党支部的委员，他没有推托的理由，便跟着支部书记来到了岸英他们开会的房间。

尽管岸英他们一个个都血气方刚，富有正义感，看不惯任何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他们也毕竟年轻，经验较少，不知道社会的复杂性，尤其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凭感情用事是不行的。他们并没有因为韩铁声是他们的老师而给他一个面子，他也被严辞拒绝在门外。这回岸英他们倒没隐瞒自己的观点，隔着大门他向韩铁声和盘托出了开会的目的，说：“伊万老师，我们是要伸张正义，不是在搞秘密活动，院长把古兹班诺夫赶走，要讲清楚是什么道理！”

韩铁声向着支部书记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表示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上，他是倾向于孩子们的，但是作为老师不便于说出口来。女院长赶走古兹班诺夫，就是为了发泄她对中国老师和中国孩子们向共产国际告状的私愤，只不过她不好对中国人做手脚而已，倒霉的自然是坚持原则的苏联教职员工了。韩铁声对这些当然清楚，也当然不满院长的行为。

党支部书记看看无法制止他们，又怕事情被搞大，只好将情况汇报到共青团区委，求助于岸英的上级来解决问题。很快，岸英被召到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办公室……

岸英是团区委的委员，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还有这么个特点：认准了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然而，一旦发现自己做错了，也是敢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包括有些事情自己并没认识到不对，经别人给指正出来，过后他思想想通了，也会接受批评，马上认错。至于这件事，团区委书记与他是怎样谈的，人们不得而知，韩铁声没有向大家说明，很可能当年岸英从团区委回来后也没向他说起过。经过了这场风波，毛岸英的威信并没有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倒是那位专制跋扈的女院长。当然她对岸英这样的天不怕地不怕、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人很反感，他不吃她那一套，她也奈何不了他，更何况不久岸英便到军校学习去了。后来，女院长因贺子珍与她吵了一架就残忍地把贺子珍当做“疯子”对待，进行非人的报复。这倒证明了那位女院长大国沙文主义的顽固心理。

“我是中国人！早晚

我是要回到祖国去的！”

毛岸英就是这样一种人。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他的性格。那是在加入苏联国籍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又表现出与众不同。

1941年冬末，为了战争的需要，苏共中央有个建议，希望生活在苏联的18周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岸英那年已是个19周岁的小伙子了。

在一次讨论会上，老师向孩子们提出这个问题后，不少孩子都踊跃发言。有的人说：“加入苏联国籍当然好啦，以后谁欺侮我，有苏联政府的保护！”有这种想法的人，看到祖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同胞被列强奴役、欺侮，想找一个强大的国家作后盾。还有的人说：“同学们，现在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伟大导师列宁缔造的。眼下，斯大林同志正率领苏联人民跟德国法西斯血战，加入苏联国籍当然光荣。”这些人是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上考虑的。

总的看，拥护加入苏联国籍的占多数，即使有人有不同想法，在这种气

氛中，也不好发表意见。当时的苏联被誉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每个革命者向往的地方，很多人把苏联当成自己的祖国。开始时，意见是一边倒的，是拥护苏共中央的建议的。

起初毛岸英没有发言，他一直在低头沉思。平时，他是孩子们的头头儿，讨论和发言总是积极带头的，大家都愿意听听他的见解，今天他为什么沉默不语了呢？有

的同学看出了他的心思，委婉他说：“谢廖沙，入了苏联国籍，以后还是可以申请改回中国国籍的呀！”

岸英蓦地从座位站起来，右手按着长条桌，声若洪钟般他说：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们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立刻要回到祖国去，如果加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

了。”他环视着同学们，把右手在胸前轻轻一放，自豪他说：“我坚决不入苏联国籍，我是中国人！早晚我是要回到祖国去的！”

这声音铿锵有力，异常响亮地震荡着会议室，敲击着在座的每个人的心，不少同学受到他的话的感染，甚至几十年以后，他们已经成为中老年人，一谈起毛岸英

时，都会忆起他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不由得从内心里感慨地称赞毛岸英是一位非常果敢的、具有政治远见的人，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然而，毛岸英又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先不说他后来报名参加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就是在当年，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在人数众多的国际儿童院里，他也坚决地要求参加红军，上前线和法西斯侵略者真枪真炮地血战。他用行为，证明他不但热爱他的祖国，同样也爱社会主义的苏联；他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培训和教育了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他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品格的人……

一张漫画，“抗议”削土豆皮

第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沃城与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后，中国孩子们才真正生活在国际儿童们中间。不久毛岸英担任了儿童院的共青团支部书记，这一年他满18岁。郭志成比岸英小3岁，已经15岁了，担任了儿童院儿童委员会主席（即苏维埃主席）。

两个儿童院合并后，事情就多起来，不像在第二国际儿童院时，都是清一色的中国孩子，比较单一，好管理。中国孩子都是革命家的后代，受父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听话。当然，调皮蛋也有那么几个。而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孩子们，个性就很强，不听话，不服从管理，常常触犯纪律，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比如有位巴西女孩，就最使院长和老师头疼。她年龄比其他孩子大些，是孩子王，很有一股子不把儿童院闹翻天就决不罢休的劲头，院方感到十分恼火，但无法可施，只好“养而不教”了。毛岸青也是个调皮角色，在与各国的孩子们相处中，各方面都不习惯，常跟其他国家的孩子发生纠纷，害得副院长师哲经常向苏联院长道歉。这就给毛岸英、郭志成等小领导出了很多难题，带来了许多麻烦。批评、教育、帮助等各种以往在中国孩子中间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这里都失去了效力，做了很多工作都收效甚微。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很快他们便发现，在中国孩子中间不能实行的也不愿实行的惩罚的办法，有时还管用。有的孩子虽然用说服的办法他不听，可是“命令”他去做什么，尽管他还是捣蛋，但是命令还是“执行”

的。

于是，身为儿童们的行政领导的郭志成，在征得了老师的认可后，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管理办法：谁调皮捣蛋，谁就会得到一个“任务”——削土豆皮。这是一种带有强制和惩罚性的劳动。

土豆（马铃薯）是俄国人餐桌上的主菜，也是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顿饭都少不了，可麻烦的是必须要一个个地削皮。家里吃土豆数量有限，几口人总共吃不了几个，所以削皮还不算是太沉重的负担。然而，儿童院里的200多个孩子，都要在餐厅吃饭，一顿饭所用的土豆数量也是可观的了。别看削土豆皮并不累，坐在那里，一个一个削，挺轻松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磨人的活。郭志成根据调皮鬼们犯错误的大小，便指定他削一盆或是一筐土豆，必须削完，保质保量，削完了才能去活动，如果削不完就不许去休息，不许吃饭，不许睡觉。被罚的调皮鬼坐在那里削着土豆皮，眼巴巴地看着其他孩子高高兴兴地去打球啦、跳舞啦、旅行啦……心里多难受呀！可是，完不成任务，儿童委员会主任有权对你不客气，加重处罚。

有时，有人成心磨蹭不好好削皮，结果是把整个周末的时间都搭上用来干活儿。因此，那些个性更强一点的、胆子大的人就骂郭志成。

有一天，一位受惩罚者实在受不住了，便画了一张漫画——画中人长着个大脑袋，灯泡似的双眼，鼻子是两个空洞，嘴巴弯弯的像香蕉，牙齿一格一格的像口琴，胳膊和腿却画得像柴火棍……这是孩子对“专政”的反抗。这幅画被贴在最为显眼的餐厅门口，吃饭的时候人来人往的，吸引了不少人观看。看着这幅丑陋的人像，人们小声议论着，讥笑着。更有一位被罚削过土豆皮的巴西籍女孩叶琳娜，胆子尤其的大，她竟然当众在漫画上用俄文写一行字：“弗拉基米尔·大保”——郭志成的俄语名字。

被羞辱了的郭志成，真的气坏了，他气势汹汹地要找那位“漫画家”和叶琳娜算帐。

岸英得知此事后，立即找郭志成交换了意见，劝他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还指出了他的工作方式上的问题。接着，他又找到“漫画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这种做法，直说得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事后，他便到食堂撕下了他那张“杰作”。岸英做人的工作还挺有门道，主要的是他处处以身作则，而且待人公道并在孩子们中间威信很高的缘故。

异国初恋。热烈的巴西女孩，
冷静而又传统的中国男孩

她的俄语名字叫叶琳娜，是巴西共产党负责人的侄女儿，比岸英小两岁。由于乍一看，那些外国女孩子长得似乎都一样，金发碧眼，所以岸英对她没有太多的印象。那天，由于“漫画事件”，叶琳娜走到岸英的房间，说是认错，只不过是简单他说了几句。不知怎的，在男孩子面前善于言辞做思想工作的他，在女孩子面前倒显得矜持起来了。那种严肃认真的话本来也没有多少说的，可是当说到画郭志成的那幅漫画时，俩人倒是好好地“评论”了一番，乐得他们开心地笑出了眼泪，连肚皮都笑疼了。

谈笑了一阵之后，叶琳娜话头一转，指着兄弟俩的床铺说：“瞧瞧！你们这些男孩子，都是那么不注意整洁，窝窝囊囊的不修边幅。在这么乱的房间待客，是不礼貌的。”

说着，她就主动去叠被子，整理屋子，动作轻盈敏捷。她的这番话和她的行动，一时弄得岸英不好意思起来。猛然，他好像醒悟了过来，赶忙去抢

叶琳娜手里的东西，无意之中，他抓住了她那双纤细的、柔软的手。一时间，他好像有一股电流一样的感觉涌遍全身，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呼吸也急促了……

“书记同志，怎么你的脸红啦！”叶琳娜却大大方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调侃地故意问着。

岸英慌忙把抓着的小手松开，尴尬极了，脸涨得通红，平时那副领导的劲不知哪里去了，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对不起！我、我……”还没说完，就忙着低头收拾起房间来。其实在西方，这样的事是非常普通、平常的，长辈对晚辈，兄弟姐妹、朋友同事之间，经常用亲吻、拥抱之类的动作，表示礼貌的问候、祝愿、告别等等，根本用不着那么紧张。然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男女是“授受不亲”的。

房间很快便清理完了。可岸英还没有从刚才那种惊心动魄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而叶琳娜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一件小事竟使这位“领导”那样窘迫，她很莫名其妙。于是，刚才两人还谈得很开心，现在却出现了一段冷场。然而，岸英毕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况且在苏联生活了4年多的时间。他稳定了一下情绪，便主动打破僵局，说：“叶琳娜，你给我讲讲你的祖国、你的家乡好吗？”

叶琳娜没作正面回答，而是问：“谢廖沙，有咖啡吗？”岸英连忙起身去找咖啡。

那时候，苏德战争还未爆发，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而国际儿童院的孩子，生活条件比一般苏联公民还要优裕些，所以他们房间里的咖啡、牛奶、糖果糕点之类还是常有的。

“谢廖沙，我来煮咖啡！”叶琳娜边说边干，如数家珍地谈起了她的祖国。“谢廖沙，你知道吗？我们巴西素有咖啡王国之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消费国之一，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天天喝咖啡的习惯。在巴西利亚城，街头的咖啡摊到处都是。在各银行、旅行社、航空公司和政府机关的办公室里都免费供应咖啡，工间休息称为喝咖啡时间。给人小费时，也要说一句：用这钱喝杯咖啡吧！巴西人喝咖啡还挺有讲究的，当客人进门来访时，主人总是向客人献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表示对客人的欢迎。作为客人，一定要把咖啡喝完，表示对主人的尊敬，要不然主人会不高兴的，以为客人瞧不起他。相反，如果主人不向客人献咖啡，那就表示主人对来者态度的冷淡。”

“啊唷，我刚才没给你献咖啡，你不见外吧！”岸英说笑着，看叶琳娜娴熟地煮着咖啡。叶琳娜端给岸英一杯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咖啡，莞尔一笑，两腮显示出两个酒窝，“尊敬的书记同志，请您用咖啡！”

“嘿，还有这许多规矩？在我们中国，也有这种礼节，那就是喝茶。”岸英兴致勃勃他说。此刻，他才认真地打量着叶琳娜。她的个头几乎跟岸英差不多高，胸脯高高的，再穿上高跟鞋，全身变成了一个“S”形，充满了少女青春的魅力。她的脸真像洋娃娃那样美丽，一双眼睛蓝得可爱，一头金发带着卷儿，皮肤白里透红，尤其是那两个酒窝，使她更显得娇媚动人、天真烂漫。

岸英久久地凝视着她，而当叶琳娜深情的双眸带着微笑、大胆地盯视他时，他却羞怯地低下了头。

二人沉默了片刻，都在想新话题。

“叶琳娜，由你的名字，我想到了刚刚读完的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的名

著《前夜》。你读过吗？”叶琳娜摇摇头，岸英继续说：“屠格涅夫笔下的叶琳娜·尼古拉叶夫娜，是典型的俄国少女。她爱上了保加利亚革命者英沙罗夫。为了爱情，她跟英沙罗夫一同去保加利亚。太美了，太动人了！”岸英赞叹不已，找出俄文版的《前夜》，递给叶琳娜，“叶琳娜，我希望你看一看。”

叶琳娜是个聪明过人的姑娘，岸英的一席话，引出了她的一连串问话：

“谢廖沙，要知道，你我现在都在苏联呀，我们满18岁的那天，都会加入苏联国籍呢！你是不是想当英沙罗夫，也找个俄国姑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经叶琳娜这么一问，岸英猛然醒悟到，此时此刻他讲的这番话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联想。他讲的时候可没想到那么多，只是刚读完这部小说，为小说主人公的事迹所感染而已，谁想到叶琳娜这样追问起来。岸英连连摇头：“叶琳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的名字叫做叶琳娜，你长得又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叶琳娜……我，我已满了18岁，可是……我并没有加入苏联国籍，我还要回祖国去！”他越是想表白，想解释清楚，越是支支吾吾。

“当中国的英沙罗夫！”叶琳娜咯咯地笑起来，“谁是你的叶琳娜呀？”姑娘真有些咄咄逼人，这回是听者无心，问者有意了。早在两个儿童院合并的时候起，叶琳娜看见岸英，就对这位高个子、魁伟、富有个性的中国男子汉很有兴趣了，背地里找中国姑娘打听他的身世、他的父母、他的……

自从这次叶琳娜找“书记同志”承认错误的谈话后，也使岸英那颗青春勃发的心灵中，注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

从此以后，叶琳娜常到岸英卧室拜访、聊天。周末的傍晚，他俩常肩并肩在儿童院长满青草的池塘边，在白桦林阴道上漫步，且越来越接触频繁。岸英谈得更多的是他的理想——政治军事家。可是，叶琳娜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因为“政治”，她的一家遭劫，如今孤单一人来到离祖国万里之遥的苏联。她需要的是温情脉脉，是情话绵绵，甚至是热烈的拥抱亲吻。巴西每年一度的狂欢节，是世界闻名的，那几天即使男女青年有些出格，也不会有人怪罪的。

岸英却顾虑重重。一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长子，父亲会怎样看这样的事，他一点不知道；二来他是儿童院团支部书记，要照顾到形象；加上中国的传统习惯的影响，他是浪漫不起来的。然而，这个已经发育成熟的身强力壮的青年，他的内心是躁动不安的，对异性充满了渴望。如今，一个美丽的南美洲姑娘就在身边，而且倾心于自己，他又怎能不动心？矛盾！苦恼！他处在无法解脱的感情纠葛之中。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即使是感情围绕着自己，他还是要努力克制自己。可是，他喜欢她，她也爱跟他在一起，二人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岸英没有话题了，就又扯上《前夜》中的叶琳娜。

“谢廖沙，你又在纸上谈兵！如果你是英沙罗夫，你有勇气带着一个叶琳娜·尼古拉叶夫娜到中国去吗？”叶琳娜似乎看出了岸英的心思，充满深情地直盯着他。

岸英羞怯地低下了头，看着脚下的青草，讷讷地说：“叶琳娜，别问这些，我们都还年轻，中学还没毕业呢！”他的潜台词是：我还要回国，还不知父亲的意见……

其实，岸英是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幻想型人物，当他一个人在房里写日记或躺在床上想念回味与叶琳娜接触时的情景的时候，脑子里真是翻江倒海，

玫瑰色的彩云在脑海中飘舞翻腾。可是，当他真的面对心上人时，他又显得那么木讷、可怜、可笑。日记上写的，脑子里转的，突然成了一片空白，尤其是要表露个人感情时，他就变成了哑巴。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有句名言：

“我们对女人的爱越淡泊，她们对我们的爱便越温柔。”

眼下，岸英和叶琳娜正处在这个阶段。岸英越是“淡泊”，叶琳娜越是“温柔”。是不是想用“情”来感化、帮助岸英战胜顾虑？她去岸英卧室的时候更多了，她占据了岸英的周末时间。有一次，这位感情难以抑制的巴西少女，在密林里与岸英散步时，出其不意，竟感情冲动地用双手勾起岸英的粗壮的脖颈，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岸英吓了一跳……突然，他回过神来，很快的又恢复了理智，用双手轻轻地推开了叶琳娜……

叶琳娜受了委屈似的嘤嘤啜泣起来，把岸英弄得手足无措，也不知怎么安扰她才好，一个人在月光下的树林里转来转去。后来，聪敏的叶琳娜问岸英：“你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叶公好龙’，你给我讲讲好吗？”

“这很简单。古时候，中国有个姓叶的老人，他非常喜欢龙，他家里到处是他画的龙，他爱龙之心感动了真正的龙。有一天，天上的龙真的下凡，来到他的府上，叶公看见那张牙舞爪的真龙，吓得半死，连忙哀求那龙：你快走吧，我不要你，我怕你……”聪明的岸英知道她问的目的。这不是很明显吗？叶琳娜在责备他呢！可是他还是认真地向她讲着，是在向她表白自己？是在自我解剖呢？还是在自我嘲笑？还是……

“嘿，你就是那个叶公！”叶琳娜毫不留情地一语道破。她温怒地甩下这句话后，便匆匆转身走了……树林里留下岸英高大的、孤单的身影。

从此，岸英与叶琳娜的关系，成了普希金那句名言的反义：

我们对女人的爱越热烈，她们对我们的爱便越冷淡。

姑娘不喜欢温吞水。爱情，在关键时刻要撞击出火花，要你勇敢地去拼搏、夺取；女人喜欢闪电和雷鸣，她们厌烦纸上谈兵，千万句甜言蜜语，抵不上十秒钟的双眸凝视……

哦，甜蜜的是爱情，折磨人的也是爱情！岸英尝到了初恋的激动和苦涩……

此后，岸英那卧室没有了叶琳娜的倩影，她倒是常跟一个欧洲的小伙子在一起散步。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处于战争体制，一切优厚的生活供应都中断了。不仅如此，还规定儿童院的每一个人、包括小孩都要为前线服务。

当时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斯大林。前线非常紧张。1941年冬天，气温低到零下40度，冻得人真受不了。儿童院组织女孩子参加护士队，到医院做护理伤兵的工作。男孩子挖防空壕和反坦克壕。人们还领到了武器。天，又冷又下雪，真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描写筑路的那段情景，人们又冷又累，还吃不饱，手指头都冻裂了。

最艰苦的是伐木，男子每人每天3立方米，女子每人每天2.5立方米。儿童院的孩子们编成班排，由岸英带队，到20公里以外的森林地区砍伐树木。他们在林中空地上搭起帐篷，晚上就住在帐篷里，上边下着雪，地下铺些草，就睡在上边，冷得要命。环境变得既残酷又艰苦。

松树林里的松树有十几、二十几米高，又粗又大，得先用斧头在树根部砍一个豁口，再用锯子锯，然后放倒。大树放倒后，再截成一段段的，然后

用斧头劈成长条状的能烧火的劈柴，垒起来。那时，岸英不仅拼命完成自己的任务，还帮那些体力弱的女孩的忙，更多的还要悄悄地帮叶琳娜伐木、锯树、劈柴。是在弥补着什么？……不管怎样说，他是在用中国男子汉的那种方式默默地把那份初恋的激动的心献给叶琳娜。但是，这一切都只能暗暗地做，他怕中国的女孩子嫉妒，说风凉话。他采用的完全是中国式的恋爱方式，深深地爱着叶琳娜，在生活中和劳动时，有意识地照顾她，替她干重活儿。然而，叶琳娜不是中国姑娘，她有她的想法，她喜欢的是另一种感情撞击方式。

如今全倒过来了，叶琳娜变得冷若冰霜，而越是这样，岸英却越发爱她，从心底里喜欢她。偶然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他谈到苏德战争的进展，谈到第二祖国苏联时，眉飞色舞。然而，一旦接触到两人之间的情感问题，他就又慌了手脚，准备了许久的话，烟消云散。每每到此，他都责怪自己太无能，将来准是个“讨不到老婆的家伙”。

那次在密林中岸英的表现，深深刺伤了叶琳娜的心，加上巴西的思想观念和感情情调，与中国完全不同，所以有一次叶琳娜挖苦他说：“你们中国的夫子多得很，老夫子、小夫子，你也会变成一个谢廖沙夫子呢！”虽是打趣，可是当中透着认真。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叶琳娜不愿来了，岸英也不好意思去。在感情上他是个内向的人，俩人之间缺少沟通。于是，岸英又使起中国的传统法宝——写信，不知能不能称之为“情书”。他的好友蔡博，便成了他的信使，蔡博跟叶琳娜在伊万诺沃市同一座学校，同一个班级。

毛岸英的第一封情书送到叶琳娜手中，她读了满脸飞霞，那种少女的虚荣心、自豪感、夸耀感一起涌上心头。这也许又是传统的不同，在中国这样的事，隐藏着还怕露出风声呢，她却把这封信当做一件非常得意的事加以炫耀，竟当着班上的同学，把这件事讲了出来：“瞧，谢廖沙写信向我求爱呢！”

这对岸英却是个沉重的打击，这种事怎能大张旗鼓地公开宣扬呢？他又退缩了。没过多久，他又后悔起来，责怪自己又错过了良机。他不怨恨叶琳娜，又写了封长信，向她赔礼道歉。蔡博再次当了信使，这回叶琳娜沉静了，只悄悄地骂了一句：“谢廖沙，这个小夫子！”看来，还会有所转机的……

然而，好事难成。就在这种微妙的发展中，岸英这位事业型的青年没有读完中学，便坚决请求去学军事，后来又参加苏军，打到东欧战场，战争结束前夕才回到莫斯科。从军这几年间，岸英一直惦念着叶琳娜。战后，岸英考上了莫斯科的东方语言学院，叶琳娜也在莫斯科读大学。然而，俩人的关系并没有任何转机。

1945年冬，岸英要秘密回国了。

回国前，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忙于向老师、同学告别之际，花了半个夜晚，给叶琳娜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叶琳娜像《前夜》中的叶琳娜·尼古拉叶夫娜一样，勇敢地跟随他——中国的英沙罗夫，去参加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的心房深处呼喊着：叶琳娜，我爱你！

当然，信使又是他的挚友蔡博。

当叶琳娜接到岸英的信时，是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她是否知道岸英要回国了，她愿不愿意做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个叶琳娜……她没有任何表示……岸英很快地走了。他被拒绝了？还是他走得匆忙没接到她的回音……都不得而知，也未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

然而,从事实上看,好事难成。对岸英来说,没成好呢,还是成了好呢……
总的来讲,在这件事情中,各种各样不利的因素太多了,结局也只能如此了。

第三章 投笔从戎当红军

上书斯大林，请求上战场，却没有回音

见到一位苏联将军，进入士官学校

中国小伙子成为苏联红军上尉

上书斯大林，请求上战场，

却没有回音

自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悍然向苏联发动闪电战以来，岸英十分关心战争的发展。每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广播，然后回到房间里，在世界大地图上，作红白标记。

1938 年以来，德国法西斯相继侵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他都痛心地在地图上插上了小白旗。对于全世界瞩目的莫斯科大战，他则在莫斯科城上竖着一面大红旗，在城郊则是红白相间，表示敌我正在激烈争夺。起初，德军已进攻到离莫斯科仅 30 公里的郊外，莫斯科在大炮射程之内，3000 架敌机轰炸莫斯科，把天都遮黑了。但是，莫斯科城却岿然不动。这天岸英听了广播，得知苏联红军已打退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并开始转入反攻，他兴奋地对同学说：

“ 快来，快来看呀！ ”

他迅速把小白旗拔下来，换上小红旗，兴致勃勃地向伙伴介绍战况。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学校生活和儿童院的正常秩序都被打破。他们不分男女，都是民兵，要参加城市的保卫工作，参加民兵武装训练，有一次还在雪地上全副武装地滑行了 100 公里……

冬天来临，苏联最大的煤矿之一——顿巴斯煤矿被德军占领，莫斯科和大后方城市中都没有了燃料。屋子里没有暖气，孩子们便自己动手做铁皮炉子，烧柴禾取暖。教室里没有暖气，不写字的时候，钢笔要放在胸前的大衣里，要是放在外面，时间久了墨水就冻了，不下水。写字的时候，先要用嘴哈哈气，然后墨水才能流出来。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战斗号召下，国际儿童院办起了小作坊。有的学习打铁，自制燃烧弹，旋炮弹壳；有的做木匠，钉木箱子，给战士们装弹药；女孩子们成立了缝纫组，踩缝纫机，自己动手给前线的战士缝制内衣、手套、帽子、被子……孩子们表现都不错，尤其岸英劳动最积极。他不但自己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还要帮助其他人。他承担的社会工作很多，经常要找同学们谈心，解决思想问题。

对孩子们最严峻的考验是挖反坦克壕。当时战争比较紧张，红军已全部投入保卫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去。敌人的飞机常来偷袭，为了防备德国法西斯的坦克进攻伊万诺沃城，要挖反坦克壕，儿童院孩子们当然也不例外。

气温低到零下 40 多度，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岸英这些生长在中国南方的青少年，难得遇到这么冷的天。那地下的土层，冻得和石头一样，得用钢钎凿，凿半天也只在冻土层上留下几道白色的痕迹。岸英双手震得发疼、发麻、裂了缝，他用胶布贴上，再挖。要挖成 3 米深、3 米宽的反坦克壕，每天每人的定额是一立方米，可真不容易！中国孩子在共青团支部书记的带领下，任务完成得比较好，经常受到教师和市里的表扬。

苏德战争正处在紧急阶段，苏联红军在前线损失很大，要不断从后方补充兵员。可是，苏共中央有个意见：国际儿童院的外国青少年，为了使他们

回国以后，能很好地为祖国服务，可以不去前线。

岸英呢，他却坚决要求学习军事，上前线消灭德国侵略者，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的，他可动了不少脑筋呢！

战争破坏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岸英眼看着德国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就在课堂上坐不住了。一天，他从报上看到德国侵略者杀害苏联人民的消息后，十分沉痛，不由得想起杀害妈妈的反动派和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新仇旧恨，义愤填膺。于是，他在纳粹飞机的轰炸中，在地下防空壕里，铺开一张信纸，用流利的俄文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写信：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

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沃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岸英署上谢廖沙和毛岸英的名字后，把信投进邮局了。

一天又一天，他等待着斯大林的批准。十天半月，还没有音讯，他焦急了，又写了第二、第三封信，每天翘首盼望斯大林的回信。

“唉，斯大林同志可能太忙了，哪有时间给我回信呀？”岸英叹着气，自我安慰了一番。他在课堂上和国际儿童院的小天地里，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像那展翅欲飞的小山鹰，迫切希望能扑向炮火连天的战场。

见到一位苏联将军，

进入士官学校

1942年5月的一天，春光明媚，百花盛开，国际儿童院的院子里，鸟雀欢叫着，迎来了贵客。

这位贵客就是苏联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意尔斯基。他是个年近花甲的老红军、老将军，神态严肃而慈祥。1938年，岸英兄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宿舍住过的一段时间里，曾跟曼努意尔斯基有一面之缘。

这回，曼努意尔斯基是来伊万诺沃市视察的。岸英一见他，就觉得好机会已经来临。岸英走进曼努意尔斯基住的房间，两脚一并，举起右手，在帽檐上一靠，行了个军礼，大声地说：

“报告，曼努意尔斯基将军！”

将军站起身，仔细打量着这个精神饱满的英俊小伙子，好久也没搞清对方是谁，只好抱歉地说：

“哈，是个棒小伙子，可是，我的记性不好，怎么不记得你的名字啦！”他风趣地在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

毛岸英挺神气地说：

曼努意尔斯基（1883—1959），苏联人，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28—1943年任书记处书记。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呀，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住地，我见过你。”

曼努意尔斯基用指头轻轻敲了几下脑门，耸耸肩，还是记不起。

“我那时只有16岁，还是小孩子，现在长大啦。”岸英为了给客人留下印象，一直笑眯眯的，做着手势，实在憋不住了，这才红着脸说：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我叫谢廖沙！我，我是——干脆告诉你吧，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叫毛岸英。”

“哦，好呀，好呀，毛泽东的儿子。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将军把两只粗壮的手，在岸英的肩头爱抚地连拍了几下，要他坐在沙发上，又亲自为他倒茶。

岸英先不谈参军的事，怕那样提要求，一下子给顶了回来就不好办了。他转弯抹角，先从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形势谈起，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谈到目前德国侵略者正在渡过顿河河曲，向斯大林格勒进军……

将军很欣赏毛泽东的儿子，称赞说：

“小伙子，你对目前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了解很全面，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趋势的预测，也是有道理的。关心世界大事，这很好呀！”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请问你，我们年轻人，在当今应该打些什么基础，才能为反对法西斯战争作贡献？”岸英面对着将军，两手平放在膝盖上，显出十分诚恳、虚心求教的样子。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大马靴踩在地板上，咔咔地响着。岸英那双眼睛迫切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将军魁梧的身影。

“当前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正跟法西斯进行殊死的搏斗，你们年轻人，一要关心政治；二要关心战争，准备打仗；三要学好文化基础课。你的爸爸毛泽东同志，特别会打仗，尤其是游击战争，打得更好。他领导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给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伟大的组成部分啊！”

岸英静听着将军对爸爸的赞扬，脑海里浮现着抗日英雄在万山丛中挥舞大刀向侵略者头上砍去的英勇形象……他又想起：苏联人民为反法西斯付出了多大代价！差不多每家都有牺牲的，不但青壮年上了战场，就是青年妇女，也雄赳赳开赴前线……

第二天，岸英又去找将军，他再也忍不住了，终于鼓起勇气，一本正经地对将军说：

“曼努意尔斯基同志，我已经20岁了，马上就读完八年级了。我决定不读完中学，想进军事学校，你看怎样？”他双眼盯视着这位老红军。

将军感到很惊奇，至此他才明白谢廖沙跟他纵谈天下战事的真正意图，忽然笑道：

“小伙子，你别着急呀，将来打仗的机会多得很呢！”

“不，我现在就要学军事，准备上战场。”

“你是中国人，没有入苏联国籍，上战场还轮不到你呢！”曼努意尔斯基拍拍岸英的肩膀，笑眯眯地说。

“不，反法西斯人人有份，我是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后代，我有义务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将军看见岸英的态度非常坚决，十分诚恳，就答应说：

“我是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你想进军事学校嘛，这很容易。我可以帮忙，一句话就行，谢廖沙，你等着吧！”

没隔多久，岸英果真如愿以偿，进了伊万诺沃市附近那个中文叫“水”的地方——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

中国小伙子成为苏联红军上尉

苏雅士官学校是初级军官学校，是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的，学生没有军衔。岸英去了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岸英给伊万老师来信，汇报了士官学校的生活，还讲那里伙食较差，体力消耗大，肚子老是饿。伊万老师很疼爱岸英，就从商店里买了黄豆，放些花椒、盐，煮烂了跟蔡博一起去看岸英。他们来到军校时，正碰上苏雅士官学校的学生进行马术训练。

一个个全副武装骑着战马的学生，手持雪亮的两尺多长微弯的马刀，在操场上奔驰着，马刀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寒光，经过模拟的德国侵略者草人跟前，骑手们高喊一声“杀！”马刀砍下去，侵略者的脑瓜子便滚得老远……

伊万和蔡博在操场上看得发呆。他们被这队年轻骑兵威武的表现牢牢地吸引住了，在一闪而过的马队里，也分辨不出哪个是岸英。

演习完毕，倒是岸英首先发现了他们。他牵着汗流浹背的大红马，快步走上前来，气喘吁吁地向伊万敬了个军礼，说道：

“你们好！”

伊万老师一会儿摸摸岸英的肩，一会儿给马梳理梳理鬃毛，称赞道：

“永福，你还真像个青年军官呢！”

“不是军官，是上等兵，你看，肩上没挂牌牌。”岸英笑着说。

“给你送黄豆来了，用花椒和盐煮的。”伊万老师把黄豆送到岸英面前。岸英毫不客气地抓了一把，塞在他心爱的大红马嘴里，然后又抓一把捂在自己嘴里，咀嚼着，连声说：

“好呀好呀，伊万老师，你这就是雪里送炭哩！走，到我营房里玩玩。”

向伊万老师汇报了学习、训练情况后，岸英诚恳他说：

“伊万老师，我想加入苏联共产党，你做我的介绍人行不行呀？”

“我怎会不愿意呢？不过，你没有加入苏联国籍，军校党组织会不会吸收你呢？你问清楚了，再写信告诉我。”

1943年1月，岸英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这时候，他已全副红军装束，穿着草绿色的制服，肩章上镶嵌着两颗金光闪闪的五星，表明他已是中尉军官了。在学员中，这是个例外。列宁军政学校是培养中级军官的学校，学员们绝大多数是打过仗的从前线调回学习的有经验的尉、校级军官，他们胸前多挂着勋章，只有岸英胸前一无所有，因为他没有战斗经历。但是战友们都很喜欢这个中国青年，有时还跟他开玩笑：

“喂，谢廖沙，大概是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对你另眼相看，对你特殊照顾吧！哈哈……”岸英却不管这些，只要能学习军事，他们开什么玩笑，他都不在乎。

入校不久，他便向学校党组织打听了入党的事。大概也是因为曼努意尔斯基讲了话，军校党组织破例地同意了毛泽东的儿子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要求。得知这个消息后，岸英欢天喜地地给伊万老师写了信。

伊万老师担任了岸英的入党介绍人，他给岸英作的鉴定是：

“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的志向，可以入党。”

于是，1943年1月，经伊万老师的介绍，岸英在军校履行了入党手续，成了一名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党员，那时他20岁。1946年回国后，他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战争期间，列宁军政学校这所中级军官学校，为了战争的需要，短短的几个月就可结业。后来，岸英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苏联红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岸英进学院不久，他那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敌的凌云壮志终于得到实现。1942年11月至1943年2月，斯大林指挥的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歼灭德国侵略军30多万。这一仗，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此后，苏军开始反攻，德军节节败退。为了彻底歼灭德国侵略者，一批批的青年军官，头戴钢盔，身穿制服，肩挎长枪，接受统帅斯大林的检阅，开向白俄罗斯第二战线。岸英跟千万名青年军官一样，摆动手臂，唱着雄壮的战斗歌曲：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
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歌声越来越远，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国际主义战士、苏联红军坦克连指导员，他的足迹踏遍了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广阔土地，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5年初，岸英在苏德战争结束前夕，奉命回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为表彰他为苏联卫国战争所作的贡献，斯大林赠送他一支手枪，留作纪念。

苏德战争结束以后，岸英进了苏联的外语学院——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这时候，岸青也进了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1946年初，岸英回到祖国时是戴着苏军上尉的军衔见父亲的。

第四章 回到毛泽东身边

第一次乘飞机，便是飞向东方，飞到延安

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儿子，第一句话是“你长得这么高了！”毛泽东不让儿子“手舞足蹈”，锐利的眼睛盯视着他

“你在苏联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所劳动大学”

手茧——毕业证书

第一次乘飞机，便是飞向东方，
飞到延安

1945年的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日投降，日本鬼子被赶出了中国。战后，祖国的未来命运强烈地牵动着毛岸英的心。经过战争的洗礼，这位将满23岁的青年，再也无法安心于安静的校园生活，他下决心要回祖国去！到那火热的解放事业中去！要为建立一个新中国作贡献！

从前线回来，又进入语言学院学习，岸英仍保持着在儿童院养成的关心国内外时局的习惯，他经常和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动力学院等大学学习的蔡博、郭志成等人密切往来。他们在一起时，还和往常一样畅谈着……

“我想回国去，恨不得马上就走！”他急切地说。

“我看，你还是学完了再回国！”蔡博劝他。

“不！”他态度十分坚决，“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跟你们学技术的不同。我要和实际接触，到祖国的革命现实斗争中去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他要求回国十分心切，给爸爸写了信，又给党中央负责在苏联学生工作的领导写了信。信发出后，他又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祖国的召唤。

作为父亲，毛泽东也感到，儿子长大成人了，应该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于是他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1945年12月的一天，岸英终于接到了来自祖国的通知，随同两位苏联医生秘密回国。接到被批准回国的通知后，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尽管要秘密起程，但是他还是欢天喜地跑到钢铁学院，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几位好友。

朋友们都为岸英就要回到祖国、就要见到父亲——也是他们十分敬仰的领袖，感到高兴。“我们联名写封信，叫岸英带给毛伯伯，向他问好，就说我们一定不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将来也要回去为祖国服务。”有人提议，大家立即一致拥护。

“可以，可以！我一定带到，快写吧！”岸英此时的心情非常激动，看到朋友们是那么真诚地热爱自己的父亲，便满口答应着。

纸和笔拿来了，大家推举蔡博执笔，起草了一封信，然后几个人恭恭敬敬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45年12月底，元旦在即。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一架伊尔型客机腾空而起，直向云天，向东方飞去。岸英还是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飞回自己祖国，他那颗激动不已的心，不可自持地跳个不停。此时此刻，他能不兴奋、激动吗……

就要到家了，离开祖国已有十年了；就要见到父亲了，他已有十八九年没见父亲了。想想离开祖国时是个什么情景……当年，父亲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是仍被压迫在西北的一角；而他呢，正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就必须隐姓埋名，要过那忍饥挨饿的流浪生活。从小他们就要承担起因父亲而带来的责任，他们受了多少苦，只有他们

自己知道。然而，对于这些，他没有抱怨，他从小就坚信父亲是对的，他们开创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伟大的。当年，虽然他只是个孩子，便知道吃苦受难是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如今，他回来了，他追随父亲而来，要用实际行动投身到父亲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中……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飞机在高空平稳地飞行，从舷窗看下去，下面是一片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他又想起了在苏联生活的这些年，想起在国际儿童院那许许多多朝夕相处的伙伴，想起了冬天溜冰、滑雪时的快乐情景……

当年，从上海出发绕道西欧去苏联，光海轮就坐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今，从莫斯科到延安是乘飞机，加上中途等候和换乘的时间也就仅仅用两三天。今非昔比了，但变化不仅是在这方面。这 10 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 120 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了，她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达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多，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已经有 130 余万人，尤其重要的是人心所向，经过 8 年抗战，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认识到她是未来的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人们拥护、热爱、钦佩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把毛泽东看成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些变化，毛岸英虽身在国外，但也能感觉得到。今天回国，形势和当年亡命出走已大不一样了，同样是那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然而，毛岸英偏偏不是那种躺在老子的功劳簿上过生活的人，他回国是要干事业，路是自己走的。他要从头做起，从最底层做起，要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人民中间。回国后，干什么工作呢？做政治工作？它的领域太宽广了。到军队去？这倒满符合自己的志向，还可以学习爸爸的战略战术。别忘了，自己还是个红军上尉军官呢……

这时透过窗口，脚下的大地已经改变了颜色，一片苍黄，无边无垠，从地图上看，应该是哈萨克一带了。突然在黄灿灿的沙丘中，出现了一片湖，湖水碧绿碧绿的，在四周黄沙映衬下，真像一块镶嵌在金制皇冠上的绿宝石，那应该是巴尔喀什湖了。不久，飞机飞过了山口，天山山脉出现在脚下。

“祖国！祖国的土地！我、我终于回到您的怀抱！”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两眼紧紧地盯着窗外。他的情绪影响着舱里的其他乘客，人们猜想他是第一回坐飞机的缘故。

飞机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郊区的机场降落，又转乘小飞机从迪化飞往西安，再从西安飞向延安——当时中国革命的心脏——父亲的身边。

“看哪，延安，宝塔山！”

这时，机舱内一位身穿苏联红军将军制服的 50 岁左右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身，用那碧蓝的锐利的目光，盯视着机翼下的大地，旋即非常激动地以苏联人特有的豪放，将双手摊开，紧紧地将毛岸英搂在怀里，“乌拉——延安！”

毛岸英激动得眼里湿漉漉的，他连忙将头伸向舷窗，将额头抵在窗板上，目不转睛地俯视机翼下的一切：那起伏的黄土高原，那在画报上早已神会的宝塔；那蜿蜒的黄土大道，那路上的毛驴；那黄土坡上一层叠一层、一孔挨一孔的窑洞，以及很小很小的、走动着的人们……

“那是王家坪，那是枣园，那是延河，延河封冻了，像条银蛇……”将军如数家珍地带着自豪而有些卖弄的口吻自言自语。

“阿洛夫将军，您到过延安？”毛岸英惊喜地握着阿洛夫的大手。

“到过，到过，我这回是旧地重游了！谢廖沙，延安可是个土得出奇的

地方，你回来以后，生活上变化大，可说是，一个在天上，”他用手指向头上指指，又把巴掌向脚下压压，“一个在脚底！上尉同志，你要有思想准备呀！”说罢，用大手在岸英的肩头上拍一拍，故意摩掌一下那三颗金星闪闪的肩章。

另一位是身穿普通西装的中年人，他调侃地说：“阿洛夫将军，你过虑了！谢廖沙上尉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会吃苦头的！”

“米尔尼柯夫大夫，你错了！”阿洛夫将军以教训的口吻说：“你完全错了，你不了解毛泽东！”

米尔尼柯夫大夫只好耸耸肩，把双手一摊，跟毛岸英做了个“不可思议”的窘相。

三人顿时陷入了沉思。

专机上的两位苏联人，一个是红军将军级外科医生阿洛夫，一个是内科医生米尔尼柯夫大夫，后来中国人嫌他那个名字太长太拗口，连毛泽东都喊他“米大夫”。这两位医学专家是斯大林应中国的请求，亲自指派到延安担任毛泽东的医疗护理工作的。

毛泽东的身体一直还比较健康，1945年8月28日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一干就是40多天。10月10日，即“双十节”，他在重庆和蒋介石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并于第二天飞回延安。由于内战阴云一直密布不散，毛泽东日理万机，疲劳过度，终于积劳成疾，一紧张便手脚发颤，大汗淋漓，头脑晕眩……

这可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这时一些著名的医生，已经撤离延安；原先的苏联医生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状况是很熟悉的，可是，在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后，他同苏联情报组的成员一起回国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去了。

怎么办？毛泽东的健康牵动了多少人的心！

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经请示上级同意，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明毛泽东的病情，希望他们给予医疗方面的帮助或提供一些医疗意见。

苏方回电说，从电报上他们的医疗专家无法诊断毛泽东的病情，没法提出任何治疗方案或建议，所以关于毛泽东的健康问题还得另想办法，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们表示，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派医生去延安为毛泽东担任医疗护理工作。

正在为难之时，12月初苏方又来电说，他们拟派两名医生——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十分欢喜，并表示，到时他将亲自到机场去接。

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儿子，

第一句话是“你长得这么高了！”

毛泽东要亲自去机场接苏联医生和儿子，这可不是一般小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要亲自出动去迎接客人，包括中央的领导同志回延安，那都是屈指可数的。

现在，正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天，西北的风沙大，有时刮得天昏地暗。毛泽东带着病体去机场，看来十有八九，是接他那心爱的长子毛岸英了。这个宝贝儿子，5岁离开，18年后再见，年过半百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为此，他盼着那一刻，甚至彻夜难眠啊！当然，他的激动还是掩饰在

内心深处。但是，人们仍可揣摸到毛泽东思子心切！机场接儿凝聚着多少父爱啊！

毛岸英呢，对于东奔西走为革命日夜操劳的父亲，他了解得太少了，以前连什么模样都记不起来了，见到父亲的画像、照片还是在他到苏联以后。而今，父子离别 18 载，要在延安相见了，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跟自己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岸英在飞机上也激动不已，思前想后，呼吸都紧迫了。当然，他根本想不到，日理万机的父亲要在隆冬严寒中亲去机场接他。

飞机在延安上空兜了个圈子，然后平缓地向机场俯冲，起落架降下了，在跑道上擦过，震得座位上的人不住地颤动，而留在机身后面的是滚滚烟尘——当年延安机场的设施可不太理想。

飞机终于平安降落。

毛泽东带着一队欢迎的人，站在跑道边，当飞机停稳后，他迎向伊尔飞机。

从飞机上第一个出来的便是毛岸英。

这是一幕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毛岸英在机舱口向外张望时，感到一切都很陌生：黄土高坡、土路、灰蒙蒙的天、枯树、凛冽的寒风，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场景。可是，当他正弓着身子走出机舱时，蓦然发现站在舷梯脚下的竟是他日思夜念、在梦中都呼唤的父亲——毛泽东。这些年来，他从父亲寄到莫斯科的照片，从电影、画报上，何止千百次地看到过父亲的魁伟形象，所以虽然 18 年没有见面，今天还是第一眼就发现了父亲！

父亲这么忙，天这么冷，他又有病在身，是不会到机场来接他的。他曾经几十次地这样设想。如今，太突然了！千真万确，站在面前的就是他最亲爱的最敬仰的父亲——毛泽东！

岸英几乎是从飞机舷梯上滑下来一般，站在父亲跟前。毛泽东迎上前去，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岸英，激动万分地凝视着比自己个头还高的岸英，第一句话是“你长得这么高了！”岸英穿着苏军草绿色的呢大衣，肩章上有三颗星闪闪发光，年轻、英俊、魁梧，真使人喜爱。

岸英以苏联式的奔放热情，紧紧地搂着毛泽东，不断地呼喊着：“爸爸，爸爸，我多想你啊！”听着儿子亲切的呼唤，毛泽东眼睛湿润了，喉咙有些嘶哑地亲昵地轻轻地回道：“一样的想你啊！”

但是，毛泽东是一个很讲礼貌的人，他不能总是抱着儿子，接着他同阿洛夫、米大夫以及苏军上校机长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

毛岸英笑咧了嘴，虽然也跟来接机的人们一一握手，可是都仿佛视而不见，连他在莫尼诺第二儿童院时的副院长、如今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好像也不认识了，他的双眼总盯着父亲。毛泽东穿着一身又肥又大的土灰色棉衣棉裤，脚下是一双大头棉鞋；这还不算，头上还戴着一顶灰棉帽，加上他那一口改不了的韶山土话，真是土得不能再土。可在岸英眼里，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亲切得不得了。

而局外人看来，这父子二人，一个是洋得潇洒，1.8 米以上的个头，全副戎装，英姿飒爽；一个是土得出奇，一副陕北农民干部的打扮。

当然，迎接的人们在惊羨、喜悦之中，也不可能想得太多太远。

毛岸英登上了父亲的吉普车，毛泽东看着苏联医生、机组人员上了车，才钻进吉普车内，手一抬，吉普车在布满砾石、黄沙的河滩公路上颠簸着，

向着毛泽东的住处行驶而去。

王家坪后靠清凉山，前面是一条大公路，公路那边就是宽阔的延河了。眼下正是枯水季节且冻了冰，冰下面，隐约可以看见水在大大小小的卵石间穿流着。在延河西边，便是闻名的凤凰山，毛泽东在 1937 年到 1938 年间，曾在山下居住过。

1946 年元月，毛泽东刚刚搬来王家坪，住在一栋新盖的石窑里。这个石窑，是模仿窑洞的样式，但是它盖在露天，不是挖进山肚里的。石窑有两间，极为普通，里面的布局、陈设十分简陋，一边是卧室，放着两张帆布躺椅，一边是办公室兼会客室，放着电话机。

石窑外边，有一块不规则的月形空坪，长了不少的杨树、柳树、槐树。杨树上，勤劳的喜鹊还在上面筑了几只窝。石窑的西边有一块矮矮的四方石桌，桌四边有固定的石凳，是毛泽东跟同事谈工作的好地方。石窑旁边盖有一间小平房，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曾经在那里小住过，眼下是为岸英准备的临时宿舍。

傍晚，毛泽东设宴招待苏联医生、全体飞行人员和毛岸英等。宴会后，他请机长到他的住处座谈，并当场要师哲给斯大林写一封感谢信，说明阿洛夫、米尔尼柯夫大夫、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抵达延安，望勿悬念，对送给他的礼品表示谢意。他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上校机长，请他带回莫斯科转交斯大林。

阿洛夫、米大夫被安置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后排窑洞里，既有工作间，又有医务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毛泽东的医护工作。

毛泽东不让儿子“手舞足蹈”，

锐利的眼睛盯视着他

刚回来那几天，毛泽东要岸英跟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聊，非常融洽。父子倾心交谈，日夜不离，18 年啊，有多少话要讲呀！“你回来了，好，好，很好。”爸爸仔细打量着他，脚踩大牛皮靴，身穿军呢大衣，那英俊秀气的面庞上，特别是开阔的眉宇间，天庭饱满，既看得出开慧妈妈的情影，也有自己的特征。毛泽东拍拍儿子的肩膀，看着岸英比自己还高出几厘米的健康的身体，满意地笑着。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毛泽东的病很快痊愈了。原来，两位苏联医生对毛泽东的身体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检查，专家们经过会诊，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药方：安静地休息，精神缓和，加上药物治疗，就可以恢复常态。他们都知道更主要的是阔别 18 年的长子毛岸英回到他的身边，使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比任何特效药更富疗效。

岸英没有忘记朋友们的委托，把蔡博等人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爸爸。毛泽东看了这些留苏学生的信，又认真地听了岸英的汇报，欣然提笔，给蔡博他们写了一封信：

蔡博、张芝明、刘永斌、黄平、赵小炎

诸位青年同志：

永福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这里，只能简单地写几句话给你们，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天成长，壮健，

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为国服务。
紧紧地握你们的手！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

毛岸英回到延安，对毛泽东来说是喜中有忧。

由于岸英从小在外流浪，无拘无束，后来在苏联 10 年，接受的是欧洲方式教育，长期跟俄国及世界各国的同学打交道，在生活上、待人接物上已完全欧化了，看见熟人，喜欢“OK”、“乌拉”，张开双臂，喜形于色。有时，毛泽东常看见他如何把双臂高举，又如何将手缩回，或耸耸肩，或弯弯腰。岸英喜欢打手势，以加重语气，毛泽东就把双眸老盯着他的手势，弄得岸英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后来，只要毛岸英“手舞足蹈”，毛泽东那双锐利的眼睛就盯着他，弄得他很尴尬。毛泽东以东方传统告诫儿子：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岸英渐渐习惯了，只要想抬手，面前就出现了父亲冷峻的目光。除此之外，岸英还有一些俄国式的习惯，使延安“土八路们”接受不了，他还爱搞些开玩笑式的恶作剧……如在劳动时，把蚯蚓丢在一位姑娘的脖子里，弄得那最怕蚯蚓的姑娘又哭又叫。毕竟，岸英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后生，还未脱尽孩子气呢，又是长年生活在洋人的圈子里，许多习惯与国内的人不一样，怪不得他在街上，看见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便问她“你几岁啦？”毫无顾忌地像跟年轻人说话一样随便，弄得人家啼笑皆非。

那时，延安周末常举办舞会，毛泽东为了调养身体，休息脑筋，也常参加。岸英更是个舞迷，每场必到，而且像众星拱月，在他周围总有着是一群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大多数来自“国统区”，对于英俊潇洒的岸英很是喜欢，何况他又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爱子。

凡此种种，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中国的传统是“子不教，父之过”，毛泽东要“管管儿子”了。

先从他的手势、服饰做起。毛泽东要岸英脱下那件呢军大衣和苏式军装，换上他给他的旧棉衣棉裤。江青则忙着用边区产的粗毛线为岸英织了毛裤、毛背心、毛袜子。不多久，毛岸英这个“洋学生”、“洋军官”，在服饰上渐渐地被父亲同化了，变成了“土八路”。

不几日，毛泽东又要岸英搬到中央机关去住，而且规定他不准吃小灶。有一回，他突然问岸英：“你吃么子灶？”岸英如实回答：“中灶。”毛泽东生气了，责问儿子：“你应该跟战士一样吃大灶么！”岸英肠胃有毛病，叫苦不迭，但也得服从，从牛奶面包变成小米窝头，“真难啃啊！”

接着，父亲又教导儿子怎样按中国的传统方式来和人们交往，他关照说：“你先去看看延安的老同志吧。见了人不要没大没细（小）的，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差不多大的，或者喊哥哥，或者称同志，不要随便喊人家的名字。”停了停，毛泽东又说：“这些老同志，都是参加革命好多年的了，他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以后要多向他们学习。”

岸英记着爸爸的话，不住地点着头。

听从爸爸的吩咐，岸英到延安的各个窑洞逐个地去看望老一辈的革命家。对于老同志，他非常尊重，有礼貌，老革命家们也都喜爱这位知书达理

的好青年。

“你在苏联住的是洋学堂，我

们中国还有所劳动大学”一天清晨，春光明媚，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后，并没有马上休息，在院子里的石桌旁，父亲和儿子又进行了一次正式的长谈。

毛泽东问了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又问：“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

“经常读的。能找到的我就找来读。”

毛泽东又问：“读过什么小说？”

岸英想了又想：“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的作品。《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毛泽东把读《红楼梦》的要领告诉岸英，然后遥望着延河那边的凤凰山上正在开荒的人群，慈祥地对岸英说：

“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的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听到这里，岸英早已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便接着说：

“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都过的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给儿子讲了孔夫子的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种田吗？孔子说我不如农夫；学生问他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菜农。

“你在莫斯科睡得那么好，钢丝床，一人一个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摊张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呀，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讲到这里，毛泽东也笑了，又说：

“过些时，我替你找个校长，住劳动大学去。”

当时，边区的每个人每年都有劳动任务，要生产一石六斗小米。毛泽东的工作太忙，边区的一位特等劳动模范便主动替毛泽东完成代耕任务。有一天，那位劳模赶着毛驴，又给毛泽东送粮食来了。毛泽东把岸英叫了来，指着劳动模范对岸英说：

“这就是你的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哪！”又指着岸英对劳模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劳模惶恐地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谦虚地说：

“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却不知道。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多打粮食。”

劳模这才信心十足地说：“那我行。”

“好吧，就这样说定了！这些小米，你带回去，当做学费。他过几天就去。”毛泽东要劳模休息休息，又跟岸英肩并肩，在院子里漫步。

爸爸的话，像潺潺的溪水，轻轻的春风，滋润着岸英年轻的心灵。

1946年3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这天一清早，吴家枣园就忙碌着迎接客人的到来。吴家枣园在延安城南15里，是由十来个自然村组成的一个行政村，村政府设在吴家枣园，村长姓郝。一大早，郝村长就起来扫院子，还把胡茬子刮得干干净净，抬头望见槐树上的喜鹊在叫，他自言自语地说：

“喜鹊叫，贵客到。”

他忙了一会儿，就来到村口，手搭凉棚，望望山梁上，看看客人到了没

有。他在心里琢磨着：毛泽东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听说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可能讲的是一口的洋话吧！

“毛泽东的儿子来当农民啦！”大家很高兴地转告着，等着他的到来。岸英也在盼望这一天。今天他早就起床收拾行装了。“张参谋，眼下乡亲们睡觉垫褥子吗？”岸英手里拿着一床蓝布褥子，扭过头来问张参谋。

张参谋说：“老乡们生活很艰苦，都不垫褥子。”岸英赶快把褥子收进柜子里，说：“那我也不带褥子，垫了褥子，在老乡家里会显得很特殊。”

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把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在岸英身上。岸英脱去大皮鞋，换上爸爸送给他的布鞋，背包里捆了一斗小米和几斤菜籽、瓜籽，从窑洞里走了出来。

毛泽东送了他一段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岸英，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要从开荒一直干到收割，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业了业，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岸英爽快地回答着。告别了爸爸，岸英跟着张参谋向吴家枣园大步走去。

从岸英的住地到吴家枣园要爬大坡，张参谋怕岸英吃不消，就牵了一匹老黄马，一上公路，他就对岸英说：“小伙子，行李怕有几十斤重吧？来，搁马背上，你也骑上去。这匹马你别瞧不起它，它跟你爸爸爬雪山、过草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作过贡献呢。”

岸英背着行李，边走边抚摸着老黄马，孩子气地说：“老黄马呀，你也数得上是老英雄呢！”

张参谋要替岸英卸背包，岸英横竖不肯，背起行李走在前面，诚恳地说：

“同志，我是去上劳动大学，现在就开始进学校了。这是劳动的开端呀，一起头就得好好锻炼自己，我怎么能骑老黄马呢？”

张参谋觉得岸英说得有理，就劝说道：“你这个背包可不轻，你就把背包搁在马背上，空手爬坡舒服些。”

岸英仍然摇摇头，不肯放背包，两脚迈着大步，存心考验一下自己的脚劲儿。

黄土高原的山坡沟谷，不比一般的丘陵山区，沟又深，坡又陡。岸英爬坡还不习惯，走着走着，身上背的东西越来越沉。尽管已是春天，但气候还有些凉，一早一晚人们还要穿上厚棉衣。可是，与时下天气正相反，岸英早已走得汗流侠背，里面的褂子都湿透了，他把棉衣的扣子解开来。

“歇一歇吧！”张参谋看着岸英累得额头上汗珠一直往下淌，就建议休息一下。

这时，一位老汉赶着一群山羊，从山坡上唱着粗犷豪放的“信天游”向这边走来。

“大溜溜，二溜溜，牵着两头老黄牛；三溜溜，溜溜溜溜……”

他抖着银白的胡须笑问道：“你可是——”他眯眼望着岸英。

“大爷，我是小学生，是到你们村里住劳动大学来啦！”岸英谦虚地说。

“噯！你就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吧？”老汉把又粗又大的手放在岸英的肩头上，心花怒放，“嘿，你长的样子多像毛主席啊！快，我领你们进村！”

岸英脱下爸爸给他的又肥又大的旧棉衣，架在背包上，跟着牧羊老汉向吴家枣园走去。张参谋要他把棉衣搁在马背上，他也不肯，用一句老话回道：

“不压不成材嘛！”

进了村，看见乡亲们都是笑容满面地迎接他，他心里好感激呀。他咧着嘴，笑呵呵地喊着：“伯伯、叔叔、婶婶，我是你们的小学生！从今后，你们多多指教我呀。”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个英俊温和的后生，郝村长更是打心里乐开了花，拉着岸英的手久久不放。

“郝叔叔，这些小米是我的口粮。菜籽、瓜籽是我从国外带回的良种，爸爸叫我带来，请你分给村里的老乡，让大伙儿都种上几畦。”

郝村长笑得合不拢嘴，忙把两个青年后生介绍给岸英：“这是大哥，这是二哥，他俩是种庄稼的能手，你以后就跟他俩在一个变工组。”

手茧——“毕业证书”

岸英被安排在那位劳模家里。

当晚，他到十几户老乡家里去走了走，坐了坐，把村里的情况摸了个粗杠杠。

第二天清晨，雄鸡刚刚开唱，岸英就醒来了。他和二哥一骨碌下了炕，背起镢头出了窑洞，喊着大哥，三人有说有笑地来到了荒山坡。

“今天上第一课，开荒！”大哥笑咧咧地说。

他们把山坡上的荆棘条砍掉一片，便开出一片荒地。这种荆棘条又柔又韧，上面长着尖尖的三角刺，岸英开始没经验，小心地避开刺，用蛮劲去拔，结果很费劲，拔不动，手一松，荆条就“嗖”地弹了出去又抽回来，打在脸上怪疼的，手上也划出了血口子。岸英不做声，仔细看着大哥二哥是怎么干的，然后学着他们的样子，也拉开了架势。

陕北使用的掘地的镢头，与别处的不太一样，岸英还是第一次使这家伙。他抡起镢头，举得老高，手又握不紧，镢头刨下去，蹦蹦跳，不稳当，掘得也不深，有时刨到石头上，还震得虎口发麻。不到半天，他那双细皮嫩肉的双手，就起满了紫血泡。

大哥要他用帕子将手缠起来，做出握拳头的架势，教他说：

“镢头不要举得太高，手要握紧木柄，不打转，下去才有力，掘得就深，手也不会磨出泡来。”

岸英在大哥的手上摸了摸。嘿！又厚又硬的老茧！怪不得他们扯荆棘条一点也不怕扎手，抡起镢头那样有力。

岸英按照他们教的要领认真地干着、干着……

头一天收工时，他已累得腰酸背痛的，浑身没有一点劲，像散了架一样。第二天上工时，抬胳膊都困难。他咬着牙坚持着。说也怪，几天下来，身上的酸痛劲没有了，而且感到力气增加了不少，劳动的技能也慢慢地掌握了，能和大哥二哥比着干了。三兄弟开荒，三把镢头简直像三部犁一样，不一会儿就能开出一大片生荒。这时的岸英一改学生模样，跟大哥二哥一样，光着上身，汗流浹背，土灰沾得满脸。

第二课学着赶毛驴送粪下地。这毛驴还专门欺负洋学生呢。你要它走，它斜着眼睛瞪着你，愣是一步不动；你不要它走，它又摆开四蹄，嘚嘚嗒嗒地乱跑一通，拽都拽不住。为了驯服小毛驴，他可动了不少脑筋，也闹了很多笑话。不久，小毛驴终于乖乖地听候使唤了，只要岸英吆喝一声，小毛驴就老老实实在地迈开细碎的步伐，跟他下地送粪，指到哪里走到哪里。

在“劳动大学”中，岸英还学会了种玉米，脖子上挂着个装种子的布袋儿，先从单手点种学起，还逐渐学会了双手点种；他又学会了撒谷种，一手抓粪，一手点种。更有收获的是，他了解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他肯

学肯钻，不懂就问，还随身带个小本本，把老乡们种庄稼的经验、谚语都记上……这里可有丰富的知识、学问哪！

村长和房东生怕岸英吃不消，劳模的老伴千方百计做些好饭给岸英吃，每逢这时他都要坚决谢绝。住在老乡家，他就和房东过一样的生活，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一铺炕。那饭，就是米糠、窝窝头；那菜，就是马耳菜、蒲公英等苦野菜；岸英却吃得津津有味。土豆丝加点盐和辣椒炒了，就算是美味佳肴了。吃饭用的那碗，也是补巴连补巴，坏了就用鸡蛋清加黏土粘上。每天下地干活，离家远，为了省时间多干活，家里使用瓦罐罐把饭送到地里。岸英和大哥二哥一块儿蹲在地头，照样吃得开心。村长过几天要打发岸英回延安看看爸爸，为的要他改善改善生活，可岸英坚决不回。他诚恳地说：“我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怎么能回去呢？”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指使胡宗南进攻延安，形势紧张起来。村里请示县委以后，决定把岸英送回去。

“我不回去，我农业大学还没毕业哩。”岸英执拗地说。

郝村长说：“你劳动大学已经毕业了。要打仗了，回机关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干呢！”

郝村长硬把岸英送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亲切地招待郝村长，问他：“岸英在你那里学得怎么样？”

郝村长赞不绝口他说：“岸英是个好后生！他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这些庄稼活儿，还利用空余时间，组织村里的青年人学政治、学文化。上山劳动回来，还总要捎回一捆柴，把柴禾送给烈军属。岸英在劳动大学毕业啦！”

郝村长的称赞，弄得岸英很不好意思。

毛泽东回过头，仔细打量着岸英：只见他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英雄结，穿着灰土布汗褂子，两条又粗又壮的胳膊闪着黧黑的油彩，脸上也黑不溜秋的，跟陕北青年农民一个样子。毛泽东风趣地说：

“好呀，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

郝村长过意不去地说：“毛主席，这些天把你娃苦啦。就说掏（翻）地吧，岸英看见其他变工队员一个个超过自己，便使劲往前窜，俺拦也拦不住。咱们天不亮就开荒，天黑了才回来。早上扛着镢头下地时，还看不见人影子，吃袋烟工夫，天才亮，咱们抽烟，岸英就给咱们介绍苏联情况，如今那儿耕田翻地都不用人，也不用牛，用拖拉机，一辆拖拉机抵上百八人的劳动量。

“天亮了，大伙儿就干活，山坡上尽是深草杂树，把它烧成灰当肥料。一个变工队，15把镢头掏过去，像汽车在大路上走过，满天灰尘。岸英跟我们一样，只穿裤衩，光着上身，鞋里灌进土坷垃，脱下赤脚干，变工队员每天的任务是开荒一亩，好劳动力也受不了呢。掏了20多天地，就又吆毛驴送粪……”

郝村长滔滔不绝地说着，毛泽东疼爱地瞧着岸英，似乎在问：“是这样吗？你吃得消吗？”岸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毛泽东爱抚地摸了摸岸英的双手，厚实粗大的手心里，那些血泡都结成厚厚的茧子。毛泽东满意地夸奖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问完了岸英的劳动情况，毛泽东又请教郝村长：

“郝村长，我想提个问题，向你这个‘教授’再领教领教。谷子（小米）地不锄，碾出的小米啥成色？每斗收多少斤？锄了一遍的，啥成色，什么分

量？锄二遍三遍的，碾出的小米啥样子？”

郝村长这老实巴交的农民，为难地说：“毛主席，俺只顾了种地、收谷子，可没注意过这些事，也没分开过称，反正是越锄谷子长得越好。”

毛泽东说：“我听说，人家老农已经有了研究。谷子地锄草很重要。在土壤、肥料、水分相同的条件下，谷子地锄三遍的，一担能碾出七斗半小米；锄两遍的，能碾六斗；锄一遍的，能碾五斗；一遍不锄，只能碾四斗多。每斗分量也不一样，分量轻一些的，是因为谷子瘪，碾出来的粒子碎，吃起来不顺口，没有油性。看来，还要勤翻勤锄，是不是呀？”

郝村长睁大了眼睛，心想：“毛主席，你对庄稼活儿知道的比俺还清楚呀！”岸英心中当然也明白父亲讲话的用意。

毛泽东对岸英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学不完的。往后有机会，你还要去学习，拜农民为师。”

岸英默默地点点头，把父亲的话牢牢铭刻在心。

第五章 热血洒在朝鲜战场

有人推荐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一些老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却鼓励他去

“我们只讲你是秘书，不说你是毛主席的儿子”

与亲人告别。妻子还在医院里，岳母送他一块手表，父亲在等着他毛泽东回电用了古诗：青山处处埋忠骨。毛岸英永远留在了朝鲜

有人推荐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
一些老同志不同意，毛泽东
却鼓励他去

毛岸英从“劳动大学”归来后，又进窑洞大学——跟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积累工作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他在全中国解放后回了一次湖南老家。这个 28 岁刚刚新婚的青年，有多少事情要做啊，然而美国侵略者的大炮轰掉了他的许多计划。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爆发了内战。内战打响的第三天，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参战，干涉朝鲜内政。同时，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9 月 15 日，美国投入 7.5 万人，在朝鲜仁川登陆；9 月 30 日战火又烧过三八线，直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

1950 年 10 月 1 日，国庆一周年，是个十分严峻的日子。

北京。40 万人举行庆祝大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礼炮齐鸣 28 响，游行进行了 3 小时 25 分钟之久。这次游行，实际上是对美帝侵略者的大示威、大警告，那气氛有些近似 1942 年苏德战争时莫斯科红场的军事检阅。

朱德总司令在国庆大会上指出：“……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用武装军队侵略我们的邻邦朝鲜，同时与蒋介石残余匪帮勾结，公开侵占我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正在用战争威胁世界和平……”

在这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的要求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中央军委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就在毛泽东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时，他仅给彭德怀 10 天时间准备，即 10 月 15 日要出动。司令部的小班子，要立即在北京组建。彭德怀从西北来京时只带了一名参谋叫高瑞欣，再有就是他的秘书杨凤安了，其他人员要在北京选择。

在确定司令部的小班子时，彭德怀考虑这个班子要小而精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包括军事、机要、秘书、通讯、翻译等人员。由谁任司令部的翻译，倒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是让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科长去，但这位科长抽不出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根据李克农的意图，作战部副部长李涛将军推荐毛岸英跟彭德怀入朝。

国庆节前后，毛岸英忙得不亦乐乎。他已经知道了派他入朝参战的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年轻的妻子刘思齐却患了急性阑尾炎，在医院动手术，他不得不在百忙中抽空儿去看望妻子，说些体贴话。

1950 年 10 月初的一天，岸英跑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那里，兴奋

他说：“帅妈妈，我要参加抗美援朝啦！”

出于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对岸英的关怀爱护，帅妈妈对岸英赴朝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她对毛泽东一家人的情况，尤其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牺牲太了解了，而且她对岸英的身世也太了解了。他是一个多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呀！帅妈妈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所以，帅妈妈一听岸英要到朝鲜去打仗，第一个反应是四个字：“我不同意！”

这回轮到岸英开导年过半百的帅妈妈了。

“帅妈妈，你别急呀！你听我说，我回国后到过农村，参加土改、整党，也到工厂搞了几天，但是没有体验过军事生活。在苏联倒是进过军校，搞过军事训练，也参加了大反攻，但那是胜利之师的追击，德寇兵败如山倒，没有真正的打过仗。”

帅妈妈不悦他说：“你刚刚要求从社会部调到工厂去，我当时不同意，你又再三再四地请求。好吧，刚去不久，又要上前线。”帅妈妈想了一个缓冲之计，对岸英说：“你不是喜欢研究政治经济吗？现在要充实中央马列学院，你可以去那儿工作。”

帅妈妈是个很有经验的组织家，她虽然眼睛不太好，可头脑十分精明。她来了个“迂回侦察”，说：“岸英，我知道是谁要你去的。”

在爸爸和帅妈妈面前，岸英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坦诚之人，经不起帅妈妈这一迂回战术的进攻，他毫不犹豫地坦白说：

“帅妈妈，李伯伯要我去！”

“李伯伯胡扯！”帅妈妈发火了，“李克农是搞安全工作的，他又不会打仗，你听他的做么子？”帅妈妈恼怒他说。

岸英一时觉得说走了嘴，马上兴奋地以解释的语气说：“帅妈妈，我自己也愿意去！”

“你自己也想去？”她心里稍许平息了一点怒气，说：“不过，这样的大事，你一定要征求爸爸的意见。你爸爸同意你去，你就去；不同意，你就别去！”

岸英答应着，站起身就要告辞。

帅妈妈留他吃饭。这是惯例，凡是到她那儿的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她都要留下来吃顿饭，聊聊家常，她的津贴大都花在这些孩子身上。而岸英跟江青弄不来，回到丰泽园，看见江青老跟爸爸闹气，他也不快活；所以，他尽量避开江青，最好的去处就是帅妈妈那儿。

这次，岸英没有心思吃饭，他说还有许多事要办，许多地方要打招呼，而最主要的是他要征询父亲的意见——去不去朝鲜？

毛泽东一向不把子女当成私有财产，对家务事、儿女情也看得非常淡泊，他总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千千万万接班人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偏爱，他是很钟爱岸英的，对他抱有很大很高的期望。可是，在工作安排问题上，他是把自己的子女，当做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完全由组织部门去调动，去安排，去发挥螺丝钉的作用。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岸英有任何特殊的感觉。1949年12月，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去苏联与斯大林会晤。李克农护送至边境，为在边境与苏方交接方便，李克农带了岸英同行。毛泽东在前边的车厢里，他们在后边车厢。人们都不知道岸英也在车上，但毛泽东知道。到了东北后，毛泽东要随行秘书注意，

不让岸英过境到苏联；并告克农，边境交接工作完毕后，一定要把岸英带回去，不要让他过境到苏联，即使他的俄语水平再高，不该他参与的事，也不能参与。

他唯一寄予厚望的儿子要上前线，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确实也是个艰难的抉择。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在战争年代，他已经失去了5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为此，当岸英向他提出要赴朝参战时，他陷入了沉思。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经过考虑，很快他便作出果断的选择——同意毛岸英入朝，并托付给彭德怀照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他不去，让谁去？

当然，组织部门选择毛岸英赴朝，也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是岸英俄语好，二是政治上可靠。志愿军司令部确实需要有一位这样的人。既然朝鲜问题要和苏联打交道，还有苏联专家在前方，战斗中还需要苏联空军的支援，况且战争形势又瞬间万变，更少不了精通俄语的翻译。再说，岸英的英语也很好，一打起仗来，少不了也要和美国人打交道。

组织上选中毛岸英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抉择是正确的；毛岸英的要求也是正确的，他要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磨炼自己。但帅妈妈的想法、担心也是有道理的，谁不知道战争是无情的……

在毛泽东发出那份字字千钧的入朝作战命令的当天，一架伊尔型飞机，飞转着螺旋桨，从北京的机场起飞，在阳光的中腾云驾雾，直飞山海关外的沈阳城。

飞机上，正襟危坐的彭德怀，不时用手抓粗短的头发，好像要从脑壳里抓出一串锦囊妙计似的。他不大吭声，也没心思俯瞰舷窗外的锦绣山河，而是紧闭厚嘟嘟的双唇，心思重重地思考着各种问题。他于4日从兰州飞京，5日受命，今天是10月8日。就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他这位身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之职的统帅，仅从北京、沈阳凑了个小班子。

临时组成的班子成员之间彼此陌生，似乎也无话可谈。只是岸英对一切都充满热情，舷窗下的长城、大海，他都要细细地注视，生怕漏掉一个风景点似的。

飞机越过山海关，突然遇到高空大气流的袭击，顿时上下左右颠簸起来。一位打瞌睡的苏联顾问被震醒了，桌上的铅笔掉在地毯上。

毛岸英用熟练的俄语提醒他：“你的铅笔掉了。”

苏联顾问说了声，“西巴西巴（谢谢）！”把铅笔捡了起来。

这时，坐在周围的同事们吃惊了，悄悄地互相询问着：“他是谁，俄国话说得好流利啊！”

有人神秘他说：“他是毛岸英！毛主席的大公子。”

毛岸英？他也去朝鲜？人们既兴奋又有些吃惊，带着惊奇又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岸英装着什么也没听到，仍向外侧着身子看那蓝天白云。

“我们只讲你是秘书，不说你是毛主席的儿子”

彭德怀一行在沈阳和平街1号一幢日式小楼里住下。彭德怀住在里屋，司令部的成员在外屋搭了一溜地铺。沈阳的10月不冷不热，年轻人挤在一堆儿睡觉，更觉得有味道。

彭德怀一进屋，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朴一禹次相便赶到了，见了彭德怀，如见救星似的握着彭总的手连声说：“彭总啊，你好！我受金日成同志派遣

欢迎彭总来了！”

彭总问：“你们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了吗？”

“接到了。金日成首相委托我向你转达他的要求，朝鲜党、朝鲜人民希望彭总尽快率兵入朝。”

可是，彭德怀刚刚受命两天，对于朝鲜战局几乎一无所知。这时，朴一禹便简单地介绍战况，说：“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已经推进到平壤附近，金日成已经撤退到德川……”

彭德怀最关心的是苏联的态度，他迫不及待地问朴一禹：“向苏联请求出兵了吗？”朴一禹说：“请求了，但没有回音。我们还在继续要求苏方出兵……”

送走了朴一禹，彭德怀把手一抬，把一班子人都叫了过来。

程普、海鸥、毛岸英等人都来到客厅里。彭德怀巡视着每一张面孔，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马上就要参战了，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大家互相看看，相视而笑：“没有什么想法，听老总的，为老总服好务。”

彭德怀不满意他说：“怎么是为我服好务？应该是为那即将来临的反侵略战争服好务！”

毛岸英见过大世面，带头说：“老总，你是司令贝，我们把你交办的事办好，就是为战争服务。”

“好！岸英呀，你要求来朝鲜战争前线，我很高兴。我们需要与苏联大使馆和军事顾问团经常联系，我正好缺一个俄文翻译呢！你么，就是我的秘书，负责与苏联顾问联络的翻译。另外，还要在办公室做些文字工作，行不行？”

岸英兴奋他说：“服从命令听指挥！”

彭德怀说：“岸英啊，我们对外只讲你是我的秘书，不说你是毛主席的儿子，这样有利于工作，你同意不同意呀？”

岸英爽朗地回答：“我同意。”

彭总又关照程普，由他多负些责，要大家不要向外讲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要口严，这样有利于工作。

可是毛岸英还有个习惯，凡到了一个新地方，住下后就要到外边逛逛，熟悉地理环境，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他到沈阳后，除了伴着彭德怀开会，便约了一两个新朋友逛街。他逛街的目标首先是书店。

进了书店，他便舍不得离开，先是看“白书”——只看不买，临到离开时，再挑选几本；这一回，他知道要离开祖国，去朝鲜这陌生的异国他乡了，这一去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是半年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战争环境中，艰苦、危险都不算什么，没书看可是最大的遗憾呀！因此，他选了一本又一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达尔文传以及有关朝鲜的历史、地理书籍，几乎倾其囊中所有，买了一大摞。回到住处，他把衣服杂物从那口苏联带回的皮箱中请出来，然后把一本本新书藏进去而且嘱咐同行者：“同志，可要替我保密呀！即使在战争环境里，也得学习啊！”

同志们都很理解地点点头。

为什么要保密呢？因为中央有规定，出国作战是绝密行动，这是为了战术上的隐蔽。直到打完第一个战役，1950年11月8日我国才正式发布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

与亲人告别。妻子还在医院里，
岳母送他一块手表，父亲在等着他

10月10日清晨，毛岸英一行人随彭德怀坐火车由沈阳来到安东（现在叫丹东）。他们下榻在镇江山（现改名锦江山）下的一幢日式小楼里。吃了饭，他们便乘吉普车来到鸭绿江边。

安东是个边陲小城，三面环山，南面是鸭绿江，江对岸便是朝鲜的新义州。一座铁桥，把两国紧紧相连。

下午，彭德怀在十三兵团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江边桥头视察，毛岸英尾随左右，以多思少说的态度，处理好自己的位置。

对岸的新义州，几天前还是一座和平安宁的城市，随着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传来了几百架美国B—29和野马式飞机的轰鸣声，几分钟之内，扔下数千枚炸弹，新义州在火海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10月13日，岸英随彭德怀一同回到北京。

他得到的信息是，斯大林变卦。原先中苏两党曾作出共同支援朝鲜的决定，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现在中国的陆军已经兵临鸭绿江边，整装待发，箭在弦上，正等待苏联空军的配合，以击败美国的海陆空优势。就在这节骨眼上，斯大林以“空军没有准备好，暂缓行

动”为借口，拒绝履行诺言，志愿军处于孤立无援境地。

岸英对此非常气愤。他在苏联10年，对斯大林的一些做法早有看法，如今面对朝鲜的紧急局面，他的爱、憎更加分明了。当然，他与父亲、彭总完全一致。

此刻，周恩来还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晤后，没有说服那位70岁的“老大哥”。苏联是怕引火烧身，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则对一触即发的战局，采取隔江观火的态度。斯大林另一想法是，对中国军队能不能打败美国人持有怀疑，他也许想，我们不派空军出战，中国陆军也许不敢单枪匹马越过鸭绿江……

谁知，久经考验的毛泽东说服了其他战友，中央政治局研究的结果是，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中国军队仍按原计划赴朝作战。

10月14日实际上是岸英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在紧张的工作之后，他挤出了一些时间，去跟亲友、同志们告别。

他按照老习惯，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首先到他敬爱的帅妈妈家。帅妈妈请他吃了一顿晚饭。席间，气氛十分严肃。

临别时，帅妈妈要岸英靠到她身边，用颤抖的双手，抚摩着岸英，摸他那粗黑的头发，那宽阔的像他爸爸一样饱满的天庭，摸他高悬的鼻梁，两只大耳朵，摸他轮廓分明的面颊……

帅妈妈叹了口气：“岸英，我是不同意你去的，唉！这个李克农啊……既然你爸爸批准你去，你自己也要求到前线去实践、去锻炼，那就去吧！”

岸英很动感情他说：“帅妈妈，你放心！况且，我也不是直接到前方去，是在彭总的司令部工作。”

她知道岸英是新兵，初生牛犊不怕虎，叮嘱道：“你要当心啊！”

岸英坦然地似乎宣誓般他说：

“帅妈妈，你放心好了！再说，人总是要死的，只要对人民有利，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去死，也是死得其所！我是个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革命是

不分国籍的，而且有几十万人都去，也不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帅妈妈，你别为我担心，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啊！”

临别时，她紧握岸英的手，再三再四地叮嘱道：

“岸英，炮子儿不认人啊，你还是当心一点好！”

一直到听不见自行车的响声了，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房里。那晚，这个老共产党员失眠了。

岸英骑着破车，回到他原准备工作10年的北京机器总厂，因为他是秘密出国，只能跟厂长胡光告别。

因为时间紧迫，岸英没有绕弯子，而是开门见山地对胡光讲：“我国决定出兵朝鲜，我有紧急任务，马上就走。我负责的那块工作，请总支再安排一下吧。我的东西，留在这里，统统都不要拿，好像我还在那里工作一样，不要因为我走了而影响大家。”

他们谈了半个小时。

岸英从机器总厂骑车又到了北京医院，去向结婚刚满一周年的妻子刘思齐告别。一路上，岸英在想：妻子很年轻，话不要讲得太生硬，否则她会受不住的。

一见面，岸英关心地问了思齐手术后的感觉如何，吃的流食还是普通饭，胃口好不好，伤口还疼不疼，接着跟思齐讲：

“我已经外出了一次，刚回来，还要走。”

思齐国庆前夕患了阑尾炎，做了手术。岸英来看了她两三次，后来突然几天不见了，思齐想盘问一下根底，但是当牵涉到国家大事和党的机密时，岸英是守口如瓶的。

思齐听岸英讲还要走，就关切地问：

“又要到哪里去呀？”

岸英绕了个弯子说：

“最近你看了报纸吗？你知道国际形势吗？很紧张呢！打仗的事你知道吗？美国侵略者侵略朝鲜，还妄图打到中国来，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岸英怕思齐舍不得他，没有直说。这小两口儿，结婚刚刚一年。这期间，岸英回了一次湖南老家，在北京也常住在机器总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作为一个新婚不久的青年，他对爱人的照顾、体贴是欠缺的。可是，他实在太忙，他把精力和热情都使在工作上了。思齐这个山东姑娘也很通情达理，知道丈夫的工作性质，对他的来去匆匆也习惯了。能够体谅他。现在，岸英又要走了，而且从暗示的话语中听得出来，又是一件特殊的使命，不知又要走多久，心中自然柔情绵绵，觉得有说不完的话。

岸英忽然想起带在身上的钢笔裂了口直漏水，不好使唤。思齐就说：“拿我这支派克钢笔去用吧，在我妈妈那里。”那支笔是他们结婚时一个老同志送的礼物。

岸英说：“正好，我还要到妈妈那里去告辞。”

时钟已经敲过10下，北京医院的大门快要落锁了，岸英不得不跟思齐告别。岸英临走时特别关照刘思齐：“江青她只照顾自己，根本不照料爸爸。她不爱我爸爸，我在前不久还骂过她‘你既然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可得小心，这个人是很记仇的……”思齐眼泪汪汪，岸英回过身来对妻子说：

“收不到我的信不要着急啊！我走了以后，你每个星期都要到中南海看

看爸爸，不要我不在家你就不去呀！收不到信不要着急！……”言语中充满了柔情。

岸英又匆匆赶到岳母张文秋家里，他还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再三对岳母说：

“我走了以后，要多多照顾我的弟弟。”

想起他那个受伤致残的胞弟毛岸青，他的心情就显得沉重起来。两兄弟相依为命20多年，在上海流浪5年，吃尽了苦头，在苏联10年，也很少分离。他时时事事都要照顾不太懂事的弟弟，为弟弟操碎了心。岸英回国后，岸青在苏联又呆了一个时期，直到1947年才回到东北。北平解放后，他搞了一段俄文翻译工作，可是他的脑病复发，又去苏联治病疗养去了。遗憾的是，岸英不能跟弟弟告别，只好委托岳母多加照顾了。

岳母是个老革命干部，岸英对她很尊重，也很信任，对她是用不着隐瞒什么的。他说：“妈妈，我要出国去朝鲜，来向你告辞。”

“多保重，早点回来！”岳母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女婿，她非常理解他。

他们谈到午夜过后一点多钟。岸英看着手表，那块“老爷表”已经“罢工”了。岸英心想，这怎么行呢？到前线作战，还要跟苏联人打交道，没有一块走得准时的手表，工作多不方便啊！当然，现在的青少年可能不会相信，毛泽东的儿子，竟和平民一样，没有一支好钢笔，没有一块好手表，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的青年人当然不好理解。

岸英从岳母那儿取到派克钢笔，看看停摆的手表，才想起岳母有一块自动手表，便不好意思地请求道：

“妈妈，我这块手表不顶用了，你那块自动表先给我用一用，将来回国时再还给你，好吗？”

这块手表是朋友赠送的，她舍不得用，一直珍藏着。岸英这一提起，她立即找了出来，深情他说：“那我就送给你吧，哪有女婿用丈母娘的表要还之理，这就算我这个妈妈送给你的纪念物！”

岸英接过手表，对准时间，欣慰地笑了，再次向岳母鞠了一躬，说声：“妈妈，你真好！”推出自行车，三步一回头地与岳母惜别。

回到父亲身边，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焦的地思考着，踱着步，像是在想别的问题，又像是在等儿子回来。

父子情深，一谈又是几个钟头……

第二天，10月15日，飞机又载着彭德怀和毛岸英等人飞回沈阳。16日，彭德怀召开重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19日过江。

10月18日凌晨，飞机又飞到北京，岸英是否又跟彭德怀回去，从现在资料中看不出，但他已经作好入朝的一切准备。从一张在安东镇江山烈士塔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岸英换上了朝鲜人民军干部服，跟司令部的战友徐亩元、杨凤安、唐本及坐在烈士塔台阶上的五个战士，还有一位戴大盖帽的军官（此人很像是苏联军事顾问）合影。背景的烈士塔由于被人遮挡着，只露出“牺牲”二字，塔周围摆了一排花圈……这是毛岸英的最后的留影。

本来，十三兵团已在安东市西边的老洼岭构筑工事，准备彭德怀在此设立司令部。可是，52岁的老将彭德怀的习惯是，前线在哪里，司令部就在哪里。不仅如此，他还提出第一个进入朝鲜，去找金日成会谈。真是出语惊人，不仅司令部的小班子感到愕然，连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也不知所措。但将军们早已熟知彭大将军的脾气，所以也没人敢去劝说。

岸英和战友们目送彭德怀登上吉普车，与秘书杨凤安、警卫员郭风光、黄有焕向鸭绿江大桥驶去。

1950年10月19日傍晚，站在桥头，岸英目送着彭总的吉普车从桥面上缓缓驶向朝鲜那边的新义州。在中朝分界的地方，彭德怀命令司机停车，他从车窗口探出头，向安东，也是向祖国深情地张望一番，一种悲壮的情绪，随着热血冲向脑门。车上的另外几位相视无言，默默地跟祖国母亲告别。

夜晚，岸英跟随着司令部的战友们一道，在夜幕沉沉中跨过鸭绿江。周围寂静无声，只听见脚踏铁桥的嚓嚓声以及鸭绿江水流动的哗哗声。岸英不时地、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心中默默地向渐渐远离的祖国告别：祖国，母亲，再见了！您的忠诚儿子为了捍卫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将不惜赴汤蹈火。

他的双脚离开了祖国的大地，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毛泽东回电用了古诗：青山处

处理忠骨。毛岸英永远留在了朝鲜

中国人民志愿军到了朝鲜以后，跟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人，打得美国侵略军及其走狗李承晚蒙头转向。

1950年11月8日早晨，毛岸英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发表公报称：

共和国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加之下，人民军在温井、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第二军团四个师及美军一部，迫使该方面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军逃到清川江以南……我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反击……毛岸英和战友们欢呼初战告捷。平时他要担任金日成、彭德怀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口头翻译，所以不分日夜地忙碌着。

11月24日下午，4架美军F—84型飞机在总部的上空盘旋侦察。这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要他注意防空：“你们的指挥部应建有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你们现在的位置不好，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请你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司令部的同志发现美国飞机侦察地形，估计第二天会来轰炸，便要求彭德怀一同研究防空问题。彭德怀沉着脸说：“我不怕美国飞机，也不躲也不去开会。”大家无可奈何，但还是作了决定：明天天亮以前吃完饭，天亮后不准冒烟，一律进防空洞，疏散隐蔽。

第二天，只有彭德怀一人不服从命令：“来朝鲜是来躲飞机的吗？”大家几乎是连背带拖地把彭总拉到山上的防空洞里。而未经战争洗礼的毛岸英披件呢大衣，同高瑞欣下去到木板房作战室取东西。11月25日晨，3架B—29型轰炸机在总部上空掠过。这天是第二战役的第一天，事情千头万绪。空袭警报刚刚解除，狡猾的敌机突然从北方掉过头来，飞到总部上空，扔下大批凝固汽油弹。爆炸的气浪吞没了作战室，摄氏800度的高温包围了岸英和高参谋……

毛岸英把青春和热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后来仅从一只烧剩的表壳，找到了岸英的忠骨。这只表还是他出国入朝前夕岳母送他的纪念物。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发现一个很小的帆布包，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和日用品、一把小剪刀，还有科学家小传《达尔文》。

据说，在埋葬岸英烈士时，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迁回祖国？

毛泽东回电用了两句古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来了电报。

机要主任叶子龙拿到电报后，忙同周恩来、江青研究一番，没有马上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事后，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他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叶子龙和江青一声不响。

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不好说什么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了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

他去拿烟，两次都没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卫士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从牙缝滋滋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滋滋声。

大概烟雾熏了他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儿子许许多多的往事，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湿润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熄灭在烟灰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是一位领袖，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感情极丰富的伟人。人所具备的一切，他都有。只是，长年的战争生涯，使他比常人更坚强，更有理智。彭德怀于1951年春节在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时，内疚地谈起没有照顾好岸英。毛泽东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抬眼凝视着窗外那已经萧索落叶的柳枝，轻轻地念着北周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长长地叹口气，深深地回忆了岸英短暂的一生，说：“岸英是1922年10月24日（阴历九月初五寅时）出生在长沙，他生下不久就跟我们一起去过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后来跟开慧同志一起坐牢，又带着两个弟弟一起在上海街头流浪——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稍停片刻，他扳着指头算了一下说：“岸英牺牲的时候，刚刚满28岁。”俄顷，他昂起头，轻轻走了两步，激昂他说：“革命战争，总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位普通战士，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能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彭德怀默默地听着，心情十分沉痛。他深知，岸英的牺牲，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当时岸英和高瑞欣的尸体草草埋葬在大榆洞的山头上。朝鲜停战以后，他的忠骨被迁葬到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大字，墓碑的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刻下的一段碑文：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

子，一九五一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附：

毛岸英生平大事记

1922年10月24日（阴历九月初五寅时），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湘雅医院，住小吴门清水塘22号；当日正逢父亲毛泽东率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胜利之时。1923年11月，随母亲杨开慧回到板仓。阴历十月初六弟弟岸青出生。

1924年5月底、6月初，随母亲、外婆和弟弟一起赴上海毛泽东处。

1925年2月，随父母、外婆、弟弟回到韶山上屋场。10月，举家迁往广州。

1926年12月27日，举家迁回长沙。

1927年2月12日（阴历三月初二），举家迁至武昌都府堤41号，不久二弟岸龙出生。

8月，党的“八·七”会议后，因父亲去湖南、江西等地组织秋收起义，随母亲、外婆、弟弟迁回长沙，改姓杨。

1929年春，入板仓杨公庙小学。

1930年10月24日，随母亲杨开慧一同被捕。在监狱里，杨开慧教他识字，给他讲父亲的故事，教育他要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要流泪，长大了要跟父亲一起为穷苦人办好事。

11月14日，母亲英勇就义。他因悲痛过度，不吃不喝而病倒。

12月底，敌人制定了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妄图引毛泽东等上钩，他被释放回板仓。至次年年初，由舅妈李崇德带着往返于长沙、平江等地亲戚家避难，东躲西藏。

1931年春节前夕，经叔叔毛泽民安排，外婆和舅妈将三兄弟秘密送往上海，由地下党安排到大同幼稚园，化名杨永福。

4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没有经济来源而解散，被匆忙安置在法国天主教堂的一个牧师家里，党组织按月补贴生活费。后来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的破坏，生活费无着落，自谋生路，四处流浪，住在破庙里，靠卖报赚钱糊口，还经常到外白渡桥推车，备受欺凌，岸青被特务打成脑震荡，岸龙失踪。

1936年6月，与弟弟岸青一起被党组织找到，由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带到法国。

1937年初，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康生从巴黎接到莫斯科，被送往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1939年元月，列宁诞辰纪念日，参加少先队任大队长，进入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

1940年元旦，周恩来在苏联治伤期间专程看望了两兄弟并合影留念。

4月12日，延安《新中华报》全文登载了他的《中国儿童在苏联》的长篇来信，并加编者按。

秋，第二国际儿童院和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随之迁往伊万诺沃城。加入共青团，后任团支部书记、伊万诺沃市列宁区团区委委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武装侵犯苏联，参加了市内的保卫工作和民兵武装训练，并到20公里外的市郊垦荒种菜，伐木劈柴，缝制衣服，挖反坦克壕支援前线。

1942年5月，进入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学习。

1943年1月，进入列宁军政大学深造，中尉军衔。

在列宁军政大学学习期间，经韩铁生（化名伊万）写信介绍被批准加入苏联共产党，为预备党员。

1944年夏，转为正式党员。毕业后被批准上前线，担任某坦克连指导员，在白俄罗斯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参加反击战。晋升为上尉。

1945年初，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赠送他一支手枪以作纪念。随后，又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在这所专门培训外交人员的学校里，集中精力读了《资本论》。

1945年底，经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随同两名苏联医生秘密回国。

1946年1月，回到祖国延安，见到了阔别18年的父亲。

2月，安排在中宣部工作，并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来到吴家枣园参加生产劳动。

半年后，因胡宗南进入延安，回中央宣传部。

1947年3月，敌人23万余人向延安进犯，19日随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在山西临县郝家坡进行土地改革。白天劳动，晚上访贫问苦，深入调查，发动群众。

8月—10月，随同中央工作团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列席全国土地会议，并在小组讨论中介绍了郝家坡依靠群众进行土改的经验。

1947年11月—1948年5月，去山东渤海地区阳信县参加土改复查，总结了一套较完整的经验。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机关会议上指示：毛岸英同志在土改运动中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48年7月—11月，回到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与曹葆华合译了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等著作。

12月，调河北建屏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1949年2月初，调社会部工作。

3月，调中情委担任李克农的秘书兼任翻译，曾随代表团出访苏联。

8月17日，给舅父、外婆写信，追忆5年的上海流浪生活，真是“不堪回首”。

10月15日，与刘思齐结婚。

19日，给外婆、舅舅回信畅谈思念之情和回湘省亲计划，表示以后要学一门技术。

1950年5月下旬，受父亲委托回湘看望亲友，回板仓为母亲杨开慧扫墓，了解群众对土地改革的反映。26日，回到韶山。

8月上旬，随李克农秘密访问苏联，见了一些老同学、老朋友。

秋，经再三要求，离开社会部，调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

10月8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彭德怀飞抵沈阳。

13日，随彭德怀返回北京，与亲人告别。10月19日晚，跨过鸭绿江，

随志愿军司令部到朝鲜，担任司令部俄文翻译兼机要秘书。

11月25日上午，在由防空洞返作战室取地图时，因敌机轰炸而壮烈牺牲，时年28岁。遗骨先葬在大榆洞山头，朝鲜停战后迁至平安南道的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后 记

我为什么要写毛岸英

毛岸英，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光辉的名字！可惜，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仅仅活了 28 个春秋。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为毛岸英立传？他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历史上、党史上的名人，给他宣传，有什么意义呢？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吗？不是！是为了名，为了利？不是！要说“名”，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已经看得十分淡泊了，何况我已有 300 万字的 16 本大小著作摆在书架上，在中国文坛，可说“小有名气”吧？我用不着借名人抬高自己，或以名人的光辉来涂抹自己；要说“利”，在当前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初级阶段，“爬格子”发财致富的能有几人？名耶？利耶？非也！

那么，或者你是毛氏的至亲好友了？否，我这个江苏人，与韶山的毛氏家族毫无干系。1950 年 11 月 25 日，毛岸英牺牲的时候，我还是个系着红领巾的农村小学生。我跟毛氏家族不搭界，既无血缘关系，也无地缘关系。

那么，你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心血，去写毛岸英呢？

一言以蔽之：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当代的历史上是叱咤风云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改写了中国历史，甚至改写了世界近代史。他的伟大的辉煌的一生，震撼了全世界，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是一个巨人，在中国历史上“数风流人物”，首推毛泽东！

有关毛泽东的书，成千上万。人们大多数只知道他的光辉灿烂的一面，而很少了解他的家庭的悲剧性的一面，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毛泽东一家牺牲了 6 位亲人，而他的故乡韶山一带，牺牲了 1000 多人；连他的夫人杨开慧的家乡板仓，也有 400 多人革命流尽了鲜血！

而毛岸英，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随父母颠沛流离，就要跟妈妈一同坐牢，就要远离故土、亲人，去过流浪生涯，就要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生活 10 年。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不仅没沾毛泽东的光，反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乃至牺牲了生命！

然而，毛岸英并不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就没有个性；相反，他的个性非常突出。由于特殊的历史、人文、地理、政治环境促使毛岸英有一段特殊的非常人的遭遇，这就造就了他的善良、刚毅、旷达、热情、正直、勇敢的性格。在他身上，有他崇敬的父亲毛泽东的缩影，有中国革命血与火的烙印。

凡此种种，造就了毛岸英平凡的值得人们学习的人生。他那无愧于巨人之子的身分是闪闪发光的。写毛岸英，反映了人民领袖风范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风的一个侧面。这种作风，曾经是她取得政权、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人们提起“高干子弟”就带有几分贬意。要说“高干子弟”，那么，毛岸英可算是中国第一号“高干子弟”了，可是，毛岸英是怎样对待这个敏感问题的呢？

我有幸看到他的亲笔，他这样写道：

“这两天，心里很不平静，它是由于我的社会地位与本身实质之间的矛盾，前者是‘好得很’，后者是‘糟得很’。

“我从不希望由于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儿子，而受到特殊照顾，被‘另眼看待’。”

所以，熟悉和研究毛岸英成长的道路，对现代以及未来的青少年，决不仅仅是讲一个人的故事而已。

长久以来，毛岸英的形象总在我的脑海中萦回，挥之不去。

我希望，现在和未来的青少年朋友，能从这本书的主人公毛岸英身上汲取力量，找到榜样，成为跨世纪的有用之材！

最后，我感谢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赤子丛书》之一的《巨人之子毛岸英》。这是为全国的少年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

金振林

1995年11月24日于长沙凤凰楼

